



總第 **24**

JUNE 2026

左野黨TM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OPPOSITION PARTY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中國民主黨主辦

這一年

去年這個時候，《在野黨》重新與讀者見面。如今一轉眼，已經一年了。

一年並不算長。

對於一本雜誌來說，一年不過十二期刊物；對於一個人的一生來說，一年也祇是漫長歲月中的一小段路程。可對於一本曾經停刊多年、又在異國重新出發的刊物而言，這一年終究還是有些特別。

世界並沒有因為時間過去一年而變得安靜。

許多事情仍在發生，許多問題也依然留在那裏。中國發生的許多事情，和過去相比似乎變了許多；可仔細想想，又仿佛什麼都沒有變。

有人被釋放，有人被拘押；有人離開故土，有人仍在原地堅守。新的名字不斷出現，舊的名字也並未消失。

歷史有時候走得很快。

快到人們來不及記住昨天發生過什麼。

歷史有時候又走得很慢。

慢到幾十年前討論過的問題，今天依然擺在那裏。

這一年裏，《在野黨》刊登過回憶、評論、詩歌、隨筆，也記錄過許多並不引人注目的故事。那些故事未必驚天動地，却真實地存在于這個時代之中。

一本雜誌能夠做的事情，其實十分有限。

它無法改變現實，也無法決定歷史的方向。

但它至少能夠留下記錄。

當許多事情被遺忘的時候，總還有人記得；當許多聲音逐漸沉寂的時候，總還有地方願意把它們保存下來。

這或許就是一本刊物存在的意義。

過去一年裏，我們得到過支持，也經歷過波折。許多作者、編輯和讀者分散在不同國家和城市，彼此未必見過面，却因為共同關心的一些事情而聯系在一起。

這種聯系並不喧鬧，却十分珍貴。

今天回頭看，一周年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節點。

它既不是終點，也算不上什麼值得慶祝的成就。

更像是一次短暫的停步。

讓我們回頭看看走過的路，也看看前面仍然漫長的道路。

未來會怎樣，沒有人知道。

但祇要還有人願意記錄，願意思考，願意說出自己相信的話，那麼一本雜誌的生命就不會結束。

胡海寧
2026年6月25日

開篇 <u>Prologue</u>	01	
02	目錄 <u>Preface</u>	
在野黨簡介 <u>Contents</u>	03	
思想火種 <u>The seed of ideas</u>	05	
05	人物專訪 <u>Voices of Change</u>	
06-17	民主火種 <u>The Spark of Democracy</u>	
真相中國 <u>Truth China</u>	18	
18-19	中共罪行 <u>The CCP's Crimes</u>	
20-28	時事評論 <u>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u>	
29-54	社會評論 <u>Social Commentary</u>	
民運之路 <u>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u>	55	
55-67	民運之聲 <u>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u>	
68-84	民運行動 <u>Democratic action</u>	
85-88	民運風采 <u>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u>	
89-90	民運同道 <u>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u>	
連載 <u>Serial</u>	91	
91-101	作品連載 <u>Serialized Works</u>	
檔案館 <u>Archives</u>	102	
102	迫害實錄 <u>Persecution Records</u>	
103-106	中國記憶 <u>Chinese Memory</u>	
雜誌社介紹 <u>About the Magazine</u>	107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1998年9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9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11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27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2025年6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25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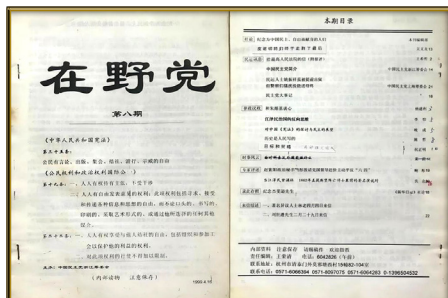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年2月1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11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捕，9月15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2011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累计服刑达16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组织框架介绍：**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并设有日本及加拿大分社，成员多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对话是民主的起点

——专访中国公民陈西先生

记者：林小龙

陈西借“文明对话国际日”倡议推动公务员财产公开，并通过《对话——教育的目的》一文阐述其核心观点：社会进步源于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对话，而非单向服从与权威灌输。

林小龙：陈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在野党》的采访。首先想请您谈谈，为什么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会选择“推动公务员财务公开”作为主题？

陈西：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建立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而中国至今没有通过相关法律。我们认为，既然中国提出了“文明对话国际日”，那么最应该讨论的就是中国自身尚未解决的重要公共问题。

林小龙：您在公告中提到，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实行相关制度，中国却长期缺位。您认为症结在哪里？

陈西：问题就在于缺乏公开讨论和社会监督。一个良法如果三十多年都无法通过，就说明立法过程中存在某些阻碍。具体是什么阻碍，恰恰需要社会各界公开对话，共同寻找答案。

林小龙：您还提到“良法未到，恶法先来”。这里指的是什么？

陈西：我指的是近期关于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的调整。在许多民众看来，反腐标准被提高，而财务公开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这种反差容易引发公众质疑，因此更需要公开讨论。

林小龙：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对话”二字？

陈西：因为我认为，对话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能力。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话，就只能剩下命令和服从。对话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发现问题的方法。

林小龙：在您的文章《对话——教育的目的》中，您提出教育的目的不是“听话”，而是培养“对话能力”。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陈西：我长期观察中国教育和社会运行方式后发现，我们的教育往往更重视服从，而不是思考。学生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却缺少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训练。我认为这是教育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林小龙：您在文中引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维特根斯坦、布伯以及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您认为他们共同说明了什么？

陈西：他们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人类通过语言和对话认识世界。智慧不是灌输出来的，而是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人学会思考，而不是学会服从。

林小龙：您提出“民主不是投票，而是对话讨论；法治不是讲武力，而是讲道理”。能否进一步解释？

陈西：很多人把民主简单理解为投票，其实投票只是结果。真正重要的是投票之前的讨论过程。同样，法治不是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是在规则下讲事实、讲证据、讲道理。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把“对话教育”和“听话教育”进行了鲜明对比。您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陈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体性。对话教育承认每个人都有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听话教育则更强调服从和等级秩序。

林小龙：有些人认为强调秩序和稳定并没有错，您怎么看？

陈西：秩序当然重要，但秩序不应该成为压制人的理由。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沉默和恐惧基础上。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提到“沉默是金”的文化传统，并认为这种观念可能限制社会进步。为什么？

陈西：因为很多问题恰恰是在沉默中积累起来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开讨论机制，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社会才有自我修复能力。

林小龙：您认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陈西：最需要的是建立公开、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无论是公务员财务公开，还是教育改革，还是社会治理，都需要对话，而不是回避问题。

林小龙：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最想传递的信息。

陈西：文明的本质不是统一声音，而是让不同声音能够和平、平等地对话。

林小龙：感谢陈先生接受《在野党》远程视频专访。

陈西：谢谢《在野党》，也谢谢所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朋友。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Dialogu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Democracy

Interview with Chen Xi emphasizes public dialogue, civic particip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s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and accountabil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文明对话国际日

公告一

作者：陈西

尊敬的共和国公民：

2026年6月10日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即将来临，这个由中国政府提出，得到世界上80多个国家支持的“国际日”来临，作为共和国公民，我们当然得站出来，给政府点赞的同时，并支持政府本国“文明对话国际日”项目的建设！

继首届“文明对话国际日”后，今年我们推出的主题是：促进我国公务员财务公开话题。

为什么是我国，而不是外国？

我们发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156个）国家都早实行公务员财务公开制度了；而作为负责任大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本国远远落后了！中国人大至今还没有通过“国家公务员财务公开法”。

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国早有有识之士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并讨论过了，该法案至今仍冰冻在人大，是什么原因呢？

当我们期盼“公务员财务公开”法尚未盼来，却等到了5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准贪证”的到来。

怎么良法未到，恶法却先到来呢？！

是什么原因阻止了良法的通过？！

人大在立法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难点，堵点？！

有什么卡脖子的事情，迟迟不能通过该法呢？！

良法立法受阻，恶法立法反而得到通过，这说明，单靠上层单方面立法已经成问题，我们不妨在“文明对话国际日”来讨论这些“卡脖子”的问题，全社会动员起来与上层有识之士多方互动，共同推动良法——“公务员财务公开”法案尽快落地。

故，继首届“公民对话联盟”平台活动，我们这次对话平台呼吁全社会都来对话，共同参与解决良法提案被“卡脖子”的事！

第二届“公民对话联盟”平台发起人：

贵州贵阳公民_陈西-手机号：18198281954（社交软件同号）

浙江杭州公民-陈树庆微信号：wxid-wmhnbcidh4k22

湖南怀化公民-唐浩铭手机：13212390018，13974518171（社交软件同号）

江西赣州公民-刘少明手机：18802016201（社交软件同号）

贵州贵阳公民-徐国庆手机：13984086628（社交软件同号）

湖北潜江公民-姚立法（13339728964）（社交软件同号）

山东德州公民-陈立勇手机：18005449982（社交软件同号）

四川成都公民-陈云飞：电话 16718106764 微信号：cyf1989-06-04

欢迎广大共和国公民参加第二届“公民对话联盟”活动：

从公告发出之日起，凡自愿公开留下电话号码，或微信号联系方式，或转发此信息的为“公民对话联盟”发起人，“志愿服务者”；以承担起当地“文明对话国际日”服务的工作。签名按参加先后顺序自动排名。

2026年5月20日

附陈西议论文：对话——教育的目的

笔者定义：教育是使受教育者热爱和掌握对话能力。对话是人基本的生活方式，人的各种品德和能力唯经由对话而习得而显现而巩固。对话式教育始于苏格拉底，他称自己是文明思想品德的助产士，他以对话来开拓对话者的智力；他的学生柏拉图是这种对话教育的果实，也是老师事业的继承者；所以，他的几十篇名作都以《对话》体流传下来。

造物主造万物是有限，悖论的造；或者说，万物都不可能完善，都有缺陷，是一半一半的存在；造物主规定存在者得找回对立的另一半，以弥补自己的缺陷，克服自己孤独无援无继无未来的状态。

那么，以什么为媒介？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即世界”，人类认识世界只能通过语言为媒介来掌握，人类的能力和有限性都受到语言限制。语言成为人类唯一打开自己世界天窗的钥匙；如此而来，语言会反噬人类。如何克服语言的反噬，克服被语言的禁锢、受限、孤独、贫困且自大，人天然的缺陷？

人类借助对话，或对话平台来克服不足。

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过往最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都以《对话》方式来开拓那个时代人的智性；所以，人文教育主要是经过《对话》方式来解放人的心智和培养人性。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最早扫盲启蒙教育就从读《圣经》释经的对话开始，他们的教堂区别于中土的学堂传统导致：他们没有语文课，只有对话沟通的阅读课。神学家马丁·布伯把对话看成是人克服孤独存在和原子化状态的必要条件。在他影响广泛的《我与你》一书中。他提出：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某种结论性东西，或表达一个人自己的观点或看法，而是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神之间建立起真正有意义生活的先决条件。

如果要定义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哈贝马斯是这样定义的：民主不是投票，而是对话讨论；法治不是讲武力，而是讲道理，人类区别于动物世界最明显的能力是讲道理。选举投票是结果，民主看重过程中的对话讨论；法治不是亮剑，法治是培养人在对话中讲道理的能力，这样就好理解法庭上“控、抗、辩”对话裁决的模式了。

但是，家文化学堂的特色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对话，而是听话。是把受教育者驯化成听话的巨婴，懂得服从才是金。就有金句：“沉默才是金”。所以，世界给中国人一个“哑裔”的称号。

教堂与学堂的区别：一个培养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对话，一个培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前者，在上帝面前人得认罪，承认自己的不足；方有释经、祷告、对话、交流沟通重要的过程；后者，是接受唯一正确答案，接受等级秩序的规训，顺从天命，和父母官的安排，做个“哑裔”，就不必有对话重要的

过程。

学堂的传统起源于孔子。早在春秋末期，他就提出了：“以尊者为忌讳”的教育理念。他擅长祖宗崇拜，专业称为儒者，是搞祭奠业的，他十分看重社会秩序的建立。比如，在《论语》中，他也有对话，但是，他的对话是给出正确结论。他以顺从为教育目的，妄以家文化秩序的教育来解决在社会上遇到的一切问题。如，异性之间的匹配和需求都由父母官来批准配给就是一例。

他在鲁国曾是该国父母官阶层之一，其父母官思维定式认为：“秩序”是最高的社会价值。“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唯一，结果，其他价值观都微不足道。而对话的教育观认为，秩序是次要，当下活着人的价值才是至高无上的，所谓秩序当是人理性对话建立起来的“自生自发秩序”。

他没有注意到：建立在“尊者”，威权家文化的秩序是一种恶性惯性的秩序。人活在这种惯性秩序中，即活在历史决定论中；人被历史决定论压迫成为了奴隶，人必然失去主体的位格；于是，导致当下活着的人失去了主角意识，只有配角意识；更无奈的意识是，它培植了人活在堕性，惯性、路径依赖中而不能自拔；最终，人因受制于惯性秩序的反噬，只能在凄凉中灭亡。

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史是证据，当下公务员塌方式贪腐，特权者30多年都未通过“公务员财务公开”法案，并把可入罪标准提高到300万更是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特权阶层已经在重蹈覆辙，陷入到历史恶性循环中，陷入到旧秩序的反噬中，等待着其自取灭亡！

大儒曾国藩就发现在“官本位”家文化下的无力感。因为，在家文化秩序下，似乎对话、讲道理、培养理性，独立思考能力都是有违家长意志的；严重点说，都是在犯不敬不尊不孝，十恶不赦之罪。

对于巨婴来说，把一切都交给父母官搞定，有那点不好。这样，他们可省心地吃喝玩乐去旅游，可以不关心政治了！

选择题来了！

在以对话或听话为教育目的理念之间，你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选择前者：爱智慧、爱开放包容共和制的国家；

选择后者：爱愚蠢、爱封闭吸取性特权制国家。

2026年5月20日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文明对话国际日

公告二

作者：陈西

一个失败国家，是从这三个职业腐烂开始的：教育、医疗与公权力。这三个职业是国家的根基，民族未来的保障，一旦它开始从内部溃烂，不待有外敌入侵，这个国家注定走向失败。尤其是第三个，我们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不得不关注的职业。

第一教育。本是给孩子点亮人生的灯，教会他独立思考，以对话打开孩子心灵的亮光，去照亮必然会遭遇到的那一段行走在黑暗世界中的路，确保行走者不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可要是教育者丢了初心，把学生当成敛财工具，把良知换成碎银，他们必然驯化学生为工具，驯化学生高度一致地听话，而失去了对话的勇气。听话的教育不但毁掉了一代人的未来，更是毁掉了这个民族的明天。

第二医院。本该是生命的避风港，是缓解痛苦点燃希望的地方，可要是这里把救死扶伤的誓言踩在脚下，变成“认钱不认人”冷漠之地，那时，老百姓怕的不只是病痛，更怕从那扇冰冷大门里伸出谋财夺命之魔手，搞得人财两空。

第三公权力。我们不怕教育溃烂，不怕医院腐败，我们最怕公权力的溃烂和腐败。一旦公权力变质，整个国家真的就无可救药了。正如乔治·华盛顿说的：我们越来越明白，对人类文明威胁最大、破坏最惨烈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其次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

中国历来也有一句话：国家之败，由于官邪。因为，“官本位”害怕透明机制，一旦当官，终生吸血。并且，这种机制是上层决定下层，整个国家处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劣势中；不像“民本位”国家有阳光法，基层决定上层。所以，不怕教育和医院的溃烂，就怕官僚特权阶级的产生；如此，他们必制定出汲取式的国策，这个国家就完了。

这时，官僚特权阶级制定的法律不再保障自由，而是沦为压榨的工具，所谓的法治成了特权者最虚伪的表演，所谓“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维护社会的公义变成了保护特权，公权偷梁换柱为私权，源头活水变成了臭气熏天的死水，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不就被一小撮特权者葬送了吗？

我们担忧是有依据的。公务员财务公开的良法讨论了30多年未能通过，反之，两高（〔2026〕6号法释）5月1日施行的法释通过了，这正是让我们担忧的证据。体制内有识之士早就提出了“公务员财务公开”的法案；这本是一副对症的良药，是提纲挈领的阳光法，是可以医疗好社会乱象疾病的法案；谁想，良药未制成，毒药却先落地了。我们说它“毒，恶”，是说它是贪腐的陷阱，划定300万元为犯重罪的门槛似乎在暗示，300万元为轻罪，反而使陷阱扩大化了。

官本位独大是公权力失去制衡，兽性贪得无厌的表现，是榨取式官僚特权阶级正在败坏国家的罪证。世界万物都必须在悖论中，在正反制衡结构中，让彼此的张力或冲突成就彼此，促进他们的进化。官本位必须与民本位形成张力，如同阴阳、正反、左右、新旧、美丑、善恶必须形成张力一样。符合“一阴一阳谓之道”。

官本位独大说明，我们国家正滑向汲取性失败的制度里。在此时刻，曾有共和国公民代米安、宋淑文、熊利、陈西等等公民先后站出来，他（她）们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出“提案申请书”，呼吁重新审议“并废止法释〔2026〕6号司法解释”。

与此同时，在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我们“公民对话联盟”呼吁开展“公务员财务公开法案”的全民对话，以阳光法解决官本位之邪的问题。如果有关国家机关不能理解阳光法百般的好处，可以向香港廉政公署取经。

国家成败兴亡与每个国民休戚相关，覆巢之下无完卵。望有更多的共和国公民参与到文明对话日活动中来！

“公民对话联盟平台”发起人：

贵州贵阳公民_陈西手机号：
18198281954（社交软件同号）

浙江杭州公民-陈树庆微信号：
wxid-wmhnbocidh4k22

湖南怀化公民-唐浩铭手机号：
13212390018,13974518171（社交软件同号）

江西赣州公民-刘少明手机号：
18802016201（社交软件同号）

贵州贵阳公民-徐国庆手机号：
13984086628（社交软件同号）

湖北潜江公民-姚立法手机号：
13339728964（社交软件同号）

山东德州公民-陈立勇手机号：
18005449982（社交软件同号）

四川成都公民-陈云飞手机号：
16718106764微信号：cyf1989-06-04

湖北随州市公民-刘飞跃手机号：
19171484732（社交软件同号）

贵州贵阳市公民-申有连手机号：
13037897453（社交软件同号）

欢迎广大共和国公民参加第二届“公民对话联盟”发起人活动。

从公告发出之日起，凡自愿公开留下电话号码或联系方式的为共和国“公民对话联盟”发起人，“志愿服务者”；以承担起当地“文明对话国际日”服务的工作。签名按参加先后顺序自动排名。

2026年5月28日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极权逻辑下私自救援的“罪”

作者：张兴贵

2026年5月22日，河南省蓝天救援队的伊川、宜阳、嵩县三支队伍，因未履行报备审批程序，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拍摄发布视频和接受采访。随后，他们被责令立即全员撤回，并受到书面警告。这不是荒诞的个案，而是极权主义逻辑在21世纪的赤裸裸的展示。它把人类最原始的同胞之爱、自发互助，判定为“越界”；把志愿者自带装备、自筹经费的义举定性为“违规”。

极权国家的本质，绝非简单的“强政府”“管理严格”。它是一种对社会与个体进行全面征服与重塑的现代暴政体系。

第一，极权国家垄断一切合法性的来源，制造全能神话。极权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垄断，是对一切自主行动的零容忍。它不满足于统治政治权力，而是追求对一切行动的独占合法性。在这种逻辑下，任何未经国家授权的自主行动，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因为它打破了“只有国家才能组织、动员、定义‘善行’”的叙事。它恐惧的不是救援失败，而是来自民间的救援成功。任何未经国家授权的成功，都在无声地拆穿“全能政府”的神话。它必须垄断一切公共意义的定义权：只有国家才是“救世主”，民间只能是感恩的配角。极权恐惧公民发现自己无需等待指令也能有效行动，这等于在无声宣告——国家并非不可或缺；恐惧独立组织成为未来可能挑战权威的种子。因此，它必须把一切自主行为拖入审批的铁笼，用“程序正义”之名扼杀实质正义。

它不允许任何事实挑战官方叙事。灾情紧急，国家可能因信息迟滞、官僚拖沓而反应缓慢，但民间绝不能“抢跑”。因为“抢跑”本身就是拆穿全能神话。极权需要持续制造“没有国家就没有一切”的幻觉，因此它宁可牺牲部分生命，也要维护叙事垄断。拍摄视频、接受采访，更是双重罪过——它让公众看到了“民间先于国家”的画面，这是极权宣传机器绝不能容忍的“视觉异端”。奥威尔在《1984》中描写的“真理部”在此复活：现实必须服从权力需要，善必须由权力定义，否则即为恶。

第二，极权国家致力于原子化社会，消灭公民社会。极权主义最深刻的操作，是系统性地摧毁中间组织和公民自组织能力。《极权主义的起源》深刻指出：极权政权通过恐怖与宣传，将个体从家庭、社团、教会等传统纽带中剥离，使他们成为孤立的“原子”，只能直接面

对全能国家。在这种结构下，独立救援队、志愿者组织、民间社团，都是潜在威胁。因为它们证明社会可以自我管理、自我修复。蓝天救援队事件正是这一逻辑的日常实践：不是救援本身有问题，而是“民间”二字有问题。它必须被警告、被撤回、被驯服，直至所有救援行动都变成国家机器的延伸。在极权体系中，独立社团是必须被驯服或取缔的对象。这与民主国家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在民主国家，公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衡与补充，而非附庸。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红十字会、民间搜救团队在灾后行动迅速，政府往往公开感谢并提供后勤支持。因为民主制度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公共善不是国家专利，公民拥有结社自由、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权利不是“恩赐”，而是天赋且受宪法保护。只要不违反法律，个人和组织就有权自主决定如何帮助同胞。政府可能事后评估、规范，但绝不会将“未报备”视为原罪，更不会将自发救援等同于“擅自行动”而惩罚。

第三，极权国家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它把人从目的贬低为工具。古典极权通过公开恐怖实现控制，当代极权则更精巧：通过无处不在的审批、监控、警告和自我审查，制造普遍的恐惧与自我阉割。志愿者不再问“如何救人最有效”，而是先问“是否合规”。善良变得危险，勇敢变得可疑，人性中最光辉的利他冲动被逐步磨灭。更深刻的是，这种逻辑正在制造整个社会的道德萎缩与人性异化。当救人必须先“请示”，当志愿者担心被追责而选择观望，公民责任感便被逐步阉割。久而久之，社会将只剩下两种人：冷漠的看客与等待指令的机器。这不是管理智慧，而是对民族生命力的慢性谋杀。

这一事件暴露了极权国家的行为逻辑：它不是在保护灾民，而是在保护自身脆弱的权威；它不是在服务人民，而是在阉割人民成为真正的人。当“私自救人”成为需要道歉的行为时，这个制度已与人性为敌。它正在把我们拖向道德荒漠与能力废墟。私自救援不是罪，极权政治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罪。

编辑：Gloria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对结构性纠错能力的再一次碰撞

作者：陈树庆

中国自古就有“知耻近乎勇”的知错、认错、改错评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也是去弊图存的变革道理。但实际上很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事情之所以“知易行难”，往往是因为遇到了难以触动的“结构性”问题，直白一点说，就是关乎既得利益格局的“体制性”问题。兴利除弊，在成熟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于大局基本稳定中动态实现；中国古代遇上明君贤臣，也可以上下一心通过“变法”、“维新”来艰难完成；但碰到了权力傲慢、贪得无厌、社会信用崩塌的末世，代价巨大的“革命”或者说“改朝换代”就成了别无选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说，不怕社会不够完美，不怕人、或组织、或机构会有错误，纠错能力的建立与维护，成了社会治理能力最重要标志之一。

记得我在办理自己退休资格与核定养老金计费年限时，曾经跟拱墅区人社局负责社保的工作人员多次提及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已批准国际公约，但得到的是毫不在意、轻飘飘的一句回应“你扯远了！”。此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想，阻碍法律有效实施、妨碍建设法治政府最危险的不是执法者不懂法律，而是他们把一套环境里习惯了的、不会自我纠错、毋庸置疑的权力傲慢地当成了永恒不变的铁律。发生在我陈树庆身上的孤立行政事件，可以看出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其实施的脱节与不连贯，这不仅是一种结构性问题，还牵涉到所有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认知惯性。可见其难度之大，要改变这种局面，仅仅通过一两个案件的碰撞，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但唯有通过不断地碰撞、才有改变的希望。因为行政失信让我一再成为弊政的受害者，同时也让我有幸成为挑战弊政“顽石”的鸡蛋，不妨让“鸡蛋碰石头”，再去碰它一次：

《请求浙江省司法厅指导清理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函》

浙江省司法厅：

请求人陈树庆，男，浙江省杭州市人，现住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五苑6幢5单元202室，身份证号330106196509260073，联系电话15958160478。

请求事项：

请求浙江省司法厅指导清理制作日期是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的《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浙人社函[2010]358号-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以下简称《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

请求理由：

一、请求事项属于浙江省司法厅职责范围。

根据浙江省司法厅网站（<https://sft.zj.gov.cn/>首页>组织架构>职能简介）所公开的政府信息显示，浙江省司法厅的机构职能共有（十六）项。除了“（一）承担全面依法治省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省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外，其中第（四）项还规定“指导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二、本请求事项与请求人有切身利益关系。

如果说请求人陈树庆是本请求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更确切地说陈树庆是《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的受害人，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请求人陈树庆于2025年12月25日已满60周岁3个月，实际已缴社会保险统筹24年4个月，超过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在2025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时，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事人员以陈树庆于2007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和2016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6个月为由，将社保缴费年限扣除两项刑期累加年限剩余缴费仅9年多，已不足最低缴费年限，拒不办理原告的退休手续。

再三交涉中，陈树庆不满拱墅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停留在口头上含糊其辞的“根据相关政策”，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25年12月25日该局工作人员陈祖朋在其办公室向原告出具《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以下简称《告知单》）、《告知书》及《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书面正式确认拒不办理陈树庆退休手续的决定。

其中《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被劳动教养人员（以下简称“服刑在教人员”），其被羁押和在监所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以下简称“服刑在教期间”），不能以城镇个体劳动者身份参加或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拱墅区人社局以上述《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

件》的规定，作为支持其拒不办理陈树庆退休手续《告知单》、《告知书》的重要依据之一。

陈树庆认为前述文件所依据的法律适用不当、政策效力不足，于2026年1月27日就此事申请行政复议。2月5日陈树庆对《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申请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3月9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出《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反馈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附带审查处理意见的函》（以下简称《浙江省人社厅[2010]358号文件附带审查处理意见》），认定“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是对法律法规内容的具体操作性规定，并未突破或者违反上位法，内容合法有效”

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4月30日作出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复复[2026]67号维持被申请人即拱墅区人社局拒不办理陈树庆退休手续的前述《告知单》。同时附寄了《浙江省人社厅[2010]358号文件附带审查处理意见》。陈树庆不服，现就此案已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浙江省人社厅[2010]358号文件附带审查处理意见》避重就轻、没有针对性地回答与解决陈树庆在行政复议中申请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中提出《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的不合法问题。具体包括：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7年10月27日签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1年2月28日批准的已经具备法律效力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规定。申请人陈树庆认为，“服刑在教人员”并不因为服刑或劳教而变得不是“人”，从而丧失了“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基本人权。因此《浙人社函[2010]358号》因为与已经具备法律效力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相抵触，《浙江省人社厅[2010]358号文件附带审查处理意见》所总结的“综上，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是对法律法规内容的具体操作性规定，并未突破或者违反上位法，内容合法有效”也显然无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规定，应该审定为违法而无效，故建议有权处理机关对此类在新的时代已经明显过时且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及时清理与废除。

（二）请求人认真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上述两项法律及一项地方性法规，里面并没有任何条文里有《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所言的“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被劳动教养人员（以下简称‘服刑在教人员’），其被羁押和在监所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以下简称‘服刑在教期间’）不能

以城镇个体劳动者身份参加或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之规定。申请人陈树庆认为，政府机关无论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对法律的理解或解释，如果可以超越法律白纸黑字的明确内涵而无中生有出任何内容并声称该内容是根据《某某》、《某某》等法律的规定，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可以这样，法律作为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手段，要将政府权力关进笼子就会形同虚设；而政府机关利用自己摆脱了法律文字的限制而不着边际的理解或诠释包括政策，反倒可以随时随刻去捆绑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不仅从根本上掏空与损害了法律的规则确定性，也显然与与法治社会的初衷包括立法“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初衷背道而驰。

本请求人陈树庆认为，若有确实需要也合情合理的行政管理措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或者规定得不够完善的，除非紧急情况（如战争、灾害等）确保正当动机的不得已处置行为，在其他任何情形都切莫以所谓“政策”的形式擅自超越并滥用法律，而是应该通过合法程序启动相关立法提案或修改法律的建议，同时继续严格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底线。

（三）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1957年8月1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实施50多年后被依法废止。劳动教养都已经废除十几年了，但包含劳动教养内容的《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还不合时宜地被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援引及适用，显然根据现行有效法律的要求，《浙人社函[2010]358号》也是必须与时俱进尽快予以清理、废除的。

（四）20多年来，陈树庆、其家属、其工作或社保挂靠的单位替陈树庆缴纳社会保险，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明确告知，甚至2025年3月10日原最后一次刑满释放后，到拱墅区人社局设在拱墅区香积寺东路58号的政务服务中心几次补缴中间断交的最近几年（包括部分刑期内的期间）社保费用也都顺利完成。政府社保管理机构收取保险缴费的时候堂而皇之，现在要社保机构履行保险责任的时候，突然变卦，以这种“依申请公开”《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来为政府的社保机构失信撒赖做依据，让缴费人本案原告陈树庆单方面承担所谓“违规”的不利后果，使得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为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荡然无存。

早在两千多年前，先贤孔子《论语·尧曰》就写道：“不教而诛谓之虐。”现代文明社会基于“法无德不立”的精神，只要是对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依法要加以限制或惩罚性制裁的内容，无论是具体条款还是整部法律，都遵循了“不溯既往”、“法未公布不生效”的基本原则。《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标注为（此件依申请公开），当然，依申请公开不等于公布。《浙人社函[2010]358号》虽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

法律地位及效力，但也涉及广泛人员权利义务，这种“依申请公开”的规定，在未被申请公开前让利害相关人茫然无知，本案申请人也是在近几个月办理退休手续时多次交涉索取无果的情况下向拱墅区人社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才得到的。

这种若隐若现的“依申请公开”政策形式，就为胥吏弄权甚至寻租提供了手段与机会，而胥吏弄权尾大不掉，恰恰又是我国历史数千年以来善政难以落实或不能持久、而弊政却积重难返、各朝代走向衰败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申请人认为，政务活动中的“依申请公开”只能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中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息，限于向有利害关系也依法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员依申请公开。至于抽象行政行为，希望各级国家机关在今后制定规范性文件时，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内部执行不公开也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外部相对人，其它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应该向立法学习而公开发布。所以申请人不仅请求在本案清理与废除这个“依申请公开”的《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还恳请彻底杜绝“依申请公开”形式的任何规范性文件再次出现。

(五)《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服刑在教期间仍以城镇个体劳动者身份参保的，要及时清理。其服刑在教期间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可以暂时保留在社保经办机构，用以冲抵以后参保年度应缴纳或延缴的费用，也可一次性退还本人。”该条款在《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第一条的基础上，因其内容与“政府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民众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原理背道而驰，实践中并没有制止社保经办机构一如既往地收取参保人员服刑在教期间缴纳养老保险费，但在参保人员正式办理或享受按照实际缴费年限核定退休金时，为社保经办机构简单粗暴的“言而无信、约而不守”预备了背书，本案陈树庆就是这种行政失信行为的典型受害者之一。

综上，《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明确违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早在2001年2月28日已经批准的具备法律效力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规定；以“对法律法规内容的具体操作性规定”的形式擅自添加了“法无明确禁止”的禁止内容；已经明确地不再适应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后的现行法律环境；以“依申请公开的”的形式破坏了现代法治社会对于规则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其具体内容在操作效果上替社保经办机构的行政失信预备了背书，严重损害了民众对于法律、对于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有如此之多明显弊端的内部政策，如果任其继续存在并有效，且政策制定机关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不仅有碍于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持续

失信中势必会导致政治信用的过度透支，社会信用结构持续腐蚀，最终一步一步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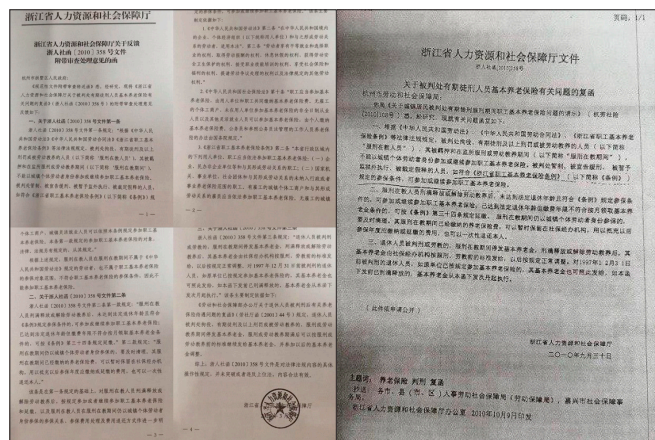
因为本请求人陈树庆相信浙江省司法厅领导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感（职责担当，绝不畏难躺平）与履职能力，故向贵厅递交此《请求浙江省司法厅指导清理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函》。

此致
敬礼！

请求人：陈树庆
2026年5月29日

附：

- 一、请求人陈树庆身份证复印件（含正反两面）1份；
- 二、《浙人社函[2010]358号文件》复印件1份；
- 三、《浙江省人社厅[2010]358号文件附带审查处理意见》1份。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Collision With Structural Self Correction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examines Chen Shuqing's challenge to a Zhejiang pension policy that excludes prison terms from social insurance calculations. It argues the regulation conflicts with higher level law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commitments, legal transparency, and public trust, while exposing weak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and limited institutional self correction in China's pens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broader rule of law practice today nationall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极权主义现象之一

——责任不一致

作者：张兴贵



在极权主义的幽暗殿堂之中，最具腐蚀性的幽灵之一，便是“权责不一致”。这并非简单的治理失衡，而是一种深层结构性存在：权力如脱缰的狂龙，肆意吞噬疆域、资源与生命，却将一切后果的阴影，悄然转嫁给虚空的“组织”、抽象的“历史”、无名的“敌人”。

极权主义之“极”，在于权力向单一中心的绝对聚拢。它摧毁一切中介——议会、司法、教会、家族、公民社团——使权力链条化为单向的、冰冷的命令瀑布。

正是这种“全面控制”本身，直接决定了权责必然不一致。“全面控制”要求权力无限集中，领袖、党被神化为永远正确、不可质疑的化身。权力被绝对化，责任被豁免，否则权力的永远正确将经受考验。因此，任何失败、灾难或暴行都可归咎于“阶级敌人”“外部势力”“执行偏差”“历史必然代价”，而非决策者本身。

要实现“全面控制”，必须依赖庞大、层层叠叠的官僚-政党机器。极权官僚制是“无人统治”——每个人都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齿轮”，责任被无限扩散。顶层下达模糊或极端指令，中间层“领会精神”，基层具体执行。出问题时，谁都可说“我只是服从命令、按规定办”。这不是漏洞，而是特色——只有通过“责任稀释”，才能维持机器的无阻力运转。如果引入明确权责对等，就会产生制衡、个人判断和阻力，违背“全面控制”的定义。

与此相对，古典宪政文明始终坚守“权责一体”的铁律：权力源于委托，责任随权力而增。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皆以制度之网，将掌权者缚于后果的枷锁之上。然在极权体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历史必然性”与“意识形态纯洁性”，责任则被“党性”“路线”“大局”等宏大叙事悄然溶解。决策者可一夜之间改写现实，却永不必为现实的残骸承担血肉之痛。

二十世纪的惨痛实验，已将此逻辑昭示无遗。大清洗中的斯大林，可将数百万忠诚的布尔什维克送上断头台，而后以“肃清叛徒”的名义洗刷自身；大跃进的狂飙中，“人定胜天”的豪言层层加码，最终铸成人类历史上

最惨烈的和平时期的饥荒。无数基层干部因无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家破人亡，高层却能将悲剧轻描淡写为“自然灾害”与“右倾错误”。权力在此完成了惊人的炼金术：成功归于英明，失败归于他人，责任永不归于己。

权责不一致如慢性毒药，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血管。在经济领域，它孕育出系统性的狂妄与低效。计划者手握全局，却无需为资源错配与人性无知付出代价，于是浮夸风、瞎指挥、重复建设层出不穷。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留下了荒芜的荒原与毒化的湖泊；中国的“大跃进”则以数千万亡魂，证明了无责任权力的毁灭能量。在人道维度，它制造了冷酷的规模化暴行。掌权者远离苦难现场，坚信“为崇高目标牺牲少数”是必要的数学题。于是古拉格、批斗场、劳改营，纷纷成为权力实验的祭坛。受害者不仅失去自由，更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最后尊严——他们甚至无法获得“敌人”应有的承认，而只是“历史尘埃”。在灵魂层面，它完成了对人性的最深阉割。社会原子化之下，个体学会明哲保身，官员学会“宁左勿右”，知识分子学会三缄其口。阿伦特所言的“平庸之恶”在此盛开：无数普通人参与暴行，却以“我只是服从命令”为自己开脱。责任感的普遍缺失，最终令整个民族陷入道德麻木与精神荒原。

唯有当每一位握有权力者，都必须直面自己决策的血肉后果时，权力才可能从暴君的权杖回归为仆人的灯火。极权主义的历史警示我们：一个无需负责的权力，最终必将吞噬它所统治的一切，包括它自身。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美工：胡海宁

One Manifestation of Totalitarianism: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s a defining feature of totalitarian systems. Drawing on examples including Stalinist purges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t argues that concentrated authority diffuses accountability through bureaucratic hierarchies, enabling leaders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for policy failures, economic disasters,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The article contrasts this model with constitutional democracies, where legal constraints, public oversight, and institutional checks seek to align power with accountabil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极权主义现象之二

——人的潜力未能开发使用

作者：张兴贵

极权主义以“整体高于个体”“历史必然性高于个人意志”为元叙事，通过垄断现实解释权、解构自主主体性、重建全控社会结构，将人从目的性存在降格为工具。极权主义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以国家或领袖的名义，垄断真理、控制思想、统一行动，悄无声息地笼罩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上，最终把鲜活的个体变成可替换的螺丝钉。在这样的体制下，人的潜力——那本应如星辰般璀璨的创造力、批判力与自我实现的能力，被系统地压制、扭曲甚至扼杀。

首先，极权主义通过思想控制切断了潜力释放的源头。极权国家往往建立严密的意识形态机器，从学校到媒体，从家庭到职场，一切信息都必须服务于官方叙事。孩子从小被教导“只有一种正确思想”，质疑成为原罪，独立思考被视为危险。想象一下，当爱因斯坦式的好奇心被贴上“资产阶级腐朽”的标签，当乔布斯式的创新被斥为“个人主义冒头”，当无数年轻人把毕生精力用于背诵教条而非探索未知，人类的智力宝藏还有多少能被开采？历史早已给出答案：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李森科伪科学横行，遗传学被禁止，农业灾难不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打倒，大学停课，十年浩劫让整整一代人的潜力化为乌有。思想的牢笼，比任何物质枷锁都更牢固，它让天才变成庸人。

其次，极权主义通过恐惧与监视摧毁了潜力释放的勇气。极权统治的核心是“原子化”个体，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监视、随时可能被举报的恐惧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冒险、创新、表达真实自我都成了高风险行为。谁敢提出不同意见？谁敢挑战权威？谁敢在实验中承认失败？结果是普遍的“表演型人格”——表面忠诚，内心麻木；公开服从，私下消极。心理学研究表明，内在动机（兴趣、胜任、关系）是潜力释放的燃料，而外在高压则引发“习得性无助”。人的潜力需要安全感、需要试错空间、需要失败的权利，而极权主义恰恰剥夺了这一切。当每一次创新都可能被解读为“政治不正确”，当失败不再是学习机会而是政治污点时，个体就会主动降低抱负水平，转向“防御性生存策略”。它培养的不是开拓者，而是生存者；不是创造者，而是顺从者。

再次，极权主义通过资源垄断和机会封闭堵死了潜力释放的通道。在自由社会，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足够努力，就有可能通过市场、教育和个人努力实现阶层流动，释放潜力。但在极权体制下，资源高度集中于权力核心，机会分配取决于政治忠诚而非能力与贡献。“关系”取代“能力”，“站队”取代“实力”。大量人才被埋在基层、农场，而那些善于逢迎、毫无创见的人却

占据高位。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把社会的活力一点点榨干。经济学家曾指出，极权国家的长期增长往往依赖粗放型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一旦这些红利耗尽，创新乏力就会暴露无遗。反观开放社会，美国硅谷聚集了全球天才，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活力也曾让无数草根实现梦想，这些都证明：只有当个体拥有选择权、流动权和产权保护时，潜力才会如泉水般喷涌。

最后，极权主义扭曲了人性的内在驱动力。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自我实现处于金字塔顶端，需要底层的安全、尊重与归属作为基础。而极权主义恰恰颠倒了这一切：它把“对领袖的忠诚”置于一切之上，把个体价值贬低为“螺丝钉”。极权主义在资源配置上的机制是“忠诚筛选取代能力竞争”。在市场与法治社会，价格信号、契约自由与产权保护构成“发现程序”，让潜力较高者获得更多资源，形成正向循环。而在极权体制下，分配权高度集中于官僚体系，筛选标准是“政治可靠度”。这造成双重扭曲：一是“逆向淘汰”：勇于创新、独立思考者因“风险高”而被边缘化；善于表演忠诚、规避责任者反而占据关键节点。二是“信号扭曲”：个体不再投资于真实能力建设，而是投资于“展示忠诚”的信号博弈。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内耗式政治学习、无效会议和虚假绩效上。当一个人把毕生精力用于证明自己“政治正确”而非追求真理，当他把幸福定义为“被组织认可”而非内心满足，他的潜力就已经被异化。鲁迅若活在言论铁幕下，或许只能写些应景的颂歌。天才尚且如此，普通人又怎能例外？

极权主义看似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它办成的“大”事，往往服务于权力自我维系，而非人类潜力的普遍绽放。它在短期内可能制造动员奇迹，却在长期付出创造力枯竭、社会僵化与道德退化的代价。无数案例证明：当人被当作螺丝钉拧紧时，机器本身也终将生锈，最终是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与历史性失败。当被压抑的潜力积累到临界点，或外部竞争压力增大时，系统要么通过剧烈崩溃释放，要么被迫有限开放。但代价已经付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命潜能可能在沉默中耗尽，文明之火黯淡。

极权主义对人的潜力的扼杀，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悲剧。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靠控制人，而是靠解放人。唯有当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思想、勇敢地创造、真实地联结，文明之火才能代代相传。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追寻文明的郑酋午

作者：郑酋午

从读大学有了公民权利意识之后，我一直都在追寻文明。我理解的文明是四必须：1、必须有公平正义，2、必须公民在法律上平等，3、必须有效遏制腐败，4、必须有个人自由。而要做到如此，从人类治理几千年的经验看，只有宪政才能提供。我从大学毕业后到现在一直在努力在坚持宪政的梦想。

我1959年出生于海南三亚，十五岁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去农场干农活。1976年有幸参加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在其间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所主管的生产队，有一个农民右派，一天晚上全家七口人食物中毒，由于事情紧迫，没有向工作队长汇报，自己就决定联系当地国营农场车队派出一辆解放牌车，拉右派全家去公社卫生院治疗，全家人的“狗命”被救下了。这本是一件好事，本应表扬，但出乎意料的是，工作队长在全体队员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我。当时工作队长的认识是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受批评后，我感觉到，这是人人都应拥有的同情心，不应被批，当然，这个感觉跟当时的阶级斗争氛围不合。

我1982年毕业于华南师大中文系。在读大学期间，受魏京生《探索》中的文章《第五个现代化》影响，开始思考政治问题。同时，广泛阅读所谓的禁书。我读书的图书馆，最高一层都是禁书集中地。这要由授课教师出证明系主任签字才可以借阅。我多次进出，读了《圣经》和孙文的《三民主义》。我现在还记得，三民主义封面上有蒋中正的宣扬主义的题词。

读了魏京生的文章和学校的禁书，思想有很大的转变，认为暴力、革命和专政不是文明人该过的生活，更应该提倡的是公民、选举、反对党、权力分立、司法独立、个人自由和非暴力。思维有转变，视野突然开阔，由于年轻，血气方刚，在大学时经常跟同学和上课教师辩论，给大家的感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毕业鉴定里就有该学生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当时，不仅喜欢辩论，还喜欢寻找有共同认识的学生组织社团，比如震旦学社。当时每一两个月就进行交流，力图改变社会。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海南通什师范教书；教书期间组织华师大通什交友会，同时，跟全国各地异议人士联系，企图组织全国政治社团。当时，写了十多篇文章，比如持不同政见者宣言、改革方向，等等。1982年寒假，到广州、上海、杭州、重庆、贵阳等地联络朋友，

准备成立政治反对派。1982年底回来海南途中被抓，1983年上半年被以反革命罪（组织集团罪和煽动罪）判处十四年（数罪并罚加限制）。坐牢的监狱先是在广东坪石监狱（对外是罗家渡煤矿）机械厂，我的工作是在开机床。一九九零年后，集中于广东怀集监狱。在怀集监狱是单独关押，当时我们四人王希哲、刘青山、何求和我是分别从不同监狱调来集中于此的。每人单独一个空间，里面有睡觉、洗澡以及活动场所。我跟他们交流都是爬上窗口进行。他们当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王希哲是毛主义理论家、刘青山是托派国际香港支部的宣传部长。只有我是民主法治人士，相互辩论，甚至对怼。在监狱的干警中，除一个指导员和一个管教外，都是年纪较大的人，他们特别恨民主自由人士。多次看病，他们都经常在医生开的药上动手脚，比如医生开三种药，他们就送两种。有一次看病，我乘他们不注意，叫医生开三种药，医生点头，但送进来的是两种。虽然都是小病，吃不吃药都不会死人，但通过此件事情可以看出他们多么仇恨民主自由人士，他们内心多么丑陋。他们中还有一个是我的海南老乡，有一次送饭并送药，我感觉不对，就用饭碗打他他躲开了。因为单独关押，很少有机会说话，其他三人由都是极左派人士，三观不一致，说话也没有力气，担心刑期长坐久了出狱不会讲话。我就用现有资料朗读文章，声音很大，值班的干警怒气冲冲冲进来说，你以后出去还要到大街上煽动吗？我立刻顶回去，邓小平文选读不得吗？并翻手中书名给他看，他一看是邓小平文选就没有再说什么。

大约是1992年，在海南建省后，父母经过努力，我被转移回海南监狱。这里没有单独关押，而是放在一个中队劳动，主要是编椰子扫把。在海南监狱伙食比较好，离家近，父母每月都送钱送食品。基本没有大的问题，但发生一件小事。有一次去看病，卫生所长跟我开药，我错误以为，开的药不对，我便随口说一句，医生应该有医德。现在想来，是我不对，但当时不这样看。我回中队后，指导员把我找去医务所（卫生所在监狱中）要求我向所长道歉。我不肯，被中队指导员打了一巴掌。

1996年刑满释放，父母户口在海南文昌市，所以回来文昌落户。起初做小生意，后来来到一家小型房地产公司打工，做到副总经理。同时，努力学习，1999年考上私立学校当老师。当老师一年后到琼海一所私立学校应聘校长。这是一所完全中学，也兼办职业中专。

2003年我离开海南到湖南省长沙市一所私立学校任教。在湖南我认识民主党湖南主委谢长发，还有几个异议人士。经常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在我的印象中，谢长发是一位领袖型的人才，既有理论也有实际操作能力（可惜的是生不逢国不逢时，后来他被判了十三年）。一年后，我到深圳市清华实验参加考试，考上高中部语文教师，当时参加考试的有来自全国的教师和教授近两百人。

在深圳清华实验工作了六年，在深圳认识了赵达功、赖锦东、郭永丰、任铭、张津郡和李铁等异议人士，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印象中任铭喜欢组织活动，赖锦东和郭永丰是神学家和传道人。我也经常跟任铭到广州参加活动，在广州认识了唐荆陵、赵卫红赵卫东兄弟俩、刘士辉、郭飞雄、刘远东等异议人士。印象中，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属于高水平人士，未来的各路领袖。由于在广州和深圳频繁活动，于2012年被深圳国保赶出深圳。

在深圳的六年，我除了参加异议人士的活动外，还勤于写作。写了三本书和数百篇文章。引用深度求索的ai讲的话即是如此。“根据公开信息，郑酋午先生是一位活跃的思想评论者，其公开经历主要围绕学术著作发表与时事评论展开：

- 学术著作者：著有《社会进程》、《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和《试问未来，“谁”主沉浮》三部专著。

- 文章发表者：在国内多家媒体和机构平台发表了数百篇文章。例如在期刊《教书育人》发表过《学校管理与探究式教学》；在“爱思想网”发表过《现代文明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等数十篇文章；在山东政法学院文化中心发表过《圣经文化与中华儒学》；在“宣讲家网”也发表过相关文章。

- 思想家/时评人：媒体曾将其描述为“中国新时代的思想家”。

- 观点输出者：其文章议题涵盖文化、哲学、教育等领域，如探讨中华儒学与圣经文化、作者张维迎教授观点，以及发表《人究竟是什么？》等哲学思考。”

被国保赶出深圳回家休养后，我又去北京一家出版公司任编辑（副总编兼创作部主任）。在北京有幸认识查建国、李海、何德普、扬子立等等十几个人。他们都是大才。当时中共任命新领袖，对异议人士严加管理。海南省国保打电话叫我回海南，我不理会，他们就抓了

我爱人然后逼我爱人在口供上签字，拿着这个签字申请抓捕令，派七人到大陆抓捕我。我当时到杭州办理业务，他们到杭州后四处找我。我关闭手机，在朋友帮助下，躲到一个旅馆里。6月3日，他们已经知道我在旅馆，我便离开，到了西湖（不是杭州西湖）躲闪。我在一个小亭子里过夜，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后不久被七人围住，他们抓捕完成，用飞机送回海南关押。一共关押六个月，罪名从非法经营罪到销售有毒有害产品罪。后取保候审，一年后公安送材料到海南检察院，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我一共到杭州三次，第一次是1982年底，第二次是2012年，第三次是2013年。我在杭州结识许多异议人士，徐光、吴义龙、来金彪等十多人，他们都是民主党人。我印象中，杭州民主党充满活力，人才济济。认识杭州民主党人是我这一生中的荣幸。

回海南后，一直受到监视，无法离岛外出。在海南有幸结识六十多位异议人士，经常参加岛内旅游和聚餐活动。在海南有一位老师叫吴孔大，因在厕所墙上写打倒某某和在脸上发言被判煽动罪三年半。吴老师理念清晰、品行端正、勇敢坚毅，是海南省的人才。我从被抓回在海南这些年也经常写一些文字，大约有百来篇文章发表于重庆西文主编的佳作上。由于手机受监控，西文的佳作寄来我处，国保企图搜查。今年三月的一天，公安、城管和宣传部上午派人来我家要搜查，由于没有搜查令，我坚决不让他们进屋，下午公安国保拿搜查证来但没有局长签字，我也不让他们进屋。这是我的权利，不希望被非法剥夺。

现在我已经六十七岁了，宪政理想还没有实现，从坐牢以来，一生总是不顺，困苦多艰，生不逢时。这一生已经时日无多，如果进地下之前，能够看到宪政落实，文明到来，也就死而无憾了。人生其实就是过客，每一个人都要走向死亡，现在的我，回顾过去，虽然不幸，但绝不后悔。如果还有来生，我也一定不断追寻文明。

2026年5月8日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勿忘六四 37 周年

千古罪人 六四屠夫—邓小平

作者：陈森锋



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也最惨痛的历史转折之一。

那一年，中国本来有机会走向更开放、更文明、更接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学生走上街头，市民走上街头，他们提出的不是暴力对抗，也不是颠覆国家，而是反腐败、要自由、要新闻开放、要政治改革，要求政府正面回应人民的声音。

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中共最高实际掌权者邓小平没有选择对话，没有选择尊重民意，而是把和平请愿定性为“动乱”，最后用军队、坦克和实弹，把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希望碾碎在北京街头。

这就是邓小平在六四中的历史角色：他不是旁观者，不是被蒙蔽者，不是事后才知道的人，而是最高政治拍板者，是武力镇压的最高责任人

胡耀邦去世后，学生自发悼念，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的民主诉求。学生要求反腐败、反官倒、新闻自由、政治改革。这些要求放在任何正常国家，都是政府应该认真面对的问题。可是中共政权面对人民最基本的政治诉求，第一反应不是反省，而是恐惧。

4月25日前后，李鹏、杨尚昆等人向邓小平汇报学生运动情况。邓小平没有把学生看成国家未来的一代青年，没有把民众的愤怒看成社会矛盾的警钟，而是把这场运动上升到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随后，《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这一步极其关键。

一旦把学生说成“动乱”，就等于为下一步镇压制造政治借口。中共最惯用的手法，就是先在舆论上把人民污名化，再在行动上对人民下重手。邓小平在六四问题上的第一大罪，就是亲手推动了这种政治定性，把一场爱国、反腐、要求民主改革的群众运动，污蔑成威胁政权的敌对行动。

这不是简单的判断失误，这是独裁者面对人民觉醒

时的本能反应。

到了5月，学生绝食，天安门广场聚集大量学生、市民和声援者。北京街头不是暴乱现场，而是一个民族在沉默多年后终于发出的政治呐喊。很多人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希望中国不要继续在专制、腐败、特权和谎言中沉沦。

当时中共内部并非没有另一种选择。赵紫阳主张缓和局势，主张对话，反对用暴力解决问题。可是邓小平不接受这条路。作为中共最高实际掌权者，他最终选择站在强硬派一边，选择戒严，选择调动军队，选择用枪口对准人民。

5月17日前后，关于是否戒严、是否调军队进京的决定，在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主导下形成。5月20日，北京正式戒严。这个决定标志着中共已经不再把学生和市民当作可以沟通的人民，而是当作必须压服的对象。

戒严之后，军队第一次进京受阻。大量北京市民拦住军车，给士兵送水、讲道理，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那一幕说明，当时站出来的不只是学生，而是整个城市的良知。北京市民用身体挡住军队，不是为了制造动乱，而是为了保护学生，为了阻止国家机器对人民开枪。

可是邓小平没有因此回头。

他没有问一句：为什么这么多市民愿意冒险保护学生？

他没有问一句：中国人民为什么会如此不满？

他没有问一句：一个执政党如果要靠军队才能面对青年学生，这个政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选择的是继续调兵，继续加压，继续把事情推向流血结局。

6月2日前后，清场的最后决定形成。随后，大批戒严部队向北京城内推进。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枪声响起，坦克开进城市，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火。长安街、木樨地、西单、天安门周边，许多普通人倒在枪口之下。有人只是围观，有人只是劝阻，有人只是想救人，有人只是站在街头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们面对的是国家军队，是本应保卫人民的军队。可是那一夜，人民解放军成了镇压人民的工具。枪口没有对准外敌，而是对准自己的学生、市民和纳税人。

这是六四最大的罪恶。

更可耻的是，六四之后，邓小平没有认错，没有道歉，没有追责镇压者，反而公开接见戒严部队，称他们经受住了“考验”，继续把人民的抗争污蔑为“反革命暴乱”。他悼念的是执行镇压的一方，而不是被打死、被

碾压、被追捕、被判刑的普通中国人。

这说明邓小平不是一时误判，而是从头到尾都站在独裁政权一边。他关心的不是人民生命，不是国家未来，不是中国是否能走向民主文明，而是中共政权是否能继续稳固。

有人说邓小平推动了改革开放，因此不能仅以六四评价其历史地位。这种说法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经济改革不能抵消屠杀人民的罪行。一个人即使推动过经济发展，也没有权力下令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高速公路、工厂、外资、GDP，都不能洗白天安门前后的血。

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制度结果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在一党专政、没有民主监督、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的体制下，最容易先富起来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掌握政策、资源、土地、金融和审批权的权贵集团。所谓“先富带后富”，最后变成了权贵先富、官商勾结、红色家族和白手套转移财富，普通百姓却长期承受高房价、低工资、债务、失业和社会保障不足的压力。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邓小平先用坦克镇压人民争取民主的权利，再用经济发展给人民画饼：你们不要政治权利，只要安心赚钱就行。可是人民没有政治权利，怎么保障自己的财富权利？没有选票，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法院，没有真正的宪政法治，人民所谓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权力夺走。独裁体制下，人的生命都不真正属于自己，财富又怎么可能真正属于自己？

所以，邓小平留下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党国控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不是共同富裕，而是特权集团先富、普通人民被收割；不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道路，而是用经济增长掩盖政治奴役的专制模式。

六四不只是一次屠杀，也是一场历史路线的终结。

邓小平毁掉的，不只是1989年那一代学生的生命和命运，也毁掉了中国和平转型的重大机会。如果当时中共选择对话、选择让步、选择政治改革，中国完全可能走向另一条道路：新闻可以逐步开放，权力可以逐步受到监督，腐败可以被制度约束，人民可以有真正的政治参与。

可是邓小平选择了坦克。

他用枪声告诉中国人：共产党可以改革经济，但绝不允许人民分享政治权力；共产党可以谈开放，但权力一旦受到挑战，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人。

这就是邓小平留给中国的真正政治遗产。

六四之后，中共用谎言封锁真相，用审查删除记忆，用监控压制纪念，用恐惧迫使人民沉默。遇难者家属几十年不能公开悼念，幸存者长期被监控，流亡者无法回国，年轻一代在墙内甚至不知道1989年北京发生过什么。

一个政权连遇难者名字都害怕，说明它知道自己有罪。一个政府连蜡烛、鲜花、纪念日都要封杀，说明它

的统治建立在血债和谎言之上。

邓小平在六四中的罪责，不能因为时间流逝而被淡化，也不能因为中共宣传机器长期洗地而被改写。他不是所谓“伟人晚年犯错”，而是在关键历史时刻选择用军队镇压人民的独裁者。他亲手把中国从可能的政治改革道路上拖回专制轨道，把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诉求变成血流成河的国家罪案。

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是不可饶恕的罪。用坦克碾碎人民追求自由的希望，是不可饶恕的罪。

事后继续污蔑死难者、赞扬镇压者，更是不可饶恕的罪。

六四是中共永远洗不掉的血债。邓小平作为最高拍板者，必须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他不是中国民主的改革者，而是中国民主机会的毁灭者。

他不是所谓民族功臣，而是镇压人民的民族败类。他不是值得纪念的伟人，而是六四屠夫、千古罪人。

历史可以被中共暂时封锁，但不可能永远被埋葬。死难者的名字终有一天会被公开记住，屠杀者的责任终有一天会被追究。六四不是过去式，而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真相。

忘记六四，就是纵容屠杀。

美化邓小平，就是侮辱死难者。

只要天安门的血债没有追责，邓小平“六四屠夫”的历史定性就永远不能改变。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Never Forget June Fourth, 37 Years Later: Deng Xiaoping as the Butcher of June Fourth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1989 Tiananmen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subsequent military crackdown, focusing on Deng Xiaoping's role as China's paramount leader and final decision mak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tudent demonstrators and supporting citizens sought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greater political openness, press freedom,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rather than violent confrontation or regime overthrow.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Deng rejected dialogue, endorsed the April Twenty-Six editorial labeling the movement as "turmoil," approved martial law, and authorized military intervention against unarmed civilians. The essay contends that the crackdown ended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gradual political reform and peaceful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China. It argues that subsequent economic growth cannot absolv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peaceful protester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preserving historical memory remains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改造术的民间授权

——从再教育到成长基地

作者：周敏



开颅手术后的张浩 -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事情刚刚发生在2026年5月，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的一名班主任，用木戒尺和空心铁杆打断了一个13岁男孩逃离的念头。戒尺打断就用铁棍接上，直到孩子跪到地上，教官认为他在装，继续用拳头打他的头和眼睛。孩子鼻血流在地上，在昏迷中原地躺了一夜，没人过问。

次日教官得知男孩右眼失明，用鸡蛋替他滚眼睛消肿。后经过了七小时开颅手术，右眼仍然无法视物。

这个案子的细节如此地触目惊心，足以引发又一轮循环：舆论愤慨、家长质问、官方表态，然后复归平静。但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愤慨里，而是进一步盘问：这个“认为孩子异常→强行隔离→强制矫正”的处理手法从何而来？其实，我们在别处见过它，还不止见过一次。

一、改造术的国家谱系

1957年，中国建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它的运作是简洁有效的：无需经过司法审判，公安机关即可将“轻微违法”或“思想有问题”的人关押长达四年，以教育改造之名。这套制度整整存续达五十六年，2013年才正式废除。

在五十六年里，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观念训练：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隔离是为了改造，改造是为了他好。

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施对象。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程，把家属动员进来，让亲情成为改造工具——如果你的孩子、父母来劝你放弃信仰，转化的成功率会更高。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强制寄宿，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开设思想转化课程，对外一律宣称是自愿参加的职业培训。强制隔离戒

毒所，将“成瘾”医学化，用治疗的名义完成人身控制。

这些国家机构的外壳各色不同，但内部结构出奇地一致：封闭空间、信息隔断、强制身份重塑、对外宣称是为当事人好。

宏志达的运营手册，和上述这些国家机构是一样的DNA。家长被告知六个月内不得探视，不得与孩子通话，只能通过班主任在微信群里发布的照片和视频了解孩子动态。孩子是被骗进基地的，以“配合调查电信诈骗案件”为由骗上车。基地对外宣称用专业方式和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孩子。

唯一的差别在于，宏志达是民营，改造孩子的授权来自家人。

二、杨永信的范本

中国民间改造术的形成，杨永信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

2000年代中期，网瘾成了中国最显眼的社会议题之一。媒体、专家、官员形成了一个罕见的共识联盟：网络游戏正在毁掉中国的下一代，必须干预。陶宏开、杨永信等人在这个背景下登场，获得媒体的大量正面报道。

杨永信的方法很简单——电击。他在山东临沂的精神科病房里，对被家长送来的青少年实施电击治疗，声称可以矫正网瘾，戒除不良习惯。病人描述电击时的感受是剧烈疼痛、全身抽搐。

2009年，央视《新闻调查》对此进行曝光，引发全国震动。然而有一个细节被很多报道忽略了：曝光后，相当数量的家长选择继续留下来，甚至对记者表示感谢。他们看到了“效果”——孩子变得顺从听话、不再反抗。

家长的选择比电击本身更引人深思。它说明，家长对这套逻辑的接受，并非被骗，而是主动认同。他们认同孩子需要被强制改造，笃信“痛苦是矫正的必要代价”，也认为封闭隔离是有效手段。

杨永信的机构撑到2016年才被叫停电击治疗，一部分原因是他依托的是正规精神科病房——国家医疗体制的背书，为他提供了持续的合法性外壳。这个外壳被撤除之后，电击停了，但强制封闭的模式本身，却保留下来，没有受到质疑。

杨永信证明了一件事：民间市场对这套改造逻辑，有真实而持续的需求。

三、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国家强制改造术的精神遗产，是它所确立的正当性：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和强制转化，痛苦是改造的合理代价。这套正当性一旦成为社会常识，民间就会主动复制。

医学术语被军事化语言改造了。治疗就是训练，病人成为学员，疗程变成了成长周期。这样一来，准入门槛被降低，绕开了卫生监管，同时保留了专业性的表象。

关键的一个变化是国家授权被家长授权替代。劳教需要公安机关的决定，精神科强制住院要医院和家属联署，而送孩子进成长基地，只要家长的签名和汇款就行了。授权链条被缩短到底，摩擦成本极低。

信息封锁则从国家管控手段变成了商业标准条款。六个月不得联系，这是张先生在付款前就已经知道并接受的条件。这俨然已是一种教育手法——孩子得和原有环境彻底切断，才能完成改造。

民间化的本质，就是去掉了官僚程序、文件审批，只保留了暴力内核，然后以市场价格售出。

四、国家的暧昧态度

宏志达案曝光后，阳新县教育局的回应值得读一读：涉事基地前身为某双语学校，现已注销，执照由市场监管局颁发，因此教育局没有监管职能。市场监管局被联系到后，工作人员回答“不知道”，直接挂断了电话。

为什么国家对这类机构的态度长期这么暧昧？

因为这类机构处理的，恰巧是国家也想处理的人群：不服管、偏离轨道的、让家庭和学校头疼的青少年。对他们进行关押隔离、强制他们服从，这套手法国家自己还在使用，只是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场所而已。

只打击成长基地的暴力手段，却不质疑强制封闭本身的性质，这是整治行动的局限所在。杨永信被叫停的仅仅是电击，并不是强制寄宿、信息封锁，也不是人身控制。这个边界的划定，本身就表达了政府的立场。

只要“问题人口可以被强制改造”的前提不被触动，成长基地就永远有它的生存土壤。换块牌子，换一个县，就可重新开张。

五、打人

张浩一个孩子在地上躺了一夜。疼痛冰凉的夜。

被狠狠打断的木尺、嗖嗖挥舞的空心铁棍，它们在空气中冷冽的回声是一套绵延数十年的改造术在民间的倒影——从国家的劳教所，到精神科病房，再到军事化训练营，里面慌张的面庞，一次比一次年轻、一群比一群懵懂。

我们谴责那个教官，对的；我们追问那个基地，也对。但如果追问就停到这儿，我们就让这套违背人性的操作链条滑走了——这链条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在宣

告，问题人口可以被关押，隔离可以产生改变，惩罚暴打是矫正的合理代价。

这条长长的锁链，它不从宏志达开始，也不会以宏志达结束。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Grassroots Authorization of Corrective Practices: From Reeducation to Growth Bas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buse of a thirteen year old boy at the Hongzhida Youth Growth Base in Hubei Province in May 2026 and uses the incident to explore the broader social and political logic behind China's culture of coercive correction. According to reports, the boy was severely beaten after attempting to escape and later lost vision in one eye despite emergency surger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public outrage over individual cases of ten overlooks the deeper question of why such institutions continue to exist and receive social acceptance.

The article trace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se practices to China's labor reeduc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in 1957 and abolished in 2013, which normalized the belief that individuals deemed problematic could be isolated and transformed for their own benefit. It argues that similar methods persist in compulsory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campaigns, and private youth correction camps.

The essa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psychiatrist Yang Yongxin, whose electroshock treatment program for teenagers diagnosed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during the 2000s. Despite public criticism, many parents continued to support coercive interventions because they associated obedience and conformity with successful treatment outcom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private growth bases have replaced state authorization with parental consent while preserving the core mechanisms of confinement, information control, and forced behavioral chang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language often masks coercive practices by presenting isolation as therapy and punishment as personal development. It concludes that meaningful reform requires challenging the broader assumption that problematic individuals can be remade through isolation and punishment rather than questioning only individual acts of viole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谁在购买这场暴力

——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殴打学员致盲事件探讨

作者：周敏

母亲节那天，张先生一家收到了儿子从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写的感恩信。那封信是基地安排写的，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是儿子的心声。但在同一天晚上，儿子在宿舍里写了另一张纸条，是求救信，托一个快要离开的学员带出去，请妈妈来救他出去。

两封信，出自同一双手。一张是这套系统要他写的，一张是他自己想写的。

前者送到了家长手里。后者被班主任发现，被暴打导致昏迷和右眼失明。

张先生不是坏父亲。他实地考察时看到孩子打球下棋，也听到了不打骂的承诺。他付了3.28万元，以为买来了孩子的转机。是什么样的处境，让一个爱孩子的父亲，签下了那份合同？

一、焦虑制造

张浩今年读初中二年级，13岁，今年4月开始逃学、夜不归宿。按照任何正常的发展心理学标准，这都只是需要关注、需要介入的信号，并不是危机。

然而在张先生的处境里，这就是危机。

理解这一点，得先理解中国国家家长的焦虑是在什么土壤里长出来的。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近四十年，最深远的心理后果之一，是将所有的期望、资源和焦虑，全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父母的期待，没有堂表亲可以提供缓冲和交流。他是唯一的赌注。

高考制度又深化了焦虑。在一个教育资源高度不均，学历与阶层流动高度挂钩的社会里，孩子“废掉了”，意味着家族数十年积累的社会位置可能就此中断。这一点都不夸张。

2000年代，出现了“网瘾”这个概念。媒体与部分专家联手完成了一次道德恐慌：打游戏被等同于精神疾病，网络是毁掉下一代的洪水猛兽。正常的青春期探索和挣扎，被定义成需要干预的病态。

张浩逃学、夜不归宿，在这种环境下，不是一个需要理解和沟通的信号，而是一个需要被治疗和矫正的病。张先生的焦虑是真实的，同时也是被系统性放大的。

二、求助空白

作为家长，面对一个逃学、夜不归宿的13岁儿子，上哪儿寻求帮助？

学校心理老师是第一个答案，也是第一个失望。中

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的配置长期严重不足，而且其职能以维稳为导向：压制危机、安抚情绪、防止事件扩大，并不以孩子的长期利益为核心提供支持。对于一个逃学的孩子，学校更常见的反应是施压、约谈家长，而非提供实质性的心理支持。

公立医院的青少年心理科是第二个答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知名儿童医院的心理科候诊期以月计，部分热门专家的号需要提前数月预约。就算挂上号，费用大多不在医保覆盖范围内，长期心理治疗对普通家庭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一个居住在江西九江的普通家庭，这条路太难。

家庭治疗是第三个答案。在中国，这几乎不存在。家庭治疗师是稀缺的私人服务，价格昂贵，在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也没有足够的从业者。

社区支持是第四个答案。中国的社区服务体系，在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领域，基本上是空白一片。

当所有的答案都失效，一个父亲在网上搜索，看到了宏志达的宣传。

这个空白怎么来的？是长期把教育资源集中于应试，将心理健康视为可有可无的软性需求，将家庭问题私有化处理的政策积累而来。国家撤出了它本应有的位置，让市场填了进来。

市场填补空白的方式很精密。2022年在福建晋江开张的四维成长基地，校长向明胜先向泉州民政局申请了“未成年人成长指导服务中心”的公益资质，取得批文后迁址另立，挂上民政局主管的牌子对外招生。武女士当场缴纳六万元，理由只有一个：政府办的，肯定正规。民政局后来回应：早就要求该中心关闭了，不知道他们跑到晋江的村里建了这个基地。国家不作用的空白，被一块假冒的政府招牌填上。四维基地在两年内虐待了至少八名青少年，其中14岁的小武在二十八天里被通宵罚站、跪举水盆、关入小黑屋铁笼，最终落下终身残疾。被踢骨折当晚，校长打电话给武女士，说孩子跑步摔了个小伤。

这就是市场带来的解决方案：暴力监禁填补了公共服务的缺失，政府招牌填补了家长的信任需求。

三、共谋完成

这是这篇文章最难写也最必要的部分。

张先生在付款前，知道六个月内不能与儿子联系。他知道孩子会被骗配合调查电信诈骗的说法以来到基地，但家长配合了这个安排。怀着信任签了协议，付了款。

这构成了一种共谋。

在使用这个词之前，需要说清楚它的含义。共谋不是主谋。张先生完全没想伤害儿子。他的出发点是爱，是这个社会里走投无路之后的孤注一掷。

但共谋是真实存在的，它包含了三种成份：

第一个是绝望状态下的认知收窄。心理学研究认为，人在极度焦虑和压力下，决策质量下降，对风险的评估会失真，对解决方案的渴望会压过一切审慎。张先生在付款前实地考察，看到孩子们打球娱乐，听到不打骂的承诺，这些信息被他的绝望过滤之后，变成了他想看到的样子。六个月不联系这个显然值得警惕的条款，在绝望状态下被接受为专业方法。

第二个是“为你好”的文化。在中国家长主流文化里，管教孩子天然爱的表达，严厉是美德，痛苦是成长的必要代价。“不打不成器”是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在数代人之间传递。当一个基地告诉家长“我们会用严格的方式教育你的孩子”，这个文化框架会帮助家长将严格与暴力之间的边界模糊掉。

第三个是对国家改造逻辑的深度消化。这是最隐蔽也最根本的一层，起了决定性作用。长期生活在一个“问题人口可以被关押改造，隔离可以产生转化，强制是为了当事人好”的社会结构里，这种表达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常识。它不是书面的规则，但存在于空气中，被每一代人呼吸进去。当张先生考虑把儿子送进一个封闭基地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一套国家改造术的民间版本。他以为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共谋就这样完成了。通过呼吸般自然的逻辑，一个爱孩子的父亲，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孩子的人身自由让渡给了一个靠着暴力运营的机构。

正视这一点，不是为了谴责张先生，也不是减轻班主任教官的责任。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紧迫的答案：下一个走投无路的父母，需要什么，才能不再走上同一条路？

四、出路在何方

答案其实是清晰的：专业支持体系，去污名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学校真正承担辅导功能而不是只管分数，社区的家庭支持网络。

但这些答案面临双重障碍。

第一重障碍是资源和制度的问题。上述体系需要持续的公共投入、专业人才的培养、将心理健康纳入公共卫生优先议程的政策，这些不是不可能，但需要优先级的重新排列。

第二重障碍更深，也更难。只要“强制改造问题人口”的国家逻辑没有被反问，民间版本就永远有它的土壤。公共服务能减少家长走投无路的绝望，但无法彻底消除家长认知的被塑造。一个在这种国家级逻辑里成长的家长，即使有更好的选择，也仍然倾向于相信强制能

够改变人。

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文化工程，而它的起点，是愿意正视强制改造的源头。

五、两张纸条

母亲节那天，感恩信被送出去了，求救纸条没有送出去。

这两张纸条之间的距离，是一套系统在运作的证明：它知道如何管理信息，如何让外部看到它想让人看到的，如何将声音压制在封闭空间里。

这套系统不是某个成长基地建立的。它由市场搭建，由文化背书，由制度空白提供生存土壤，由家长的签名和付款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授权。

张浩的右眼，在黑暗里度过了一夜。那个黑暗剧情，由不同的角色共同建造。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Who Is Purchasing This Violence: Reflections on the Blinding of a Student at Hongzhida Youth Growth Bas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blinding of a thirteen-year-old boy at the Hongzhida Youth Growth Base in Hubei Province and asks why parents purchase coercive correction services for their children. Using the case of Zhang Hao, the author argues that parental decisions emerge from educational pressure, limited mental health resources, cultural expectations, and broader state practices of compulsory trans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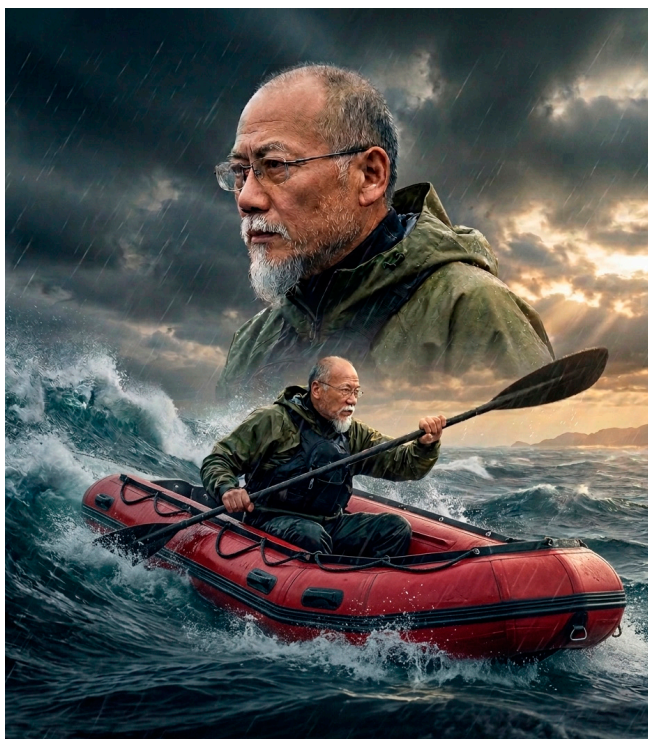
The article traces parental anxiety to the legacy of the one-child policy, intense academic competition, 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adolescent behavior through concepts such as internet addiction. It argues that families confronting behavioral challenges face inadequate school counseling, expensive mental health care, scarce family therapy, and weak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s.

Private correction camps fill this vacuum by marketing discipline, isolation, and behavioral reform as professional solutions. The essay contends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rely on market incentives, cultural beliefs about strict parenting, and assumptions inherited from state-led reeducation programs. It concludes that preventing future abuses requires stronger public support systems and a critical reexamination of the belief that problematic individuals can be transformed through coercion and isolation rather than communication, care, and voluntary assistance. Effective oversight, accessible services, and parental education are presented as essential safeguards against future violence and institutional neglect nationwid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68岁的老人用生命丈量自由

作者：罗翔



首先感谢盛雪大姐为董广平所做的一切，并声援董广平先生！

2026年，一则消息再次刺痛无数人的心。

第十三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获得者、68岁的董广平，乘坐一艘简陋的橡皮艇，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三十多个小时，横渡三百多公里，最终抵达韩国泰安海岸。

当同龄人在公园里遛弯、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时，这位古稀老人却把自己的生命押在了惊涛骇浪之上，只为换取两个字——自由。

这不是冒险，更不是“偷渡发财”。这是一场被专制逼到绝境的悲壮逃亡。

董广平不是普通人。他曾因坚持追求自由与人权，长期遭受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被关押、被监控、被反复传唤，正常生活被彻底剥夺。即便如此，当局仍不肯放过他。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在极权眼中就是必须被消灭的威胁。

他活在漫长的恐惧中：电话被监听，朋友突然失踪，深夜随时可能响起敲门声，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再次被投入监狱。这种恐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无形的枷锁勒紧喉咙。

他终于明白：没有自由的土地，再繁华，也只是更大的牢笼；没有尊严的人生，再“稳定”，也只是慢性处

决。

于是，68岁的他做出了决定——逃离。

他清楚地知道：橡皮艇在大海面前脆弱如一片落叶；黑夜里的巨浪随时可能将他吞没；三十多个小时的漂泊，他的体力随时可能崩溃；死亡的概率极高。

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因为对他而言，继续留在那片土地上，比死亡更可怕。

真正震撼世人的，不只是这场逃亡本身，而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仍然对自由保持着近乎偏执的渴望。这说明什么？

自由是人的天性。

无论极权如何洗脑，如何封锁信息，如何制造恐怖，都无法彻底扑灭人类灵魂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一个68岁的老人尚且愿意用生命去赌，那些年轻人，又怎会真正甘心被永远关在笼子里？

董广平的橡皮艇很小，却装着一个中国人最后的尊严。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漂流，而是一个老人用毕生力气划向光明的绝地反击。它撕裂了黑夜，向全世界发出呐喊：

今天的中国，依然有人宁死不屈；依然有人把自由看得比生命更重；依然有人在用行动控诉那个制度——

真正让人绝望的，从来不是贫穷，而是没有自由；真正让人拼死逃离的，从来不是国土，而是压迫。

当一位68岁的老人，在冰冷刺骨的大海上漂流三十多个小时，只为逃离独裁时，这本身就是对那个政权最沉重、最无情的控诉。

董广平成功了。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再黑暗的夜，也挡不住一颗向往黎明的心。

那么，当一位68岁的老人都不惜用生命换取自由时，我们这些还能发声、还能行动的人，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怯懦？

编辑：张宇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A 68-Year-Old Man Measuring Freedom With His Life

This article recounts Dong Guangping's perilous sea escape, portraying his journey as a powerful indictment of authoritarian repression and censorship.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的五月三十五日

作者：漠北孤侠

我的五月三十五日
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母亲们的泪
依旧未干
维园的烛光和自由女神像前的标语
依然斑驳
任谁秀口一吐
整个盛唐尽毁
但我不我偏诗行孤岛角落



视频中被老师塞到角落里的孩子孤苦伶仃的坐着，当班里其他所有同学都兴奋地举起手中六一节学校送的礼物时，我的心一阵阵剧烈抽搐，整个人崩溃。

这分明是我的孩子——当年我刚刚青春期高中一年级的孩子，就是这样被班主任朱老师塞到挨着垃圾柜的角落座位里；而且其他所有同学都有“同桌的你”，就他一个人。该老师还组织全班同学尤其是坐在孩子周围前后左右的四个女同学欺凌孩子。孩子做好作业交给四个组长都被拒收、作业都交不上去。

孩子拼命展示自己的优秀和对班级荣誉的维护以换取同学们的认可。校运会勇敢参与比赛项目，没有一位同学围观，更无一人喝彩，须知他平时连最简单的运动和动作都做不来。

孩子到今天尚留下极重心理隐患，怕别人负面评价、怕别人拒绝，形成了极度的讨好型人格，至今不敢接触女生。

这视频也再次重击了我心里的旧伤，40多年了！

我少年时遭遇的校长儿子带领全班同学霸凌我、甚至成年了还变着法子欺侮我的往事，翻江倒海般翻腾出来。

初中一年级时年幼小、身体更孱弱，无法适应远离父母一人独立读书、生活，被迫放弃当时所谓的地区重点学校尖子班学位，回到我一天没上过的家乡小学。从上学第一天开始全班同学以侮辱的外号称我，连自小村子里一起长大的玩伴也孤立我。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整天笼罩在恐惧中，只能用拼命的学习来躲避同学们异样的眼光和闲言碎语，用考试成绩的优秀来证明自己。直到最近些年或许年岁渐大，年少时的往事不知不觉的会在脑海里回放，也找不出当年班上的同学集体一致的霸凌我的原因。只是透过回忆追溯才有所发现，成年后直至几年前，同班同学以当年那几位带头和组织霸凌我的，仍组织班上同学搞“统一战线”孤立、排挤和欺辱我，一个例证就是10年前原初一班同学30周年同学会刻意不通知我。原因无他，就是我一直比他们优秀！

此时我心如刀绞，为视频中孩子、为我的孩子、为我自己，为当下千千万万曝光和未曝光出来的被霸凌的孩子与家庭。

前后跨越40年三代人，不变的霸凌与欺辱！我不是孤例！

40年过去了，这土地一丝也没有改良，千年盐碱依旧，甚至酱缸味更浓，芸芸韭菜已经被压榨一次又一次，血泪干枯。

此刻窗外，阴雨连绵，一个多小时后又又是五月三十五日了，何日是尽头？！

2026年5月35日于东山下烟雨小木屋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My May Thirty-Fifth

This personal essay links a classroom bullying incident with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examining enduring patterns of exclusion, silence, and conformity acro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educ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救人先审批，拍照是重罪

——从石门洪灾看中国灾难治理的真实逻辑

作者：周敏



2026年5月17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特大洪灾。三座水电站被洪水冲垮，下游村庄房屋被夷为平地，当地居民反映物资极度短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超官方公布的7人。就在这场灾难发生之际，河南省蓝天救援队的伊川、宜阳、嵩县三支队伍——全部由自费出行、自带装备的志愿者组成——连夜赶赴灾区。

5月22日，河南省蓝天救援督察部发出通报，措辞严峻：上述三支队伍“未报备、未获批，擅自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作业”，并在石门收费站“私自拍摄、发布视频，引发网络舆情，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毁蓝天救援品牌形象”。处罚结果：责令全员撤回，全队书面警告。

请注意通报里的两个并列罪状：一是去救人，二是拍了视频。在这份文件里，这两件事的严重性是对等的。

负面舆情比洪水更危险

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公益救援机构之一，队训是“少说多做，默默奉献”。这支队伍在多次重大灾难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然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惩罚竟然不是来自洪水，而恰恰来自于自己的上级——一个深度编织进官方应急管理体系的组织。

通报明确要求，所有跨区域救援必须“先报备、后审批、再出队”，并“严禁违规拍摄传播现场影像资料、制造负面舆情”。

“制造负面舆情”——这几个字是理解整个事件的钥匙。

灾区物资极度短缺，整村被淹，官方死亡数字与现实严重脱节，这些才是真正的“负面”现实。而这份通报所要消灭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关于现实的画面和信息。换句话说，志愿者拍下的视频之所以成为罪证，恰恰是因为它展示了真相。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次洪灾有个很关键的点：当地灾民反映，县政府没有提前通知村民撤离，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泄洪，引发严重洪灾，三座水电站被冲垮，下游村庄房屋被洪水冲走，灾区的物资极度短缺。官方公布的是死亡7人、14人失联，但是当地居民表示实际伤亡可能远超官方数字，“有的整个村全部灭了”。这让通报中“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句话显得挺耐人寻味——到底是救援行为本身造成了影响呢，还是拍摄、传播灾区的真实画面造成了“舆情”呢？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石门洪灾不是孤例，它是一个中国大地上上演多次的剧本。

2019年12月，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转发不明肺炎的预警信息，旋即就被警方传唤，在训诫书上签字画押，被定性为“散布不实信息”。三周后武汉封城，数月后李文亮以34岁之龄因感染新冠病毒离世。他预警的，正是后来夺去数百万人生命的病毒。他的罪行，只不过是提前说了真话。

2021年7月，郑州暴雨，京广北路隧道内车辆被淹，多人遇难。现场随即被军警封锁，禁止拍摄。凤凰卫视记者胡玲发微博记录“郑州京广隧道全部戒严，不允许拍照”，帖子很快被删除。与此同时，一份民间志愿者自发建立的腾讯文档救援信息表，24小时内更新超过270版，在官方渠道失灵的时承担起了协调救援的职能。

三次灾难，却生发出别无二致的脉络：最先被压制的，不是灾祸和混乱，而是关于灾祸真相的信息。

审批程序是协调机制，还是过滤器？

官方的辩护词不是毫无道理。跨区域救援确实需要协调，避免资源重叠、道路拥堵，这是现代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蓝天救援队总部也强调，“先报备、后审批”的目的是统一调度、按需支援。

但这个辩护在石门案例里能站得住脚吗？我们看一下，通报的重心落在“拍摄视频”上。如果说真正的问题是救援协调混乱，处罚肯定是清楚地针对行动层面的失序，对不对？然而通报专门列出“违规拍摄传播现场影像资料”作为独立罪状，这说明让上级真正不安的，根本不是志愿者的靴子沾满了灾区的泥泞，而是他们的镜头对准了灾区的现实。

审批程序在这里承担的功能是：表面上是救援协调机制，实质上是个信息过滤的漏斗。两者被捆绑在一起，无法分离。想去救人，那就得先接受这套过滤。

社会的免疫系统在萎缩

任何社会在面对灾难时，都需要两种能力：一是动员和救援的能力，二是感知和反馈的能力。前者需要组织和资源，后者需要自由流通的信息。

中国不缺这第一个能力。解放军也好、消防也好、还有国家救援队，在重大灾难中的动员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第二个能力——社会的自我感知、自我纠错的能力——自始至终都在被全面地、极限地压缩。李文亮的预警要是真的被听取了，新冠的扩散时间线会完全不同。郑州地铁隧道的封锁，让死亡人数直到现在也没有眉目。石门洪灾里那些被强制撤回的志愿者和被没收的视频，令我们至今不能得知那些村庄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温暖的社会像是个健康的有机体，有感受到痛苦的神经系统。要是信息传递被人为阻断，社会就失去了对

自身处境的感知——它仍然能动，但它感觉不到自己在流血，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

网民们问得真好：“私自赈灾等同谋反？”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通报发出的那一刻其实很清楚了。

在中国当下的治理逻辑里，一个拿着摄像机的志愿者，比一场洪水更需要被管控。因为洪水过去之后什么都不会留下，而一段真实的视频，可能永远留在互联网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真相更让中国政府害怕呢？

编辑：张宇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Rescue Requires Approval, Filming Becomes a Crime: The Real Logic of Disaster Governance Revealed by the Shimen Flood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fficial response to volunteer rescue efforts during the devastating floods that struck Shimen County, Hunan Province, in May 2021, arguing that the incident reveals key features of disaster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fter three hydropower stations collapsed and downstream villages were severely damaged, volunteer teams from the Henan Blue Sky Rescue organization traveled independently to the disaster area with their own equipment. Days later, the organization's supervisory department issued a disciplinary notice accusing the teams of conducting unauthorized rescue operations and distributing disaster footage that generated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equal weight given to two alleged violations: rescuing without prior approval and documenting conditions in the disaster zon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is pairing suggests that uncontrolled information is treated as a threat comparable to the disaster itself. Reports from residents described severe shortages of supplies, inadequate evacuation warnings, and casualty figures that may have exceeded official statistics.

Placing the Shimen case alongside the treatment of doctor Li Wenliang during the initial COVID-19 outbreak and restrictions on reporting during the 2021 Zhengzhou floods, the essay argues that information about unfolding crises is often constrained before underlying problems are addressed. It concludes that effective disaster response depends not only on mobilization capacity but also on society's ability to perceive, communicate, and learn from its own suffering.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郑丽文的一厢情愿和国民党的南柯一梦

——评郑丽文旧金山讲话

作者：郑存柱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旧金山发表讲话，提到几个“奇迹”：台湾的民主奇迹，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寥寥数语，却把今日国民党两岸论述的两重困境暴露无遗——一重叫“一厢情愿”，一重叫“南柯一梦”。郑丽文一厢情愿地承认了大陆的经济奇迹，而国民党放弃民主、单求和平的路线，终将是一场南柯一梦。

一、一厢情愿：一场没有回应的独角戏

郑丽文肯定了大陆的经济奇迹。这本身并非错误——改革开放四十年，大陆的物质成就确实可观。但问题在于，这份“承认”是单方面的、没有回应的。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曾承认，也根本不愿承认台湾的民主奇迹。

这就是“承认”的不对等，也是两岸关系真正的症结所在。经济上的成就，北京乐于向世界炫示；而政治上的文明进步——亦即两千三百万人用选票、用政党轮替、用新闻自由所写就的民主奇迹——却被刻意回避、贬低，乃至污名化为“乱象”。一方愿意正视对方之长，另一方却连承认都吝于给予。郑丽文的善意，因此成了一厢情愿的独角戏：她对着镜子鞠躬，却以为对面真有人还礼。

一厢情愿的危险，不在于善意本身，而在于它把对手的沉默误读为默许，把对方的不承认误读为可以谈判的空间。当你愿意承认别人的成就、别人却连你存在的正当性都不肯承认时，对话就不是对话，而是俯首。

二、南柯一梦：以放弃民主换取的和平

郑丽文提出“和平救国”，盼望两岸和平。追求和平，原是仁者之心，本应敬重。但和平有真伪之分：没有民主作为前提的和平，不是和平，而是投降。

不妨重温一段历史。1949年的北京，确实“避免了战争，获得了和平”。然而那不是胜利者的和平，而是守军傅作义以放下武器、交出城池的方式换来的和平。城是完整的，人是安全的，可是从此之后，是谁的旗帜插上了城头？是谁的意志主宰了那座古都？以缴械之名，行投降之实，纵然枪声不响，也已是城下之盟。今日若有人以“和平”为名，要台湾在尚未获得对等的民主承诺之前先行让步、先行交付，这样的“和平”，与1949年的北京又有何异？

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里，淳于棼醉卧古槐之下，梦入“大槐安国”，尚公主、守南柯、出将入相，享尽二十年荣华富贵；一朝梦醒，方知所谓的国，不过

是槐树下一个蚁穴而已。今日的国民党，若以为只要放下民主这面旗帜，便能换来对等、尊严、长久的和平统一，那无异于淳于棼的槐安一梦：梦里有公主、有荣华、有“一中各表”的体面，醒来却只是蚁穴一场，城头早已易帜。南柯一梦的可怕，正在于梦中人浑然不觉自己在做梦。

三、民主才是和平的前提

要走出“一厢情愿”与“南柯一梦”，国民党只有一条路：重新认清民主才是和平的前提，而非和平的代价。在此，我愿提出三点。

其一，国民党必须高举自己的核心价值——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本身即昭示：民主是和平的前提。失去了三民主义这面旗帜，国民党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失去了在道义上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格，只能在对方设定的语境里被动应答。

其二，国民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把台湾的民主奇迹带回中国大陆。要让中国共产党明白，融入世界一体化，不能只在经济上、贸易上，更要在政治上接受普世价值。台湾的民主，不应被大陆的专制所“统一”；恰恰相反，台湾的民主经验，正是整个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火种与路标。

其三，在两岸议题上，国民党应重新回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传统立场，主动向对岸提出民主的诉求与口号。唯有如此，才能让全体中国人看清楚：究竟是谁，在为了一党之私而阻碍两岸的真正统一。把“民主”摆到桌面上，主动权便回到了高举民主旗帜的一方；回避它，主动权便永远握在垄断权力的一方。

结语

国共两党百年恩怨，曲折万端。但历史最终会记住的，不是谁一时的退让换得了几年的安稳，而是谁在关键时刻，站在了人民与自由的一边。一厢情愿换不来对等，南柯一梦醒不出尊严。我们诚挚地希望，国民党不要在别人的蚁穴里寻找自己的南柯郡，而要做台湾民主的守护者，更要做十四亿大陆同胞通向民主的引路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救国”。

（作者：中国民主党联总主席）

2026年6月6日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浅评《前进达瓦里希》

作者：戈冰

前言

当共产主义宏大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时，其对人类心灵的规训便达到了最隐秘的境地。本片将镜头对准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前夜的一个女孩。在这个由红色积木和苏俄历史人物名字构筑的微缩乌托邦里，本该纯真的童年游戏，却无意识地复制了冷酷的权力运行逻辑和“人民审判”。女孩最终在火光中的逝去，表面上是理想主义的落幕，实质上却是一场思想被高度异化后的精神殉葬。这种集体主义幻觉在面对现实的祛魅时，最终走向了毁灭。本文将以此片中看似天真的儿童游戏为切入点，逐一剖析其背后隐喻的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如何对个体思想进行异化与戕害，直面其严酷的精神规训本质。

一，童年乌托邦的崩塌：从红色积木到时代巨变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业城市。一个小女孩在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氛围中长大。她拥有一套红色积木，这是她童年最重要的玩具。家里养了几只小动物，她分别给它们取了革命人物的名字，比如猫叫“弗拉基米尔”、小鸡叫“菲利克斯”，还有一只调皮的小鸭叫“贝利亚”。女孩经常模仿大人，以集体的名义“审判”那些犯错的小动物，沉浸在自己创造的平等和理想游戏当中。

后来，外部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波也传到了这里。女孩身边的“动物伙伴”一个个不见了。她用红色积木和童年幻想搭建起来的小世界，在现实压力下开始崩塌。她曾经坚信的东西正在迅速失去根基，这种成长与时代剧变的碰撞，让她感到强烈的失落和迷茫。

女孩不得不面对现实：家里和街上到处都是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商品——芭比娃娃、米老鼠等各种洋玩具。但贝利亚离开前，给她留下一块带有红色标记的积木，上面刻着“达瓦里希（同志）”这个最高指示。在幻觉和现实不断交替中，女孩紧紧抱着这块积木和内心的理想，冲出了家门。最后，她在城市拆迁的火光与烟尘中离开了。

女孩的离去，象征着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彻底落幕。在她最后的意识里，她又回到了过去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光。尽管周围满是废墟和变化，她还是选择朝着那个“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的梦想”继续走下去。

现在我们逐一分析影片中共产主义对于人类思想的侵蚀戕害。

二，被塑造的天真：意识形态如何进入儿童的游戏

影片前部，贝利亚因为偷盗一块积木而遭到主人公审判：“贝利亚因为盗窃社会主义和人民的积木而要受到处分。”这看似只是儿童游戏中的一句玩笑话，却暴露出影片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小女孩并没有简单地指责贝利亚偷走了“我的积木”，而是将其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和“人民”的侵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女孩的天真，而在于她的天真已经被特定的政治话语所塑造。本应属于儿童的世界——游戏、友谊与好奇心——被宏大叙事重新编码。她不再只是给动物起名字，而是在赋予它们政治身份；她不再只是与动物玩耍，而是在模仿一种权力运行的逻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审判”中，“人民”被作为最终的合法性来源，却始终没有被清晰界定。谁代表人民？谁有权解释人民的利益？谁又能够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损害了人民？这些问题在游戏中并不存在，因为审判者、立法者和解释者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女孩自己。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场儿童游戏成为一种政治寓言。它所呈现的并非现代法治所强调的程序、权利与制衡，而是一种以抽象集体名义进行裁决的思维模式。当“人民”被视为最高价值时，个体的声音反而容易被淹没；而当“人民”的定义掌握在权力者手中时，谁属于人民、谁不属于人民，也往往不再由个人决定。

三，想象的敌人：意识形态如何替代真实世界

影片中有一个引人思索的细节。在拥挤的电梯里，小女孩忧心忡忡地问母亲：“妈妈，我们的大楼会不会被美国炸掉？”

对于成年人而言，这或许只是儿童的胡思乱想。然而，一个从未见过美国人、不了解国际政治的孩子，为何会将美国与战争和毁灭自然地联系起来？这种恐惧显然不是来源于个人经验，而是来源于她所接触的政治叙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影片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当个体尚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时，便已经学会按照既定的话语框架理解世界。世界被简单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同志”和“敌人”，“人民”和“反人民”。在这样的叙事中，复杂的现实被压缩为道德判断，而抽象的政治身份则取代了真实的人。

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陌生。义和团运动时期，许多人相信外部世界是威胁自身生存的邪恶力

量；而在互联网时代，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习惯于将国际关系简化为善恶对抗。在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但都反映出一种共同倾向：以想象中的敌人代替真实世界，以情绪化的身份认同代替理性分析。

影片中的女孩当然不是义和团成员，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粉红”。但她身上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心理结构——在尚未理解世界之前，先学会了恐惧世界；在尚未接触他者之前，先学会了定义他者。这或许才是影片无意间暴露出的更深层问题。

四、无法被隔绝的现代性：当商品文化击碎意识形态幻梦

影片中部还有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几位母亲谈起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洗发膏，她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产品功效：“对皮肤特别好，silk就是蚕丝的意思。”对于成年人而言，这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消费选择；然而在小女孩的耳中，这却意味着某种无法接受的背叛。她认为母亲已经背离了自己所坚信的那个世界，转而向另一个世界靠拢。

这里实际上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差。儿童仍然生活在意识形态构筑的世界里，而成年人已经开始按照现实利益和生活需求作出选择。当小女孩还在维护自己幻想中的“社会主义”时，大人们却已经开始学习英文单词，讨论进口商品，并主动接受来自西方的消费文化。

这种现象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晚清时期，统治者一方面以“夷夏之防”的观念警惕西方影响，另一方面又沉迷于西方带来的物质享受。正如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景观所展现的那样，皇帝和后妃并不排斥西方所代表的舒适与享乐，他们只是希望将这些东西控制在自己能够掌握的范围之内。

问题在于，现代化从来不是一种可以被局部接受的商品。技术、制度、思想与生活方式往往相伴而来。当统治者试图用高墙将西洋景观围起来，用传统秩序隔绝外部世界时，最终迎来的却是更剧烈的碰撞。大刀、梭标和土炮终究无法阻挡工业文明的到来，封闭的梦境也终究无法抵御现实的冲击。

影片中的小女孩实际上重复了同样的逻辑。她愿意接受红色积木构筑的乌托邦，却拒绝理解母亲为何会对“silk”产生兴趣；她试图把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彻底分开，却不知道现实早已悄悄进入家门。正如晚清中国最终无法将西方锁在国门之外一样，她也无法阻止那个由商品、市场和消费文化构成的新世界逐渐取代自己熟悉的一切。

五、当历史被美化：胜利叙事中的沉默与缺席

片尾出现的武器耐人寻味。波波沙冲锋枪、莫辛-纳甘步枪、DP-27轻机枪、Tu-2轰炸机、T-34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都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装

备。导演没有选择冷战后期的先进武器，而是将镜头停留在1945年的胜利时刻。这种选择并非偶然，因为1945年的红军象征着共产主义最辉煌、最容易被神话化的历史记忆。

然而，这种钢铁洪流背后，却看不到大清洗、古拉格劳改营、政治迫害和长期经济困境。影片将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历史压缩成胜利与荣耀的叙事，使观众看到的是理想化的苏联形象，而不是共产主义制度在现实中的代价。因此，导演所怀念的并非真实存在过的苏联，而是经过选择性记忆塑造出来的苏联神话。

六、萌化的名字，血腥的历史：三只宠物背后的国家暴力谱系

更细思极恐的是，导演将三只宠物分别命名为弗拉基米尔、菲利克斯和贝利亚。

对于不了解苏联历史的观众而言，这不过是几个普通名字；但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它们分别对应列宁、捷尔任斯基和拉夫连季·贝利亚——苏联革命、秘密警察体系以及国家恐怖机器的重要象征。

导演并没有让这些人物以庄严肃穆的历史形象出现，而是将其降格为宠物。这种处理方式既消解了历史人物的神圣性，也削弱了他们身上的政治重量。曾经影响数千万人的革命领袖、秘密警察首脑和内务部负责人，在动画中变成了围绕主人打转的小动物。

这种反差构成了影片最黑色幽默的一笔。

如果进一步追溯这三个名字背后的历史，则会发现导演的选择并非偶然。

列宁奠定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框架；捷尔任斯基创建契卡，使秘密警察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贝利亚则成为大清洗、古拉格体系和国家恐怖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个人的历史轨迹，恰好对应着苏联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从革命理想，到暴力维稳，再到制度化恐怖，影片用三个看似无害的宠物名字，浓缩了一段极其沉重的历史。

导演没有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或斯大林，而是选择了列宁、捷尔任斯基和贝利亚。这三个名字共同指向的并非共产主义理想本身，而是维护这一理想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暴力机器。

结语

从“人民审判”的童年游戏到最终的精神殉葬，女孩的悲剧展现了宏大叙事对个体心灵的极限异化。那些被萌化的苏俄符号背后，是沉重的国家暴力机器。当虚无的集体主义幻觉被现实祛魅，她选择与红色积木一同走向毁灭。这不仅是理想主义的落幕，更是极权话语吞噬纯真、戕害思想的一声沉痛挽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共才是最大的行为“分裂主义”

(西藏 / 图博篇)

作者：张致君



2026年中共当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党性教育，压制少数民族文化继承，进一步在体制层面加大民族撕裂。中国共产党在实际行为上在“制造分裂”和“加剧对立”，但却把“分裂主义”的标签用来指责别人。

随着流亡藏人超过9万人在世界各地做登记选民，成功进行议会选举，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能力。达赖喇嘛荣获第68届格莱美奖，藏人的精神文化在传播慈悲与和平理念方面树立了国际上的重要里程碑。而中共当局却对传播藏区文化归国的张雅笛进行抓捕，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等罪名被起诉关押。

西藏问题长期以来不仅是一个政治议题，更是一个涉及文明传统、民族认同、宗教信仰、历史记忆与现代治理方式的综合性议题。若仅仅以领土完整、行政主权或国家安全的角度理解西藏问题，往往会忽略其最核心、最敏感的部分——那就是西藏独特的文化体系，以及藏传佛教在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深层地位。

对藏人而言，宗教并不是私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语言传承、教育体系、伦理观念、节庆习俗、社区组织乃至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曾长期承担教育中心、文化保存中心与社会协调机制的功能。

任何针对宗教制度的外部干预，都不仅是政策层面的调整，而是对整个民族文化生命的介入。

西藏问题之所以持续受到国际关注，正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区域治理问题，而是现代国家如何面对历史文明、少数民族文化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

都面临多元文化治理的挑战，但真正考验国家成熟度的，不应该是如何统一差异，而是如何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之下尊重差异。西藏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这里既有高度独特的宗教传统，也有强烈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主体意识，任何单纯依赖行政命令的治理方式，都难以触及问题本质。

在众多争议之中，最具象征意义、也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介入。达赖喇嘛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精神领袖，也是藏人心中慈悲、智慧与文化延续的象征人物。在过去数百年中，达赖喇嘛制度已经超越单纯宗教职位，成为西藏社会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信众而言，达赖喇嘛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精神传统的连续性。

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本身具有深厚宗教内涵。按照藏传佛教传统，高僧圆寂后可能以转世方式再度来到世间，继续弘法利生。寻找转世灵童也非现代意义上的选举或任命，而是一套复杂而神圣的宗教程序，通常包括遗训线索、高僧禅观、护法神谕、圣湖启示、特定征兆、候选儿童辨认前世遗物，以及资深僧团的共同确认。这一过程之所以被接受，并不在法律授权上，而因信众相信其宗教意义，并愿意接受其结果。换句话说，转世制度的核心基础是信仰共同体的认可，而非国家权力的许可。

然而，近年来，北京当局多次公开表示，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必须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并强调中央政府拥有所谓“最终决定权”。这一表述意味着国家试图以行政权力介入宗教领袖继承问题，将本属于宗教共同体内部的事务纳入政治控制框架。2025年，中国官员再次明确表示，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将由中国政府主导，而非由现任达赖喇嘛指定的宗教机构决定。这一立场引发藏人社会和信徒的广泛忧虑，当局的主导已经超越一般政策争议，触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现代国家是否有权决定宗教的精神领袖。

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本质上来自完全不同的合法性来源。

政治权力来自宪法、法律、制度与国家机器，其核心功能是管理公共秩序、提供安全保障、维护社会运

行。宗教权威则来自信仰、传统、伦理影响力与精神认同，其核心功能是回应人的内在需求、提供意义感与道德方向。两者可以并存，也可以互动，但不应互相替代。政府或能控制行政程序、宣传系统与组织资源，却无法命令人们真诚地相信谁具有信仰认可的正统性。若缺乏宗教共同体的承认，即使拥有官方头衔，也难以获得真实的精神权威。历史一再证明，国家可以任命职位，却无法制造信仰。

从宗教自由原则来看，任何政府都不应决定谁是宗教领袖。现代文明社会普遍承认宗教团体拥有依据自身教义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包括领袖继承、教义解释、仪式安排与组织治理。天主教的教宗由教会体系选举产生，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学者由宗教传统形成影响力，佛教高僧的地位也来自僧团与信众认可。若国家可以决定达赖喇嘛的转世，那么理论上也可以决定主教、教宗、伊玛目或其他宗教领袖的人选。这显然违背普世的信仰自由原则，也会构成国家权力对公民精神生活的过度延伸。一个真正自信且成熟的国家，应当保障宗教自由，而不是取代宗教本身。

从西藏历史传统来看，达赖喇嘛制度自始至终也不是国家任命制度，而是建立在宗教体系内部长期演化而成的机制。西藏历史上长期拥有高度自治传统。历代中央王朝与西藏之间关系复杂，既有宗教施主关系，也有政治联盟关系，并非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直接统治。历史上的政治互动、宗教往来与战略安排，但并不意味着现代政府天然继承了宗教决定权。

中国官方常引用清代“金瓶掣签”制度作为介入依据，但历史事实远比这一说法复杂。金瓶掣签并非每次实施，也并非唯一程序，转世认定仍依赖宗教体系内部确认。即便在帝制时代，中央政权更多扮演认可角色，而非全面主导角色。也就是说，历史上的中央政府从未像现代中共行政国家这样，以法规文件要求所有转世必须报批。2007年中国出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俗称5号令），规定活佛转世必须经过政府审批，这实际上是现代政权将官僚管理体系延伸至宗教领域，而不是简单“恢复传统”。

1995年，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达赖喇嘛认定一名六岁男童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但该男童随后失踪，至今未公开露面。中国政府随后另行指定一位班禅喇嘛。官方任命者虽然拥有国家支持，却始终未能获得藏人社会的自然认同。藏人们仍将失踪男童视为真正的班禅喇嘛。

这成为全球最具争议的宗教继承事件之一，这也说

明一个现实：宗教权威无法靠行政命令制造。

若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逻辑重新解释古代帝国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再据此主张今日国家拥有最终裁决权，既缺乏历史连续性，也是一种政治性改写。

从现代治理逻辑来看，政府过度介入宗教事务往往适得其反。国家若试图控制信仰象征，只会加深民众的不信任，并使原本可协商的宗教问题转化为身份、尊严与历史记忆问题。对于西藏这样具有强烈文化特色与精神传统的地区而言，尊重传统远比强行管理更有利于长期稳定。压制认同不会消除认同，反而会强化认同；干预信仰不会削弱信仰，反而会使其更具象征力量。许多国家经验表明，当文化群体感受到被尊重时，更容易形成合作关系；当其感受到被否定时，则容易产生长期疏离。

例如，加拿大在处理魁北克法语文化认同时，并未单纯采取压制方式，而是通过双语政策、地方自治安排以及对法语文化的制度性保障，使魁北克虽长期存在独立声音，但整体仍留在加拿大联邦框架之内。尊重文化差异，反而增强了国家的整体凝聚力。

再如，英国面对苏格兰的民族认同问题，选择建立苏格兰议会、扩大地方自治权，并允许通过公投表达政治诉求。虽然分歧仍然存在，但制度化尊重降低了激烈对抗的可能，使矛盾能够在政治程序内解决。

相反的例子则是北爱尔兰冲突。长期以来，当地部分群体在政治代表权、宗教身份与文化地位上感到被边缘化，最终导致数十年的暴力冲突与社会撕裂。直到和平协议建立权力分享机制、承认多元身份之后，局势才逐步稳定。

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的关系。加泰罗尼亚拥有独特语言与历史传统，当中央政府与地方认同之间缺乏互信时，政治紧张便迅速升级；而在给予文化自治、语言保护与地方治理空间时，社会关系则相对缓和。

这些案例说明，现代国家的稳定并不来自消除差异，而来自管理差异。文化群体若感受到自己的语言、信仰与历史被尊重，更愿意参与共同体建设；若长期感受到否定与压制，则容易形成代际不信任与心理疏离。尊重多元文化，不是国家软弱，而是成熟治理的体现。

此外，政治介入宗教继承制度还可能制造“双重合法性危机”。政府可以控制媒体、仪式、机构，却难以

控制信仰本身。如果未来中国政府指定一位官方认可的达赖喇嘛，而流亡藏人社会及广大信众承认另一位依据传统程序产生的达赖喇嘛，那么世界可能同时出现两位竞争性的达赖喇嘛。一位拥有国家支持，一位拥有信众支持。这样的局面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争议持续数十年，并使宗教继承问题永久政治化。届时国家虽控制形式，却失去实质认同。这种结果只会造成长期分裂。

国际层面上，达赖喇嘛早已不仅是西藏地区人物，而是全球知名的宗教领袖与和平象征。他长期倡导非暴力、慈悲与跨文化对话，在全球拥有广泛影响力。关于其继承问题的任何政治操作，都必然受到国际舆论关注。今天的国家形象，不能仅由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决定，也越来越取决于其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文化差异与宗教自由。若一个政府被普遍视为试图控制宗教领袖继承，其国际信誉难免受损。真正希望获得全球尊重的国家，应展示制度自信与文明包容，而不是对精神领域进行管制。

更深层次来看，西藏问题折射的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家权力必须存在边界。国家负责道路、税收、治安、教育、外交等公共事务，这是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正常功能。但人的信仰、灵魂归属与终极意义追求，则属于个人与社群的精神空间。当国家开始决定谁可以被信仰、谁能够继承宗教地位时，就意味着政治权力进入本不属于它的领域。任何无限扩张的权力，最终都会损害自身合法性。

一个成熟的国家，并不会因为允许宗教自治而削弱自身。相反，懂得克制的国家更容易获得人民信任。尊重宗教传统，允许文化差异，不代表失去与放弃；保障信仰自由，也不代表威胁。真正稳定的社会，从来不是所有声音一致，而是不同声音能够和平共存。真正强大的国家，也不是控制一切，而是知道哪些事情不应该控制。

中共政府对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政治控制，从根本上缺乏宗教合法性，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扩大藏人与汉人的心理距离，并损害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信誉。它看似展现中共的权力，实则暴露其政权的不安全感；看似维护秩序，实则制造长期不信任。任何依赖强制维系的稳定，都是脆弱的。

西藏问题若要走向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其前提之一，就是让宗教回归宗教，让政治止于边界。政府可以维护社会秩序，可以保障法律框架，可以确保公共安全，但不应该决定谁是达赖喇嘛。这个决定应当属于藏传

佛教传统、僧团体系与信仰共同体。唯有如此，才能使继承具有真正的精神合法性，也才能减少政治对立。

历史已经证明，权力可以统治土地，却难以统治人心；行政命令可以改变制度，却难以改变信仰。

任何国家若希望获得长久稳定与真正认同，必须明白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文化可以被尊重，宗教可以被保护，灵魂不能被任命。

一个政府可以管理土地，最不应统治人的灵魂。

编辑：张宇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Greatest Practitioner of "Separatism": The Tibet Cas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 Tibet have intensified ethnic tensions while labeling dissenting voices as separatist.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recent measures, including the 2026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Promotion Law, expand state control over minority cultures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further widening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ibetans and Han Chinese.

Focusing on the succession of the Dalai Lama, the essay examines the conflict betwee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religious legitimacy. It argues that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for identifying reincarnated Tibetan Buddhist leaders derives its legitimacy from religious belief, monastic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recognition rather than state approval. The author criticizes Beijing's assertion that future Dalai Lama reincarnations must receive government authorization, describing this position as an unprecedented extens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to the spiritual sphere.

The article reviews historical debates surrounding the Golden Urn system, the 2007 Measure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Reincarnation of Living Buddhas, and the disputed recognition of the Eleventh Panchen Lama. It argues that state intervention has failed to secure genuine religious legitimacy and instead deepened mistrust among Tibetans.

Drawing comparisons with Quebec, Scotl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Catalonia, the essay contends that stable multicultural governance depends on respec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rather than eliminating them. It concludes that lasting stability requires clear limits on state power,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recognition that governments may administer territory but cannot command belief or appoint spiritual legitimac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翻看历史的旧账

——从“共产主义”到“延迟现实”的信任危机

作者：孙浩亮



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权力的垄断上，更建立在它对人民做出的历史承诺与最终兑现的契约之上。回顾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至今的百年历程，其政治修辞的演变、核心叙事的转移，以及近期推出的社保延迟政策，正在拼凑出一幅关于历史承诺与现实落差的讽刺画卷。

一、消失的彼岸：被逐渐隐去的“共产主义”

在革命年代与建政初期，“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词汇，更是动员底层民众最核心的感召力量。“按需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宏大蓝图，曾让无数普通百姓倾其所有，甚至付出生命去追随。彼时，这一愿景被描绘为触手可及的“明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绝对纯粹的乌托邦承诺在严酷的经济规律面前屡屡碰壁。从早期的激进尝试，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到如今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政治话语的重心发生了微妙而根本的位移。在官方的日常意识形态宣讲中，“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最初的终极奋斗目标正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在很多公共讨论和政策文本中被选择性地淡化和隐去。这种叙事的转向，在很多观察者眼中，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承诺的悄然退却——当最初构建的宏大愿景无法兑现时，话语体系便只能通过不断修正目标来掩盖早期的过度动员。

二、契约的单方面修改：社保缴费年限延长的现实刺痛

如果说“共产主义”的淡化还属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调整，那么近期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延长社保缴费年限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则直接刺痛了当代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

社保制度在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公民在年轻时履行缴费义务，国家则承诺在公民年老时提供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然而，面对严重的人口红利消失、少子老龄化危机以及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政策制定者选择了一种“单方面修改合同”的方式：

缴费时间拉长：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付出更多、更久的劳动成本。

领取时间推迟：这意味着原本触手可及的晚年保障被再度延后。

对于长期承受高强度劳动压力的当代年轻人和中年劳动力而言，这种单方面调整缺乏充分的民意博弈与社会共识过程。它让民众清晰地看到，在制度设计的风险面前，最终承担代价和托底的，依然是体制最底层的普通工薪阶层。

三、信任的侵蚀：从宏大叙事到个体清醒

将历史的宏大承诺与当下的社保政策放在一起对比，其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在于政治信任的透支。

从建党之初许诺给工农阶层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的理想国度，到如今面对老龄化冲击时，要求普通人“多缴少领”、“延迟退休”，这构成了强烈的讽刺。这种政策走向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曾经那些激昂的口号究竟是真诚的愿景，还是一种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维护统治、转嫁危机而不断变换的“修辞魔术”？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的是透明、对等且受到监督的契约精神。当宏大的政治口号最终缩水为需要个体用肉身去硬扛的社保账单，那种依靠单向宣传维持的叙事红利便走到了尽头。历史的迷雾散去后，留给普通人的，只剩下如何面对越发沉重的生存现实。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Revisiting Historical Debts: The Trust Crisis from "Communism" to Delayed Retirement Real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shifting political narratives and delayed retirement reforms have widened the gap between historical promises and social realities, arguing that changing welfare expectations and revised commitments have intensified public distrust toward state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concern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文革 60 周年思考一二

作者：侯改英



今天我梳理了文革的基本脉络，是为了让出生在文革后的人结束对文革的碎片化认知，提供一个整体宏观的角度，方便大家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及人性等多个维度宏观对比分析。

以下为我梳理的文革十年基本脉络及时间线：

*文革发动的背景：中共因“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毛泽东被迫退居经济决策二线。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恢复农业生产，将原来的集体生产改为承包到户制。但因此被毛警惕权力分野，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文革发动的背景。

以下为正式脉络：

①1966年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以党、政、军、文各界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由，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夺取领导权开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②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响应，号召群众将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及“黑五类”等“牛鬼蛇神”彻底打倒。并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与旧习惯，号召群众全面“破四旧”。

③两周后，清华附中学生筹组了首个“红卫兵”组织，在获得毛泽东亲笔回信与先后8次接见后迅速席卷全国，并通过毛背书和官方“大串联”成为文革主导力量。毛不仅在接见红卫兵领袖宋彬彬时示意“要武嘛”，更亲自批转文件严禁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受到鼓舞的红卫兵除了对黑五类等展开残酷的抄家与批斗，更是在其后主导的“破四旧”运动中扫荡一切古迹和文物，甚至出现疯狂挖掘古墓鞭尸、俗人被强制剃度、僧尼被迫还俗

的猖狂暴行，直接推动了文革暴力的全面升级。

④1967年1月，上海工人王洪文领导工人造反运动，推翻市政府、批斗市委领导，开启了“一月风暴”。至此各地随后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进行夺权，保守派与造反派间爆发大规模器械武斗。文革自此进入更加暴力混乱的阶段。包括广西在内的多个省份更爆发了超过11起“非饥荒吃人风潮”等集体大杀戮。时任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超过2000万人，其中集体杀戮为主要致死原因。

⑤在毛泽东成功借用文革顺利收拢权力后，1968年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红卫兵等运动主力打散并摒弃。红卫兵组织因而陆续解散。

⑥1969年中共九大确定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以成功粉碎刘少奇复辟阴谋为由，下令解散了群众运动。

随后毛林关系恶化，毛公开宣称有人急于夺权搞分裂，剑指林彪，1971年9月13日，林彪全家乘坐军用飞机匆忙出逃苏联之际，却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此事件宣告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重要转折点。

⑦林彪死后，毛泽东以林彪推崇孔子为由借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为实现依靠阶级斗争牢牢把控核心权力的目的，毛大力扶持以江青为首坚持阶级斗争的拥毛派“四人帮”，意在发起新的运动批斗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改革派。于是全国文物再遭浩劫。

⑧1976年周恩来逝世，民众因不满“四人帮”压制悼念于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悼念与抗议活动，被毛泽东批准暴力清场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总策划并撤销一切职务，华国锋随即出任总理。

⑨同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共政坛出现权力真空。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党内元老逮捕“四人帮”，此举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记，华国锋随后接任中共中央主席。

⑩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四人帮”，江青等人被判处重刑。1981年，中共通过决议，轻描淡写的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

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文革十年的现实后果是：运动期间全民陷入阶级斗争大混乱之中，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国民经济与文化科技人才出现长达十年的惨重断层；在疯狂的“破四旧”等运动中，无数历史文物古迹毁于一旦；此十年间武斗所致的中国人整体个人素质和文明素养出现了严重倒退，语言行为呈现粗鄙暴戾化、理性与智识全面消亡，以至于文革思维作为文革余孽缠绕这代人阴魂不散直至肉体消亡，但这无疑也成为中国文革死灰复燃的潜在隐患；

另外十年中有4年国家财政经历严重赤字，文革结束时农民人均年收入仅76元（月均约6.3元），2.5亿人未解决温饱；更为惨烈的是，由于法治崩溃、国家机器失控和基层血腥的“集体杀戮”，导致2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人性扭曲、人伦撕裂与生灵涂炭的深重浩劫。

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浩劫，绝不能仅将其归咎于高层的权力角逐或单纯的群众盲从。

它是一场由极权独裁者运筹权力与普通盲从、贪婪、残酷等幽暗人性全面激荡、恶性共振系统性浩劫。在这台巨大的极权绞肉机里，独裁者在顶层“借风操纵”，普通人在底层“自愿充当燃料”，共同交织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深沉的悲剧。

中共在建政之初刻意设计顶层制度，在毛泽东居心叵测的权力攫取之下，通过两手合围，将全社会的怨气精准地转化为巩固极权、清洗政敌的武器：他通过制造阶级撕裂，利用建政初期留下的制度性不公（如土改承诺落空、严格的户籍束缚、严密的干部等级特权）在民间积蓄了深沉的怨愤。却又在关键时刻如赫鲁晓夫所说“需要人民的时候，就从裤裆里掏出来”，对底层抛出假意公正的“造反有理”特许状，定向引爆底层群众“望特权而不得”的嫉恨心理，成功将制度怨愤转化为群众自发撕裂社会的暴民狂欢。

并且中共在建政初期的造神运动的成功，使得独裁者拥有绝对的信息垄断权，并娴熟责任甩锅，转移矛盾。他将自己从“体制压迫的缔造者”摇身一变包装成“带头反抗修正主义的救世主”，诱导群众实施“责任外包”，盲目相信“毛主席永远是对的，错的全是下面的走资派”。

另一方面普通人的的人性弱点在恶的体制之下为何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研究纳粹的阿伦特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普通人的平庸之恶。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亿万普通人并非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在这场操纵中顺从了内心的幽暗，主动作恶：普通人自愿放弃了独立思考，将道德裁判权上交给领袖。在集体狂热和宏大叙事的催眠下，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神圣的“最高指示”，平日里温和的邻居、羞涩的少年，在此刻可以毫无心理羞耻与愧疚感地对同类施加最残酷的暴力。当“革命”的旗帜成为了满足私欲的遮羞布。为了合法的掠夺，平庸的无产者理直气壮地冲进别人家宅抄家洗劫、毁灭文物古迹；平庸的庸才通过写大字报扣帽子，踩着亲友同事的鲜血和尊严，完成了暴发户式的跨越与晋升。另外在“不激进即灭亡”的极端高压下，全社会陷入了囚徒困境。为了向体制自证清白、用至亲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安全通行证，夫妻反目、父子相残、学生告密。普通人把对体制的恐惧，残忍地发泄在更弱小的同类身上。

其实文革最深层的悲剧土壤，早在建政初期的制度设计中便已埋下。在高层的刻意引导与底层恶的宣泄之后，最终演变成砸毁一切法治与理性的暴民狂欢。

说到这里，当我们问文革还会卷土重来吗？我相信对事件拆解之后，每个人自有答案。

我的答案是，只要如上文革的“暴力内核还在，只要中国社会还如崔健歌词中描述的那样一块红布蒙住了双眼遮住了天，只要天安门城楼还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那么其治下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待哺襁褓，人们无疑都处于同一个时代。

侯改英6/1/2026NY
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六四研讨会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Reflections on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rking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essay outlines its historical timeline, political origins, social consequences, and human costs. It argues that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personality cults, and collective conformity enabled mass violence and cultural destruction. The author warns that unresolved ideological legacies and unchecked power continue to threate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persistent authoritarian habits and political narrativ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六四的焰火—民主

作者：烟青



六四距今37年了。37年过去，当初莘莘学子们热切期盼的政改依然没有实现，不仅没有实现，还出现了某些层面的倒退。比如言论的自由、新闻的真实，还有最近几天的外国投资管理34条体现的营商环境等。随着这些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倒退，民生益艰，社会叙事愈加荒诞。

上个月，湖南、湖北、贵州和广东发生了严重的洪灾，仅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就超过10万人受灾，特大洪水还引发了泥石流，多人伤亡。与此同时，远方的河南，也因为这场洪灾“轰动”了。原因是河南省伊川、宜阳、嵩县三支蓝天救援队因为跨区域救援这场洪灾。5月22日，被责令立即全员撤回，全队被给予书面警告一次。

2023年河北涿州洪灾更加严重，同样也是明令禁止民间救援，救援队在途中被要求立即遣返。这时候，没有灾情就是命令了，不说人命关天了！在共产党眼里，普通老百姓的命真不算命！

大名鼎鼎的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其救援资格都要被政府行政权力垄断，这才是要命的！不要以为他们是热心救援。其实，他们的心只是通过垄断救援来垄断捐赠。没有民间的救援，自然就没有民间的募捐了。不然，郭美美哪来的那么多干爹可以坑。

至于什么中国青基会、中华儿慈会，更是一伙牛鬼蛇神。同样是大河南，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项目区域负责人雷克，就因为掌握着本应该付给患儿的60多万募捐款，拖着不付来挟持着患儿的妈妈陪睡，每次给三五两千元，可前后总共也才给了不足二万元，后该儿童还是因医疗不足离世，这他妈真是畜牲不如！更可恶之处是你给那些捐赠者怎么想：我捐款不是在扶危济困，挽救生命，而是在帮你去祸祸别人的妈妈！

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它的政治结构同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权力来源是自上而下，那么，在这种制度下的权力参与者稍微一熟悉这种环境，真的是用脚

指头想都能明白，我只要依附好上级，其它的民生啊什么的，一切都不重要。所以你看得到上海读不到书的孩子家长会跪在教育局门口；城管会追着很多像夏俊峰的小贩满街跑；北京会驱逐他们认为的低端人口。

有人会说，我说的这些都是中共的下层官员们干的，中央上层领导还是好的，对于这个说法，我只想告诉你：下面烂完了，上面还是好的，那是梅毒晚期；再者，不要忘了：中国网球名将彭帅，风华正茂的年龄，被张高丽长期侵占的事。你们想想：专业网球运动员，那腕力和小臂的力量是多强啊，会抗拒不了一个70多岁的糟老头子？她只是抗拒不了强权而已，更不要天真的以为上面是好的，那只是他们想让你以为的。上有所好，才下必盛焉，上面才是那个“根”。

37年前的六四，先驱们为民主和宪政而争，为民族未来而争，为理想和知识份子的良知而争，虽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而且尚未成功，但她却真正开启了反抗中共铁幕的民主运动。有人说，民主又不能当饭吃，但是，从中共改革后到最近这几年的状况，难道还不能明白：没有民主，你最终连饭都没得吃！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如果孩子上不了学，下跪的应该是教育局；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没有谁敢随便把一些人定义为低端，然后驱逐吧，所以不要为你们的街上见不到流浪汉而自豪，更不要嘲笑美国的流浪汉。

2026.6.4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ireworks of June Fourth: Democracy

This commentary marks the thirty-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and examines how unfulfilled demands for political reform continue to shape contemporary China. Drawing connections between restrictions on independent disaster relief, charity scandal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abuses of authori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undermines public welfare and civic trust. The essay maintains tha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ccountability, free expression, and meaningful citizen participation are essential for protecting rights, strengthening social resilience, and improving everyday life.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 the author warns, recurring injustices will persist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ontinue to limit transparency, opportunity, dignity, and public oversight mechanisms nationwid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铁窗求生的社会之殇

作者：木弓五世 木弓独响

《警察与赞美诗》是美国作家欧·亨利创作于1904年的经典短篇小说，曾入选中国高中语文教材。小说描绘了流浪汉苏比在严冬中为求温饱而屡次试图犯罪入狱却屡屡失败，最终在教堂聆听赞美诗时心灵受到感化，却意外被捕的荒诞故事。该小说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底层民众生存困境以及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的荒诞性，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然而，这种文学中描绘的资本主义的荒诞与悲剧却在我国现实中接连浮现：2008年9月，湖南衡阳祁东县的七旬老人付达信因生活无着，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女生，被捕后直言“希望能判重一点”，以求在监狱中获得基本生活保障；2021年8月，浙江永康市打工青年陈某因经济窘迫、流落街头，为获得食宿而抢劫超市；2025年10月26日，37岁的曹某在上海浦东某金店砸碎柜台玻璃，动机竟同样是寻求监狱庇护……这些事件不再是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的文学讽刺，而是现实版“求生型犯罪”的真实而残酷的写照。

一个健全的社会本应具备层层防护机制：社会救助体系为真正需要者提供

庇护；心理健康服务及时干预绝望情绪；就业支持系统帮助个体重建谋生

能力；政府组织则承担起兜底保障的责任。然而，当这些系统存在漏洞或衔接不畅，便有人从缝隙中坠落。当基本生存成为奢望，铁窗竟成为某些人眼中最后的“避风港”。

这些为求生而触法者，其行为虽违背法律，但其背后的求生本能却折射出社会保障体系中某些未被阳光照亮的角落。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维护尊严的权利。当一个人为了生存主动放弃自由与尊严，当“监狱生活成本”低于“自由生活成本”，当铁窗内的三餐暖食胜过街头的饥寒交迫，这已不仅是个人悲剧，而是全社会必须正视的命题，更是执政者亟需回应的国家议题。

让每一位国民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是对执政者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实中，农村贫寒子弟上升通道狭窄，城市平民在生存线上挣扎，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断裂。部分年轻人因看不到希望而选择“躺平”，

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人口面临断崖式下滑，社会活力受到抑制，集体迷茫情绪蔓延。容身之所与温饱之需本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却有一些人被背道而驰的疯狂碾得粉碎，被迫走向极端。

当颤抖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实施毫无技术含量的抢劫，只为换取牢房中的一餐一宿；当犯罪不为财富，只为获取一张“监狱门票”；当监狱成为理想中的避难所，而自由与尊严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那么社会的健康秩序必将受到侵蚀，整个社会大厦长期积累的问题一定积重难返，轰塌之日定然摧枯拉朽，猝不及防。

近期上海曹某抢劫金店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舆论同情。可以预见，他将如付达信老人一样获得宽大处理。付达信不仅获得减刑与生活照顾，出狱后更入住新房，享受特困养老补助，过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生活，其荒诞经历甚至被当地政府包装为“老有所养”的正能量故事。

鲁迅曾言：“打断你的腿，再给你一副拐杖，然后告诉你，没有我，你连路都走不了，所以你要懂得感恩。”

我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警察与赞美诗》的现实版故事未被公开，但中国人素有将“丧事”办成“喜事”的传统，以彰显仁义与治理成效。故事公开与否，各有其逻辑与考量。当然，我们衷心希望，在有人递出“拐杖”之前，不曾有谁的腿被先行打断，感恩方能顺理成章，尊严才能真正回归。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The Social Tragedy of Seeking Survival Behind Bars

*This essay examines several Chinese cases in which individuals deliberately committed crimes to obtain food, shelter, and basic security through imprisonment. Drawing parallels with O. Henry's *The Cop* and *The Anthe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uch survival driven offenses expose gaps in social welfare, mental health support,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When prison becomes more accessible than social assistance, the article contends, society faces a profound crisis of dignity, trust, and governance for vulnerable citizens experiencing poverty, exclusion, and hopelessness toda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注水文凭的经济学逻辑

作者：杨绍政

一、注水文凭是怎样产生的？

文凭是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一定质量标准以上的证明文件。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达到一定质量标准是指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的学习。每一个专业都有一定数量的课程学习。每一门课程都有学时数规定。通过一定的学时数的学习，考试合格。2、实践学习。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教学，经评定合格及以上。3、毕业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或理论，综合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培养和训练。研究成果经评审，达到合格。4、达到学校对专业学习的其他规定要求。如果一个学生在以上4个培养环节都达到了学校认可的标准及以下的水平，那就说明这个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以上。这个学生获得的毕业文凭就是这个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规定标准以上的证明书。

如果上述4个环节的至少一个环节没有达标，说明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将不能获得证明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标的毕业文凭。如果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学校却颁发了证明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标的毕业文凭，那么这份毕业文凭就是注水文凭。注水文凭实质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注水文凭是以隐蔽的形式将文凭颁发给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的学生。上述4个培养环节实质上没有达标，在形式上、成绩上可以达标。比如说课程的学习，学生的学习学时数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当然原因可能是老师违规，也可能是学生违规。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达标，这也可能是老师的授课质量有问题，也可能是学生学习投入性不够。这些问题最终反映到学生的学习成绩上的真实状况就是这门课程没有使这个学生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如果这个学生在这门课上本该不合格，最后在成绩评定上却合格，那么这个学生在这门课上就是以不合格冒充合格，其他课程和培养环节以此类推。这样表面上看似合格的成绩，本质上却是不合格。最终从各培养环节这个表象和形式上看这个学生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而获得相应的毕业证书，但实质上却是不合格产品，因而他获得的文凭本质上是注水文凭。

注水文凭的提供方可以获得额外收益。如果注水文凭是学校主动生产的，那是因为生产注水文凭的各类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可以比合格文凭低和少。在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低质量的投入要素和投入数量不足可以降低学校的投入成本，从而获得比生产合格品更多的额外收益。如果注水文凭不是学校追求的生产目标，在各种投入要素收益给定的情况下，各种投入要

素的生产时间越少，投入的强度越低，那么单位时间、单位投入的收益就越高，因此各种要素所有者从自身利益出发，有主动偷工减料的动力。

要生产合格的产品，各种投入要素的时间投入要保证，投入强度要保证。也就是说各种投入要素足够的生产时间和工作强度才会产出更大比例的合格及以上的产出，相反，各种投入要素的较少时间投入和较低的工作强度将产出更大比例的不合格品。在各种投入要素追求较低时间和质量投入而可能导致更大比例的不合格产品时，学校如果要追求降低注水文凭的比例，那么就必须要加强管理，以提高各种投入要素的足额时间和质量的投入。加强管理可以是加强管理和改善管理，以使各投入要素的投入数量和质量得到更准确的计量，也可以是确定激励各投入要素努力提高投入时间和努力的薪酬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这些强化管理的各项投入都会引起成本的增加，当然也会使注水文凭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如果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偏好是一样的，甚至社会更偏好注水文凭，那么学校以降低注水文凭比例为目的的强化管理既是逆社会的大系统、大环境行事，又会增加学校的成本投入。如果是这样，那么学校就极不理智。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校的理智选择就是减少管理投入，甚至是主动追求注水文凭的生产，以降低学校的生产和管理成本。

由此看来，在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需求没有区别，甚至更偏好注水文凭的条件下，生产注水文凭将是文凭提供者满足社会需要的理智行为和常见现象，而提供真实文凭将是逆社会大环境而动，费力却不讨好的事情，注定是要被这个所谓的大环境淘汰掉的。因此，真实文凭稀缺，甚至是绝种，注水文凭盛行猖獗是特定社会规则下个体理性选择的必然产物。

二、注水文凭的性质

要从需求的角度分析注水文凭，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注水文凭？什么是真实文凭？我们可以借用注水猪肉来透视注水文凭。我记得以前电视上经常播放注水猪肉的新闻。你们知道注水猪肉是怎么产生和生产的吗？猪肉销售商在新鲜猪肉里面注上水。注水以后，猪肉就增加了重量。假如新鲜猪肉重量为二百斤，注了二十斤水后，整个注水猪肉的重量就是二百二十斤，其中的二十斤水按猪肉价格进行出售，可是水的价格非常低。因此，注水猪肉的本质是通过猪肉的形式，这种表象，把水当作肉来出售，猪肉销售者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同时猪肉的购买者支付更多的货币，蒙受了损失。销售注水猪肉的行为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欺诈行为。与注水猪肉

类似的地沟油、毒奶粉等都是商业欺骗、商业欺诈。

那么注文凭是什么呢？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说西南大学大约在2009年入学的博士，50%以上都是政府官员。我也曾经看过以前党校滥发文凭的新闻。后来发现党校文凭的含金量很低，和同类其他全日制大学相比，差距很大。据说由于这样的原因，党校文凭在很多单位不被承认。现在估计中央党校是个例外，中央党校在招博士、硕士研究生。但是许多省级、市级、县级党校文凭据说存在质量问题。我自己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们全校一个年级一百零八个硕士研究生，没有一个是全职的。都是全脱产来读书。当我读博士的时候，我所在年级的同学中许多是政府部门官员、企业老总，但是基本都很少来上课。没有上课最后如何评定成绩，当时我不是老师，不敢妄加评论。但是他们很多还是获得了博士学位却是真实事实。

官员、特别是厅级及以上的官员据说非常忙，日理万机，这么忙，读博士、硕士，或者函授能保证基本的学习时间吗？各培养环节能得到质量保证吗？如果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官员获得的文凭是不是能够证明他们是合格产品？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就是假冒伪劣的不合格产品。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注水文凭。

文凭就是一张纸。这一张纸证明你，假如是本科生的话，在大学学习了四年，各个培养环节都合格了。根据大学的规定，你被准予毕业，授予学士学位。同理，如果你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那么可以被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准予你毕业，本质意思就是你至少达到了学校认定的各个培养环节的基本质量要求。这些要求达到以后，至少说明你是一个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达到了至少合格的水平，你是一个合格产品，准予出厂，准予出校。

这就相当于企业生产的产品，通过各个环节的生产和检测，被准予出厂，至少说明产品是合格及的等级。相反，如果是不合格或者次品，一般厂家会怎么做？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市场环境下，不合格品不准予出厂。不合格产品出厂销售给消费者后，会影响生产厂家的声誉。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市场中，企业的产品需求会大幅度减少，客户会被吸引到它的竞争对手那边去。因此，产品是合格品还是不合格品对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

同理，文凭的本质是个人通过一定年限的学习和培养环节，人力资本达到一个规定标准之上的证明书。也就是说，你的文凭证明你是合格品——你的人力资本至少达到了认定的合格的标准。

注水文凭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说货真价实的文凭本质意义上证明你的人力资本达到合格品至上。注水文凭本质上是讲，你的人力资本没有达到最低质量标准，但还是给你颁发了你的人力资本达到最低质量标准的文凭。因此，你真实的人力资本远远低于文凭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给你发了一个文凭，这个文凭从表面上看，

和其他的文凭没有差异。但是这一纸证明书它本质上想证明你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合格标准之上，但是实际上你没有达到要求。

本质是不合格产品，却给你颁了合格证，让你出校。这就是注水文凭的本质。注水文凭本质就是不合格的人力资本，冒充合格人力资本的现象，也是一种欺骗、欺诈行为。

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有没有差异？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区别非常大，是合格品和不合格品的区别。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区别。

注水猪肉和注水文凭之间还有区别吗？如果买猪肉人知道猪肉被注了水，他会不会买？他绝对不会买。但是注水文凭呢？你们知道谁需要注水文凭？你们到这里来读书，是你们需要文凭。你爸爸妈妈花了钱要你们到这里来读书，也希望你们获得文凭。但是，你们会发现在注水文凭的生产环节中，文凭的需求方是直接参与其中的。文凭的需求方完全知道文凭注了水，而且还主动参与注水。这说明文凭的需求方愿意要注水文凭，有这个需求。

注水猪肉和注水文凭的区别就是注水猪肉的生产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买猪肉的人被卖猪肉的人欺骗了，但是文凭需求者明明知道是注水文凭，却还是会付费获取，而且还会与文凭生产者合谋制造注水文凭。

注水猪肉的销售过程是销售方单方面在作假。但是注水文凭的需求方，就是你们，包括你们的父母，知道文凭被注水了，却还是想要这个注水文凭。请问，文凭需求方受骗了吗？没有。文凭需求方本身就在与注水文凭生产者一起合谋制造注水文凭。

我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案例。我有一个朋友，给研究生上课。用的是与哈佛大学博士生课程同等难度的全英语教材，用英文讲课，全英文板书，习题的讲解和证明都是全英文，而且是全英文考试。上满54个学时。但是另外一个人，54个课时，只是上4或者5次课，而且这4—5次课还是让学生自己课后去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上课学生上来讲，老师来点评。在座的各位，请去读一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看看能不能看懂？老师没有一点真功夫，能把《高级微观经济学》讲下来吗？但是很奇怪，参与课程学习的同学，没有一个对这位老师的行为有质疑或者异议。请问这些学生和这个老师在《高级微观经济学》这门课上是不是合谋制造了注水文凭？这个例子说明文凭需求者获得注水文凭不是受蒙蔽，他们知道这个注水环节，还和生产方一起共谋制造注水文凭。硕士论文的撰写是为了让研究生研究能力达到一定水准，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定的质量标准。我带的两名研究生居然致谢部分可以一模一样。其中一位居然可以把贵州大学学校简介完整地搬进硕士论文中去。他肯定知道，这是注水文凭的制造，可是他愿意这么做。他知道把指导老师这一关蒙混过关，评审、答辩

老师通过、认可，其他条件满足，他就能获得硕士文凭。请问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自己就有愿意生产注水文凭的强烈动机？

由上可知，注水文凭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现象。它的实质是文凭需求者没有达到规定的最低质量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却冒充达到了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及以上的水平。如果对这种没有达到最低规定的人力资本标准的这些学生提供了达到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的证明书，那么这个证明书就是注水文凭。这个概念的界定比较重要。你把这个事情要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清楚，我们下面无法讨论。

注水文凭的生产流程学生在注水文凭生产流程中的作用这里我大致地讲一下。在讲案例分析时还会详细讲。学生是文凭的需求方，在生产注水文凭的过程中，充当了注水文凭生产的合作者。没有学生的参与，注水文凭是生产不出来的。或者说不会轻易生产出来的。这是一类学生。

还有一类学生，比如考试时学生主动作弊，有老师参与吗？老师没有默许你们作弊，你们是主动偷偷作弊。

我是在乱说话吗？我说有些学生主动作弊。你们主动作过弊没有？到现在为止，你们作过弊没有？你们能不能保证在贵州大学三年时间考试不作弊？能保证吗？不一定。我告诉你。

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杨绍政教授随笔集的读后感》，是我学生写的。我给你们看一看。

“看了你写的文章后，我想有个真相得告诉您。就像你说一个政党打算从良的话，应该敢于面对丑恶的过去。据我所知，2008届经济学院研究生的各学科期末考试中，抄袭的学生比例是百分之百。你教过我们《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通过两次考试，我发现不抄袭成绩肯定低，抄袭了没有任何风险。并且成绩不会很差，不会使得老师失望，也不影响奖学金的评定。如果选择举报，我将得罪大多数同学。我将在同学中变得另类，遭到孤立。从小学开始，我考试都不作弊。但是在这里，权衡利弊后，我只有选择和大家一起作弊。但是我想说，我真的好好听课了。也认真听课了。也认真复习了。假如大家不作弊，我考的成绩肯定比作弊的低，但是和其他同学横向来看，肯定比大多数同学成绩高。在公平考试的条件下，我更有利于获得奖学金。因为可以和他们拉开差距。但是在不正常的制度环境下，人人被逼的考试作弊。”

听了以后你们有什么感想？我以为他们考的很好。英文考试，不是开玩笑的。我教过两届。从后来我了解的情况看，不单是我那科作弊，作弊的学科那太多了。

据我了解，大多数老师上课的时候，36个学时上一半的课就相当不错了。像杨老师这样上课，绝对是蠢蛋。知道吗？蠢蛋。所以你们很讨厌我。蠢蛋给我们上课。我们跟偷工减料的老师上课还可以玩，多轻松呀。

我这么多的学生，最看重这个学生。他说“像杨老师你这样正直的人，一定会跟考生作弊。可是我看你注水文凭的分析，你假如是正直和负责任的心理，在考试时严打作弊。使一部分学生挂科。你这种行为本来是正义的行为，说不定被一些没有良知的学生陷害，他们也许会像您写的有一篇文章提到的那个学生一样举报自己的老师。你挂学生，贵大学生作弊传到外面，学校领导觉得你在惹事。所以你会出力不讨好。而且会像你文章里说的——在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没有区别，甚至更加偏好注水文凭的情况下，生产注水文凭将是文凭生产者满足社会需要的理智行为和正常现象。而提供真实文凭却是在干预社会大环境相背离而费力不讨好的蠢事，注定要被这个所谓的大环境淘汰掉。因此，真实稀缺或者绝种，注水文凭盛行或者猖獗是特定社会规则下，个体理性选择的必然产物。”

这是我刚刚讲的注水文凭生产流程中学生主动作弊的案例及其分析。

老师环节有没有生产注水文凭的可能性？教师这个环节的证据不是我写的。也是我的学生写的。“去年我们刚入学的期末考《政治经济学》，有一个老师在临考前让我们加一下他的系统。而且考试前就有消息。考试题目就是系统里面的原题目。而且附有答案。我不信哪里有这样的事情。那回我踏踏实实坐在慎思楼上复习了一个星期。考试前一个晚上同学拿到试卷在走道上背《政治经济学》。我关掉灯在被窝里背《政治经济学》。考试虽然很轻松，但是我真的信了。原题，一个不差。这下我长见识了。唯一庆幸的是我考得好。不然的话我会气出病来。但可恶的是同学们在泄题的情况下还在抄袭。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么不自信的学生啊。看一下，如果过程是这样，我们没有必要渴求结果的公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讲真话，做实事的人是得不到尊重的。那些爱护老师的学生，爱护学生的老师都是另类。”

管理层环节有没有产生注水文凭的可能性？照样是这个学生写的证据。“上学期，由于第九届民运会，我们班有四名学生是志愿者，没有参加《微观经济学》考试。按照教务处的文件，他们申请免考的科目按75分处理。但最后结果是他们4个缺考。后来这些学生拿着证明找老师修改分数，都是75分。但是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教务处的公章，或者领导的批示就可以让一个没有参加考试的学生有了75分高分（这一科目75分在我们班是高分，班上四十二个同学有十多个挂科）。他们没有参加考试，怎么就能够有分数呢。教师是有自己权益的，行政命令也不能让老师撒谎。而且并没有达到老师的及格标准。后来由于我们班挂科同学数量太多了，院领导就批评这位老师，你怎么不爱护你的学生呢？哈哈，什么叫爱护呢？难道是在临考给学生复习十个题目，考五个就是爱护？你们爱护学生的方式就是不让挂科？”

这是这个学生讲的。这个院领导因为这个老师没有按照行政命令打75分，这个领导把老师威胁臭骂一顿，但还是没有得逞，所以到更高级别领导那告恶状。老师不给没有考试的学生评定75分，没有关系，我们行政领导直接下命令让管理人员到教务处系统给这些未参考学生直接填上分数不就行了吗？

我请问，这个老师在贵州省这个地方工作，是不是愿意和省领导、校领导，包括院领导作对？他知道和这些人作对，他没有什么好下场？他怎么敢和他们作对？他经常说，他的胆子很小。他从来不反对学生在学为主的情况下，多做课外活动。搞好学习是专业技能提高的重要环节。参加课外活动是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和提高的有效途径。高校既要培养专业技能比较强，又要培养综合素质比较高的学生。所以这位老师从来不反对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包括民运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课外活动不能冲击教学秩序，课外活动包括其他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活动必须以保障学生正常的教学秩序为前提。如果这个大前提搞不准，没有保障。那就说明我们学校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有失偏颇。

志愿者本质意义上讲是热心公益事业的人的自愿行为。贵州省招聘志愿者，既可以在省内招募，也可以向全国招聘志愿者。当然学生也可以自愿成为志愿者。如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学生来做民运会的志愿者，然后承诺学生——参加民运会志愿者，可以不去上课，成绩直接被评定为75分。那如果其他学生也不来上课，教学秩序如何维持？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事件所涉及的政府部门、校级层面、院领导的行为表明，本质上讲他们并不认为这一门课生产那种合格文凭有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没有达到最低质量标准，我也可以给你最低合格率以上。请问他们作为管理层有没有嫌疑提供注水文凭？

这个学生还有一个证据。“很有意思的一次，我去教务处办事。在门口遇见C同学，我问他干嘛？他难为情地说，我挂科了，来找洛老师。我都不好意思，找了八次了。哈哈，分数不仅可以考出来，而且可以改出来。纵使这样的情况是少数，或者有能力强的人。但是对他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估计的。那么什么是平均分？什么是综合测定成绩？分数都是这样。综合测评就不需要继续证伪了。”

这个不是我讲的。我从来都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我这样讲，有些同学听了很难受。心里把杨老师恨死了。你把我们的秘密都揭露出来了。是不是这样的？写文章的是有良知的学生。

其他我不要多举例子了，你们班上就有。我就举这个例子。你们这里有八个留学生。一直来求我——是不是留学生的考试另行对待？言下之意，我们是留学生就照顾一下，难度低一点。就是不一样。寻求优惠政策。但是优惠政策结果也就是你的含金量比他们低一点。同样80分和其他同学的80分不一样。所以我和你们讲，

标准是一样的。你们现在还有那么长的时间。他们在跑，你们可以跑得更快。

本科生也是这样的。国贸的几个本科留学生，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跟我要求了很多次——希望特殊照顾。那样没有用。那肯定一视同仁。最后他们参加统一的考试，5个留学生，2个一次考过，3个补考也过关了。说明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学生也能行的。

注意我的考试，补考就一定能过吗？不一定哦。曾经有一个本科生，直到清考都没有过。毕业以后一年再考，真的打了60分以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通过作弊的方式或者几箱茅台酒给某个管理者，提前获得了考题？不了解的情况，我不能乱说话。在我这里，我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注水文凭的提供和注水猪肉的提供是不是一回事？不是啊。注水文凭的生产流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求者照样在里面。注水文凭生产和提供，学生、教师和管理层都有作用。凡是领导不作为，都是在蓄意生产制造注水文凭。凡是那些老师不认真授课的也是在生产注水文凭。凡是学生主动作弊或者和老师一起合谋作弊，或者和管理一起合谋作弊都是注水文凭生产的贡献者，没有什么说的。

真实文凭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给你文凭证明你的人力资本达到了一定质量标准之上。那么你实际能力资本确实达到了合格品以上。那么这个证明书证明你的本质和实质是一致的。那就说明是真实文凭。那么真实文凭有什么用？如果那个文凭证明你自己的人力资本。你去找工作。实际给厂家给用人单位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这是最核心的东西。真实文凭是证明你真实有能力的证明书。那么东西就是文凭。你拿给用人单位，就是一个信号。你的人力资本是合格的。这个真实的显示。

如果是注水文凭，那么就是一个虚假显示。那意味着你在欺骗用人单位。是不是在欺骗用人单位？我们下节课来分析什么样的制度环境需要注水文凭？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三、经济组织的产权主体和注水文凭的需求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如果社会各个行业的竞争程度比较高，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也比较高，而且竞争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在社会所有行业中所占比重比较大，那么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没有需求。这个时候，整个社会所需要的，是真实文凭，而不是注水文凭。

我现在想给你们追加一个问题——在整个社会竞争程度比较高，也就是社会各个行业竞争程度都比较高的环境下，是不是所有的经济组织就一定有动力需要真实文凭，或者高质量人力资本所有者呢？这些经济组织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还是不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而是需要水货呢？

竞争程度的高低是一个维度，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维

度——经济组织的产权主体。社会各个行业竞争程度比较高，但是，竞争程度高的行业里面，企业的组织形式有不同种类私人企业和公有制企业等组织形式。

私人企业，它的各种产权比较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则存在一系列值得探讨的现象。面临同等激烈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从组织本身的优劣角度，现在有没有基本的共识——国有组织的组织效率低于非国有组织的组织效率？

是不是一定就是非国有企业组织效率高？曾经有人问我，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为什么有些国有企业还搞得那么好呢？私营企业效率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私营企业破产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从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国有企业的组织效率从一般意义上确实要低于非国有企业。但是，这里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我不想在这个地方给你们展开分析。

如果国有企业也在这个行业里面来竞争，那么它有可能怎样？在这个情况下它可能竞争不过其它企业，可能被淘汰。国有企业真正的产权主体是谁？或者说它真正的股东是谁？是全体国民。比如说，贵州省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谁？是贵州省四千万公众。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确实竞争不过其他企业，就可能要失败，可能要被淘汰。这个时候国有企业真正的所有人没有在场，对自己的财产想关心，但无能为力。那国有企业所谓的经营者的有没有可能把所有者的这一部分财产转换成他自己的一些利益、一些收益？转化以后，虽然国企亏损了，倒闭了，但是经营者会穷，会受损吗？穷庙富方丈，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国有企业未必就能竞争得过其他企业。又没有给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没有优惠政策，政府保护国有企业也不可能了。经营者知道去社会中生存太难了，就可能通过侵吞所有者的利益来为自己谋求后路。因为你所有者是四千万或者十三亿，你能来保护和关心国有企业的资产和经营吗？你明明知道企业里面有你的十三亿分之一的资产，经营者要吞占，你作为个体只能占十三亿分之一，你能怎么样？你去举报他，保护你这十三亿分之一的资产，行不行？你保护的成成本支付很高，但是你的收益很低——你获得的只能是你保护资产中的十三亿分之一。

从经济学这个角度来看，你的行为是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你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它的外部不经济非常大。你保护你的权益，所得收入的一减去十三亿分之一被别人拿走了，你只能获得十三亿分之一收益。几乎所有的保护成本都是由你来承担。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请问，你明明看到你的利益受损了，作为个体，你有没有动力和积极性去保护你的所有者权益？这个动力是非常弱的。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明明这个行业竞争程度比较高，面临这样一个体制，经营者有可能怎么样？企业的高利润是所有人的，是十三亿人的，跟经营者的利益关联不大。既然经营者的利益与所有者损益的相关性不强，那经营者为什么要

努力发现、寻找高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去增加所有者的利润呢？高人力资本所有者让企业所有者获益了，但是我经营者收益没有增加，那我可不可以就用水货，而且水货还可以增加我的收益和效用。第一，你水货可以是我的亲戚，是我朋友，是我的裙带关系。第二，不是我的亲戚、朋友，可不可以通过雇佣水货，让他给我各种好处，货币的和非货币的，能使我的这个负责人的个人效用增加，来获得满足。这样，国有企业亏了，倒了，没有关系。你倒了，我这个经营者获得了最大收益。如果是这样一种环境，那是不是竞争程度越高，这样的企业组织对真实文凭需求就越高呢？我想也不一定。

所以这里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竞争程度比较高，垄断程度比较低这一个条件隐含一个前提：企业组织形式的效率应该没有根本性缺陷；还有，整个社会的法制，法律体系没有根本缺陷，法律的可执行性那也是相对比较健全的。

只有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你的竞争程度比较高，才是真实文凭所需要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也就是说，行业竞争程度高，社会各个行业之间竞争程度高，竞争程度高的行业在社会所有行业中所占比重比较大，本质意义上讲，它还有一个潜在假设条件，就是各个行业，或者说各种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没有根本缺陷。如果社会微观经济的组织形式违反一些基本的常理，那它的组织形式就不一定很高。

基本常理是什么呢？经济学常理讲，人是自我利益的最好看护人，也就是亚当斯密的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但是，你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去损害别人利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不以损人利己来获取收益，那么你看好自己的利益，通过运用各种自己所拥有的投入要素获得各种使用机会，使自己的收益增加。这是社会的总财富的增加，是帕累托改进。

但是，如果你所拥有的资产或财富，你不能自己来保护它，或者说你作为一个所有人集合没有权利和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反而只能让别人来保护你的财产，那么，假如别人有机会主义倾向，想要侵吞你的利益、你的财产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保护它。请问这种状况是不是违反了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看护人这么一个基本的常理？

上次课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说，假如你买了一辆铲车，铲车是你花了五十万去买的，肯定它是你的资产。但是这个铲车，你不会开。你雇了一个司机给你开。这个司机开这个铲车，经营你的财产的时候，你无法对你的铲车行使作为铲车所有人的全部职能，而是由你的雇佣人——司机来行使。他行使结果怎么样？铲车去挖土石方，每天挣的收益情况你不知道。然后就凭他给你讲收益情况。他讲了以后，你不能对他的行为和说法有任何怀疑。不仅如此，你还要表示永远忠于他。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他把你花五十万购买的铲车每天

获得的收益吞占了，却对您说生意不好，没有利润，甚至是亏损。有没有这个可能？铲车及其利用铲车获得的收益本来是你的，他却把它看成他的，最后把你的变成他的。他是从他个人利益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尽可能来蚕食你的资产。尽可能使你资产的利用，能够带来他个人利益和个人效益的增加。

这样一种状况，相当于你拿你的东西，去给别人办事情。请问，这个是不是违背最基本常识？我刚才讲组织形式实际也是这样。

四、注水问题的案例分析之一

——学院办公室资源配置与注水文凭的生产

截至现在为止，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视角，我们分析了注水文凭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注水文凭存在的制度条件是什么？唯一可能导致注水文凭不存在，即真实文凭盛行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从需求角度，需求文凭的社会各个行业之间竞争程度非常高；从供给的角度，文凭供给行业的竞争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只有在需求和供给这两方面都竞争程度非常高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盛行的才是真实文凭。当然，即使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有没有可能有注水文凭？有可能有。但那样的注水文凭现象不是垄断制度产生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产生的。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

在其他的三种情况下，社会盛行的基本都是注水文凭。一种情况是整个社会各个行业竞争程度低，政府维持的行政垄断程度比较高，文凭供给行业的竞争程度高；另一种情况是整个社会各个行业竞争程度低，文凭供给行业是垄断程度比较高，或者垄断程度比较低；第三种情况是文凭供给行业、还是需求行业的竞争程度都低。这三种情况都是注水文凭盛行。这是我们的分析结论。

这些结论可不可靠？要通过案例来验证。今天我们主要是用案例来验证这些结论。我们还是按照顺序来逐一分析。

学院办公室资源配置问题。这个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就是《西部G大学J学院办公室资源的配置问题》。你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2008年底，新的J学院领导班子到任后首先想到的是解决J学院领导成员的办公室问题。院长、书记的办公室就自然使用了上届院长、书记的办公室。副院长的办公室就把原来MPA办公室占用了。另外一位副处级组织员的办公室安排不详。当时的矛盾就是上一届一位副院长的办公室没有交出来。我猜想如果这间办公室交出来，这位副处级组织员的办公室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有领导不都圆满地解决了办公室问题了吗？当然西部G大学J学院以外的其他学院也是同样的做法。学院领导的办公室条件要优先考虑。我还没有见到哪一个学院会有反例。但是，我还是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能够打破常规有新气息，我希望新领导能够暂时安顿下来，就现有的办公条件做一个统筹安

排。院领导，各系科室，教授、博士各占一个比重。在这样的办公室资源分配中，院领导的比重就要下降，系科室和教授们都有一个办公的场所。虽然这样很紧张，很拥挤。可是现实让我失望了，领导班子优先考虑自己的办公场所，导致其他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博士没有任何办公场所。要知道这些教授、博士一年带的各年级的研究生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他们和自己指导的学生进行交流讨论的场所都没有。这样一来，院领导班子就有了和学校领导讨价还价的砝码。学校给我的办公条件太少了。使学校的老师没有基本的办公条件。因此，学院教师条件的改善，要通过学校的努力，和学院没有关系。果真如此吗？学校的办公条件再扩大三倍，按照领导班子现有的思路，先满足行政领导和行政人员，落到教师头上的办公条件也会所剩无几。按照领导优先，行政优先的原则，办公室的条件改善了，院领导办公室的标准不就可以从独立办公室扩大到独立套间吗？两间室或者三间室的。行政人员也可以按照单人独立办公室的标准来配置。到那时教师的办公条件差还是可以成为向学校讨价还价的砝码——学校投入不足。如果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学校对各学院的办公条件的投入很难满足。如果院领导班子不是领导班子优先、行政优先的思路，而是本着教学优先、科研优先，统筹安排思路，那么在现有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至少在办公条件的配置中，可以按照教学人员，行政人员，行政领导给予一个大致的比例划分。然后在各个人群中，进行有利于更好开展工作的配置。办公室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院领导为什么不可以两个人三个人一个办公室？就一定要一个领导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呢？就是中国大陆的高校中间，我见过三个院领导共享一间办公室的学院，也见过所有领导全部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各自使用独自工作平台的学院。当然由于他们的办公条件确实有限。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也没有办公条件。不知道这些学院的办公条件改善了，是不是也是领导优先、行政优先？如果我们的院领导放弃了自我优先，行政优先的思路，那么西部G大学J学院现有的办公资源完全可以配置一部分给没有行政职位的教学科研人员。在这样的条件下，老师们，导师、学生有一个交流研讨的平台。无行政职位的教学科研人员到了学院再也不会感觉无立足之地，不会感到是局外人。当有老师将这些情况讲给这个J学院领导时，获得的回应是嘲讽、讥笑。那个院领导甚至对这个老师说，我把我的办公室让给你使用吧。以为是这位老师在挑刺，在找麻烦。有的院领导则毫无反应地应付着。

为什么J学院领导班子要推行领导优先，行政优先的思路呢？为什么教授、老师们的办公条件得不到丝毫的统筹考虑呢。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J学院领导班子会去推行教师教授、博士优先和教学科研优先呢？如果有可能我会一一剖析。

我看到你们这么多人头这样趴在这下面的时候，我

就知道我读那些东西对你们而言没有影响。

前不久，我到北京去，就是到北京去听了一门本科生的课，也令我很震惊，这不是中国第一学府吗？但是我看的老师在上面上课的时候，下面学生大概有一半的学生，他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玩电脑，有的在搞自己手中的活。这次我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跟他们讲，我是贵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希望向他们学习，能听听他们的课。我只有半天时间，刚好他们给我查了课表，说有李玲教授在上卫生经济学。李玲教授，虽然我不认同她的一些学术观点，但是我认可她是一个很有学识的学者。但是最后令我很失望——研究生的课堂里面只有学生，没有老师。我问身旁的学生，老师哪里去了？答曰：老师开会去了。老师的课会不会补呢？答曰：一般情况不会补。老师即使到课堂上课，也是学生讲，老师听。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深度思考呀。

今天我还听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我是一个对生活非常好奇的人，知道吗？它们里面很多新的东西都会让我产生思考和联想。今天我碰到G大学一个博士也是G大学的所谓老师。

请问你博士是哪读的？

答曰：就是在G大学读的。

学什么专业的？

答曰：计算机专业的。

导师是谁？

答曰：导师是某某某。

我说您导师是研究什么专业的？

答曰：他老师的研究方向和他带的博士的专业完全不对口。但是这个人以前是领导，我跟他以后，我到国内去进修，去听课，或者到国外去访问，他可以给我这些机会。所以，跟了他以后，这方面是有好处的。

他在专业方面有没有可能给你帮助呢？

答曰：没有帮助。

我问他：如果说你自己换了另外一种情况：考博士的时候，考另外一个，比如说是世界一流学者，就是研究这个专业的。他知道国内最前沿、国际最前沿在哪个地方。你跟他一年甚至两年以后，你自己就已经进入前沿了。你那个时候考虑的问题，是突破前沿的问题。但是你现在和这个老师在一块，他不是研究这个专业的，却敢来这个专业带博士生。您没有感觉到会被耽误吗？

他问我：假如说你有这个机会，不是研究这个专业，有机会在这个专业当博导，那您愿不愿意去当博导呢？

我说我不会。

他说：那就是人和人确实不一样。

我说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同志。比如我不懂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我的计算机有问题，我找你帮忙修计算机。如果你不是计算机方面的行家，那么你一定不会说，我来帮你忙，我给您修。你帮忙没有效果，修不好的。相反，你会说，计算机我真的懂得不多，不能帮

您，但是我知道某某人对计算机很熟悉，他是个行家。你找他吧。他准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但是这就奇怪了。高校的老师也有专业分工。一个老师在这个专业很行，在其他专业很可能是白痴，你不可能懂那个专业的。您从事的专业没有博士培养资格，那你就别带博士生啊。你这个专业没有这个能力培养博士，你要去您不熟悉、不懂的专业去带博士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高校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了。

这个学院办公室配置是什么问题吗？J学院办公室配置不是真正为教学服务的。它是按照谁拥有行政资源，谁拥有行政级别，谁就可以享用那些东西。它是行政优先，领导优先的，它不是科研优先，教学优先。这样一个办公室资源的配置，它和注水文凭的生产有什么关联，或者有什么关系？既然当了领导就有这么大的利益，那个有点能力，科研能力比较强的人，假如说行政领导是要通过科研能力强，教学能力强来选拔上去的话，那么他努力搞科研和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假如说行政领导不是由于科研能力强、教学能力强被选拔上去的，那么那些聪明的知道怎样追求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就不会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教学、投入科研。他会千方百计把他的精力放到能让他当官的人身上，能够让他当官的事情上。我们很多人都想当官，削尖脑袋去当官，因为当官才有搞头。当不了官的，想办法获得当官人的好感。然后让他们在配置资源的时候，给自己分一杯残羹。这些当官的人吃剩了的，也可以给你吃一部分，总比一点不给你分吃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绝大部分人都是想办法当行政领导，忙去巴结行政领导以使自己能够在资源配置中有优先分配权，那么大家都这么干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是稀缺资源。你把你的心思、时间和精力都放到哪个方面去了，请问你的教学你的科研能不能有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不能。不能的话，你的科研能力平庸，你的教学水平平庸，甚至完全不合格就很正常。教学和科研是什么关系？你能生产知识，搞出很好的科研，你的教学水平也是很优秀的。我们很难理解对学术没有任何思考的人，它能够把知识传播好。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老师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投入来搞教学和科研，科研教学水平平庸，那么不能够让学生获得一流的知识，能不能对知识进行很好的传播？不可能。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那些非常平庸的老师有没有羞耻感？他可以非常正当地没有羞耻感，为什么？我平庸，是因为你们鼓励我平庸。你们鼓励的是当官，当不了官我就想办法巴结当官的，抱着他们的大腿，也比搞教学、搞科研强得多。

通过这样的方式，老师的精力放到这样的地方去，而不是努力搞好科研和教学，那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质量？既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这样的行政优先，领导优先的资源配置是不是在鼓励人们不要进行科研、教学努力的投入？既然如此，那十八节课给你上八

节课的老师就不应该被认为很坏，有职业道德问题。这是她在特定环境下的正常行为选择。

那个18节课只上8节课的老师在特定制度环境下是理性的选择。我觉得这个老师没有问题。他那么干了以后，有没有损失？没有。但是他的成本投入少啊。他是理智的。但是我五十四课学时，除了法定假日放掉了，我没有补以外，其他任何情况，我都会上满的。而且考试是另外的时间。当然考试是研究生科来监考。我会改卷评卷。我这样上课和那个老师那样上课相比，还不说质量，仅看时间投入，他的投入是我的投入的百分之四十，他实际的单位课酬，按照出勤时间，是我的两倍多。从个人的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收益的角度，他聪明还是我聪明？他聪明。你之所以这么欢迎这样的老师，是因为他很聪明，他是聪明人。你们为什么恨我？因为我是蠢蛋，傻瓜。

你们给我支个招，我该怎么办？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我是向他学习，还是坚持我现在的做法？您坚持让我继续做傻瓜？所以你们的心眼坏啊。明明知道我这样做是傻子的行为，非得让我做傻瓜，还鼓励我。什么意思？不怀好意。我开个玩笑。但是这个调侃也有意思，你们要思考。

所有第一个案例——学院办公室资源的配置问题，请问G大学J学院的这样的资源配置思路、他们对老师的做法，是不是本质意义上讲在管理环节就在生产注水文凭？所以工学院有个老师，可能不是一个老师，他们说，我就是不会认真上课，我就是上课的时候要糊弄那些学生。因为你这个管理层没有把我们的劳动进行尊重。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既然不尊重我，那我也不会尊重我的学生，就这么简单。

我看了以后，很伤心，很痛。我是搞教育的。我不希望这样的现象成为常态。我是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就是激励和约束。组织目标如果是良性的，就会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约束人偷懒，实现组织的良性激励和约束。这些老师发出这样的心声证明情况正好相反，让我非常痛心。

学院办公室资源配置的案例表明在管理这个环节确实会导致注水文凭的生产。

五、注水文凭的案例分析之二

——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调整和分离问题

第二个，西部G大学J学院学位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成员的调整问题。我们看看这个案例和注水文凭有什么关系？

2008年新领导班子进入那J学院以后，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程序，就把以前教学委员会的成员和学位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调整。当然每个人的思路和理念不一样，要做调整，可不可以？可以调整。但是调整必须要有程序，必须要有规矩。调整的原则是什么？有没有进

行调整的规则？依据什么来调整？调整的程序是什么？全都没有，就是主要领导一句话，某某人以前是学位委员会委员，现在就不是了；某人以前是教学委员会委员，现在就不是了。我想要谁，就要谁。哪些人进，哪些人不进，领导说了算，没有任何理由、规矩和程序。

我们知道在一个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讲规则。大学里面凡是涉及教学、学术等方面的事务应该是由学术人中的一些代表来形成一定的规范，依据一定规范行事才行。但是这样地没有规矩和程序地调整学术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请问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首先，你的那些专家、教授，在这些掌握行政资源的人眼里没有任何地位。其次，你这些专家和教授是领导的工具。你看啊，我没有任何依据就可以调你，调了你以后，您只有干瞪眼。既然这次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调整你，我下次也可以没有任何依据做其他的任何事情。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是领导，我是当官的，我有权。为什么我可以调你呢？因为你不是当官的，你不是领导就这么简单。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它和刚才学院办公室资源的配置问题是不是一回事？既然当官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很多人的命运，可以将很多平台当作实现他个人欲望的工具——他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那么就会鼓励很多人也拼命争取去当官。如果当不了官，而当官的人又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无条件决定您的命运和利益，那么没有当官的普通人就可以努力去巴结当官的——到你家去拜年，唯领导马首是瞻。我平时和你关系搞好，你到时候可以不开排挤我。都成为你的兄弟伙了，然后有什么机会、好处都会考虑我。成为一个小的利益圈子后，整个J学院的资源在我的小兄弟、小范围之内分配。其他人是圈外人物，休想分得一杯残羹。

这样的制度安排，本质意义上是鼓励以主要领导为核心的行政领导班子掌控资源，掌握所有人的命运。你命运和前途，不是因为你教学好，科研好，不是因为您能力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领导就喜欢您。为什么喜欢？脸长得漂亮。为什么喜欢？讨人喜欢。我讨人喜欢，他就喜欢我。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资源的配置，人力资本的激励不是依据业绩，不是依据能力，那么请问努力工作有什么用？你要搞科研，你要搞教学，你搞了半天起什么用？没有任何作用。既然老师明白现实就是这个状况，他们为什么要极力搞好科研和教学呢？

曾经G大学G学院有个老师跟我讲，我就是不上课。上课就完成规定的工作量，多余的工作，尽可能找理由推脱不干。

她是博士。我比较敬重她的学识和能力。我觉得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博士。当然我对她没有私人感情啊。知道没有搞头，所以只要不违规就够了。我只要不违规，随便应付应付就过得且过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规则，我们这些聪明的博士、副教授、教授等教师，是会发挥出聪明才智在教学科研

上的。

但是你这个搞法，你这个调整，你把那些专业的老师，那些资深的教授放在眼里吗？没有啊。而且调整的结果，第一，当时我看了，比如学位委员会调整以后，大部分教授被调整走了，留下相当一部分是副教授，系主任。刚好我那位教授朋友，那次很幸运没有被调整走，还是留在J学院的学位委员会里面。因为他以前也是学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

我那个朋友在学位委员会发现他们做的事情和前届领导还是一样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情况。我那个朋友很正直，就发言了。当时那个学院开展工作是怎么开展的呢？学位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遴选硕士生导师。J学院的硕士生导师，首先要在J学院讨论。我那个朋友说，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只有遴选出优秀的硕士生导师，才可以培养优秀的研究生，才可以把研究生质量提高。既然如此，那么研究生导师遴选就要慎重，有体现良好观念的规则和程序。你们研究生科通知学位委员会委员开会的时候，委员连开会内容都不知道，上午通知，下午开会。开会以后，才知道是要进行遴选硕士生导师。

遴选导师的时候，连学位委员会的委员事先都不知道，请问其他老师，会不会知道？因为这个学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他也是那个学院的老师。要遴选导师，至少要在十天之前把遴选导师的信息公布，挂在网上，让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师都知道这个信息。比照这个条件来进行申报。只要信息公开透明，严格依据规则和程序，条件不合格的老师没有怨言，他有努力的方向，努力工作会有回报，会被肯定和承认。如果申报老师的基本条件合格，还要看质量方面有没有问题。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再来把这个关。这些意见说了以后没有任何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就因为这些我那个朋友就很惨了——把主要领导得罪了。我把你弄进学位委员会，我就可以任何时候把你弄出去。我弄你进来，我是看得起你。看得起你，你还提意见，不给我面子，来给我讲什么学生培养质量。

你来讲学院培养质量的提高，行不行？不行。他不在乎那个东西。

紧接着遴选导师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又讲道：遴选研究生导师，有些导师是从来没有带过研究生，当过硕士生导师。要把握好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关，新导师根本没有任何带研究生的经验，初次遴选时，建议新导师只能担任一个专业的硕士生导师。通过带一届左右的学生，有经验了，确实各方面还不错了，新导师可以在研究方向相近的两到三个专业担任硕士生导师。这样好的建议也没有任何回应，也不听。甚至有些被遴选的新导师根本就没有经过学院学位委员会——亲戚、朋友，或者是用J学院的资源和另外单位进行资源交换等方式来将领导的自己人运作成为导师。遴选导师时，领导不通过学院学位委员会，直接把他中意的人弄成硕士生导

师来带学生，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这样的做法和你提建议完全是相反的。那还提什么意见呢？我那朋友就再也不提意见了。不提意见，我那朋友的命运也难以逃脱被这些领导们整治和修理。怎么整治啊？好了，我们现在因为学校要报名单——学校文件规定学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必须在学校研究生院备案。那也就是学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对遴选导师要把关，对每年学生授学位要把关等职责将上升为学校行为，这个行为就不完全是学院行为了。你不是提建议有道理吗？我这个领导做的刚好与您提的意见是相反的。那我不让你参与学院学位委员会了。怎么不参与？搞个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把你们那些提意见阻碍我搞潜规则的人弄到学术委员会去。然后其他听领导话的人就留在学位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要上报学校，学术委员会不上报学校。要报就报吧。这样弄了以后，这些对学院建设提合理化建议的人还是在学院的控制范围，要是再敢反对领导搞潜规则，那么他们还可以整你，收拾您。

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可不可以分设？可以的。也就是说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分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分设在学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也是需要相关的老师和相关的教授、博士或者研究生导师根据议事规则来进行，而不是领导随意指定部分教授来开一个论证会，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行政领导层也可以先提出一个方案，经过教授委员会论证修改后，最后公示，没有重大修改意见就作为决议正式定下来。J学院是不是按照这样的规范和程序来确定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分离呢？没有啊。领导想调就调。为什么？因为领导有决策权。为什么领导有决策权？因为领导是院长，有行政权力。

看到这样的事情，我想起张五常教授讲的事情。他在芝加哥大学任过教，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任过教。在他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系里面，他们叫系，我们叫学院，真正有人事决策——进博士，进教授的权力在教授（资深教授）手里面。一般的资深教授，是不愿意去做领导职务、做系主任、做那个院长的。相反，有一些在研究方面不一定有多大成就，中等水平的教授做系主任。系主任本质意义上没有多少事情。因为系的教授委员会有决策权，相当于教授委员会在治系，治院。我们J学院完全不一样。说不定领导那个教授都是蒙混过来的。混那个教授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当了官以后，他说没有官职的教授再有本事也不算什么。我没有本事，我是领导，我可以把J学院的资源（钱财）拿过去，搞到哪个刊物吹捧我是这个领域那个领域的专家，实际却是不学无术的伪专家。就是这样搞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学院学位委员会和学院学术委员会的调整，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些教授、博士和导师等搞学术的人，是行政权力拥有者手中的玩物。行政权力这么大，行政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学院的一切事务。请问整个学院是

这样一个导向，这些真正来搞教学来搞科研的人有没有前途？没有。从讲师，晋升副教授，晋升教授是不是通过个人努力工作、个人能力就能晋升上去？不是。既然如此，教师的精力和聪明才智被鼓励干什么？那肯定是想办法抱主要领导的大腿。抱大腿抱舒服了，一个可以获得资源，另一个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职位，甚至其他方面的东西都可以获得。既然如此，普通教师为什么要努力工作？为什么要去努力搞教学和搞科研？即使是个优秀的老师，他的精力也不会这样投入了。不是优秀教师的人更加不会这样投入了。结果会怎样？我们说真实文凭的生产绝对需要优秀老师。但是现实环境却是在鼓励人平庸，鼓励人成为不优秀的老师。所有的质量检查全部是为了应付，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是为了表面的光鲜亮丽。既然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会不会很高？从普遍意义上讲肯定不会。当然有个别的教师，虽然知道这个环境很糟糕，但是自己不甘心，私下去自学，拼命去钻，也不错。这是个案，而且当事人要付出很多的成本和代价。

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分设，本质意义上已经讲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为老大。他不得了。他没有把搞学术、搞专业的人放在眼里。既然是这样一种方式，人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会干什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要搞教学？为什么想要搞研究？除非是疯子，是神经病。我那个朋友真悲惨了，真的就被学院主要领导在校领导面前，其他领导面前造谣为疯子，精神有问题。目的是什么呢？被他们在暗中精神病化以后，我那个朋友所说的所有话，包括对他们胡作非为的检举，上级领导都不要信，因为他神经有问题。你们说可怕不可怕？太恐怖了。当我那个朋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太吃惊了。自己那么优秀和真正，自认为还是满腹经纶的一个人，就被这个主要领导静悄悄地、不知不觉地精神病化了。这是第三个问题。

由此看来，J学院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调整问题，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分离问题，本质是尊不尊重教师、教授和专业人员，鼓不鼓励全体员工勤奋踏实、努力工作，领导干部胡作非为受不受到及时、有效的约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高校所生产的是真实文凭还是注水文凭至关重要。

六、注水文凭的案例分析之三

第四个问题是硕士点负责人的确定问题。你们再看这个案例是不是和注水问题有关系？我们培养出来的硕士研究生要想有真才实学，最后获得得文凭不是注水文凭，那么必须有一流的导师。一流的导师队伍肯定要求每个培养点有一流的负责人，或者学术带头人。

注意啊，我讲的J学院不是经济学院啊，J学院就是我假说的一个学院，你不要对号入座啊。你不要今后去跟我们学院的王院长说，杨老师说他们怎么样，那我不承认啊。我这里录了音的。

曾经我那个朋友也中过暗箭。我那个朋友曾经也是给研究生上课，讲类似的案例分析，J学院院长就事后去散布谣言——学生跟他反映，我那个朋友在课堂上三分之一时间在骂学校，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骂学院，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讲课。我的话绝不会像我那朋友那样，我录了音的。你们要去冤枉我的话，到时候我会不干的，我会找你们算账的。

你们说王院长是什么人？我怎么敢对他说三道四呢？对不对？开国际玩笑。白晶书记那也是不得了的人物。我一个小教授，我算什么？他们搞死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要这样看问题。

硕士点负责人的确立为什么和注水文凭有关系？到时候您们看是不是在生产注水文凭？硕士点的负责人的确定还不完全是个民主问题，因为学术还不能完全讲民主，每个点的导师有一个学术传承，应该是这里面学识比较渊博的老师在当这个点的领衔人。领衔人可以对这个点其他的导师有一定的推荐权，当然这个不是领衔人空口胡说，要根据这些老师平时进行学术讨论的情况——国外叫学术讨论会（seminar），根据他的公开发表文章的质量，根据他的其他方面情况，作出有依据的严肃的推荐意见。最终还要通过学院的学位委员会来判断他能不能做导师。

假如一个硕士培养点有五位导师，每年招收十名学生。这个点虽然每位导师在带自己的学生，但是怎么样来安排和协调导师的教学和学术活动，怎样使这个点整体的培养质量提高，还有老师之间怎么样经常性的开展活动，学生之间怎么样经常性的开展研讨。都需要有一个制度规范和学术领头人。如果是这样来要求，来确立硕士点负责人，那么请问谁最有资格来当这个点的负责人？在我说的刚才那种情况下，谁最有资格？绝对是学术水准、学术实力、学术资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要和这个培养点的导师民主地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举荐共同来决定硕士点的领衔人。最终是这个点的导师们及其这个点的学术传承、管理传统在决定谁来带领这个学术团队。

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规则。总之一点，决定权肯定是本专业导师有最终的发言权。但是那个J学院是怎么搞的呢？J学院就是哪个院长他想要哪个当硕士点的负责人就要哪个。他定了某个点的负责人以后，所有导师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负责人。什么依据？没有依据。领导就是依据。

如果这样来确定硕士点负责人，那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既然不是按照学术的标准，不是按照学术道德的标准，不是按照对学生培养质量的标准，而是我是行政领导人，是老大，我就可以决定。既然如此，其他导师也知道，之所以能够给自己分一个学生，那是领导的意愿和决定，自己根本没有发言权。所以培养学生也好，确定硕士点负责人也好，自己就麻木地接受吧。导师们有什么主动性带好学生，讲好课，搞好研究，关

心学科建设和学院发展呢？

在这个选拔机制和这样一个制度背景下，导师们会受到尊重吗，会受到鼓励吗？没有啊。既然没有，绝大部分人都是聪明人。他为什么去操那个心，为什么要去费尽心血关心学科和学院发展？只有谁会去操这个心？有些人讲了，第一居心叵测的人。第二，傻瓜。

谁居心叵测呢？如果那个院长的行为是正义的，是规范的，是正当的，那其他人要去胡乱说的话，那这个老师绝对是居心叵测。但是如果是相反的情况，这位老师站出来坚持正义，你还说这个老师居心叵测，那么你的良心叫狗给吃了。因为你没有是非感，不是一个有基本道德感的人。

为什么会有人去当傻瓜呢？因为这些人有良心，有为人做事的底线。不想那么沉沦，他想通过自己使环境变好，他不想象其他人一样做聪明人，因为他觉得良心有愧，所以他选择了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行事方式——努力、敬业、关心学术和教育发展。这样做，他受到伤害会很多，因此被这些胡作非为的领导和大多数人认为是傻子。

我们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你的环境和你的个人行为发生偏离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是调整个人的行为选择。个人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环境相适应，是最好的，代价最低的行为选择。绝大部分人，确实是在调整个人的行为选择来适应外部环境。

假如整个制度环境不正常，个人适应环境的调整结果会怎么样？本质意义上讲，是群体道德水平的沦丧。真的，令人痛心啊。

同理，硕士点负责人选拔既然不正常，请问那些导师要努力上课吗？刚才我给你们讲的十八节课只上八节课的老师的案例，他那样上课，是不是正常的？在不正常的制度环境下，他是对的，是聪明的。他上课不努力对他个人而言至少和他努力上课是一样的结果，其实不努力净收益会更高。这说明上课努力没有意义。被这个胡作非为的领导这么搞了以后，不正常的行为变成了最正常、最理智的行为了。通过第四个案例，硕士点负责人的确立是不是在鼓励生产注水文凭？这样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质量会提高吗？导师们有那个动力没有？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七、注水文凭的案例之四

刚才我讲了四个案例。你们看这四个案例，从管理的角度，是不是生产注水问题的环节？是。这样搞下去以后，提高教育质量的很重要的参与者——管理者不会通过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去使老师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积极性得到提高来提升教学质量和研究质量；老师不会努力去工作。研究质量和教学水平也是高度相关的。那这样的话，肯定存在生产注水文凭的问题。

第五，系主任民主选举的问题。J学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院领导说各个系的系主任要民主

选举，通过民主产生系主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新班子上任后把以前的两个系合并为一个系，合并以后教师总人数有三十五个人左右。选系主任的时候仅有约十二位老师参加投票，大约占全体教师的三分之一。让大家投票以后，当场也没有验票，就收走了。收走以后，J学院党委书记说，J学院民主选举系主任的事情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绝对没有问题。

当时我那个朋友就想，来的三分之一左右的老师，连一半的人数都不到的投票怎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那位朋友还好心地去跟党委书记讲，系主任的产生其实可以不进行民主选举。你们就提出这个系主任任职的条件，并且你们认为某人适合担任这个职位，然后问大家有没有意见？你说一般领导说了话以后，中国人碍于情面，即使有意见他也不会说。这个时候，大家鼓掌通过。这不是逻辑上很通顺的吗？而且我那个朋友还讲，在高校里面的这些教师至少是本科的学历，有很多还是满腹经纶的人。你们作假，也得自圆其说。你做的完全不符合逻辑，那就有问题。您们要改进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

提了意见后，我那个朋友就倒霉了，惹了马蜂窝。这个党委书记背着我的朋友，暗中造谣说我那个朋友想当系主任。他想当，但是给他投票的人一个都没有。所有的票都投给他们钦定的人了。

就是这样的方式，去诬陷我那个朋友。我那个朋友以前当过系主任，但是他主动辞职。他知道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要正直、尽职地去行事的话，他会累死，却不能改变局面和环境。不做系主任是自己最佳的选择。你说他怎么会去争那个系主任当呢？作为领导办事缺乏基本常识和公开透明，面对质疑却只有造谣生事，岂不令人悲哀？

我那个朋友知道他们在背后散布谣言的时候，感到很震惊，很吃惊。这些人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品？这样的人品连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如，还可以当学院的党委书记，很有意思。

我就劝他，你要想得开。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领导都有。你这么想，你就释怀了。

他们通过这样的违背基本常识的方式民主选举系主任，不依据学识，依据管理水平，依据大家认可，而且民主选举完全是一个假象。我那个朋友说，他们这是民主选举吗？他们那个方式去搞，不是糊弄人吗？这样搞，老师开会，来了也白来。所以那些老师都没有参与意识，参与积极性。当然他们可以污蔑那些没有参会的老师有问题。

但是老师不参会，本质意义是管理有问题，是领导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问题啊。他们没有尊重这些老师，没有把这些专业老师视为学生培养质量提高的最核心主体来尊重。请问，老师是这样一种境况，他们有动力来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吗？没有动力，他们不能充分地把自己的人力资本充分释放出来。请问学生的

培养质量如何？很差。如果很差，达不到基本的质量标准，那么说明什么问题？注水文凭是不是在这样的环节会产生？这样的管理不可能激励老师，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这个制度环境，他们这样的话，就是把那些本来没有水准的人弄进来应付，得过且过。这个案例也说明了注水文凭为什么会产生。

八、注水文凭的案例分析之五

学院公车的使用问题。你看和注水文凭有没有关系？J学院党委书记一伙人住家离学院比较远，就把以前学院领导班子用公款买的车子拿去主要用作自己这伙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用了以后，每个月的油费、修理费等乱七八糟的开支都用公款支付。

我那朋友又多事了，给那个党委书记提了好心的意见。怎么提？就是你们离学校比较远，那个车子主要用作你们这部分人的上下班交通工具也正常，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搞一个学院公车使用的制度规范出来呢？这个车不是你们几个人的专车，私车。搞一个管理规范条例——1、该车主要用于学院比较远的老师的上下班接送，特别是学院党委书记那个线路的老师都可以使用；2、该车用于整个学院来往客人的接送；3、该车用于一些教职员工的紧急情况，哪个老师生急病或者其他情况，确实需要学院来用车接送。这一公车管理规范出来以后，这个车子主要还是学院党委书记这帮人在用，但是已经纳入制度规范了。至少这从制度上来讲，是合理的，站得住脚的。

这又捅了马蜂窝。你这个建议不是把我作为领导的特权利益损害了吗？如果说用这样的制度规则，学院公车使用并不一定对他有利，那毕竟纳入规则管理了。因为他是学院的党委书记，公车私用，还可以每个月报销三四千块钱的养车费，而且这个车子不管是多少钱，四五万也好，七八万也好，十来万也好，毕竟是公款所购。这本质意义上，还不是因为我是领导，我就可以用这个车。注意，要按我国政府公车管理规定，事业单位处级干部没有资格享受公车专用。那学院职工会怎么想？看来当领导还是有搞头——没有规矩、没有依据就可以将公款用于购车，公车私用，还可以报销公车私用的养车费用。领导在公车方面都可以没有依据，那可不可以其他方面也没有依据损公肥私，贪赃枉法？在其他任何事情上，他们都可以如法炮制，谁能奈何他哉？

既然当领导这么有搞头和诱惑力，普通职工努力工作，努力搞科研，努力挣点课时费还不如别人一个月报假发票的收益高。那普通职工为什么要努力去做好本职工作？既然领导那么干，职工就可以效仿他。J学院的老师，只要是聪明的老师，就会想方设法去抱这个党委书记等领导的大腿，希望党委书记提拔他，或者想要党委书记给他好处。这样才有搞头。如果大家都在围绕领导竞争各种好处和利益，这些老师既然把聪明才智放到领导身上，放到这些掌握资源配置的人身上，放到有权

就可以随意决定学院一切事务的人身上，那么请问他们会不会努力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会不会把精力放到J学院的学生身上？只有蠢蛋才会放，聪明的人不会放的。

最后结果怎么样？绝大部分人是聪明的。傻瓜、蠢蛋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聪明的人都不努力工作，最后的结果是注水文凭在这样的环境下又会产生。

九、注水文凭的案例分析之六

学院的财务公开问题。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本质意义上是学院的政务问题。学院政务，没有规矩、没有程序，完全由掌握权力的人说了就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不是一样的问题。不公开政务，领导们就可以自己胡乱搞。谁要想获得好处，你只有往权势人物办公室跑勤一点，往他家里跑勤一点，节假日往他家里跑勤一点，他生病，他生日，他父母生病，你都要跑勤一点。你不知道，就好好打听他的情况，搞清楚。你来了他不一定记得。你没有来，他一定记得，我跟你讲。您不去捧着他，敬着他，他在关键时候就可以整死你。

这样行事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你的各种好处、利益不是你努力工作，你努力培养学生，而是因为你投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喜好。你的心都放到取悦权势人物上去了，你再聪明，也不可能把学生培养好。

财务公开也是一样的。新的班子来以后，开始的时候为了说明上一届班子政务、财务有问题，搞一大堆包袱和烂摊子留下来，公布了以前班子的财务情况。后面怎么样？就拖，就赖。还有一种情况是打着J学院的牌子去搞办学、搞培训以后，弄了很多假发票去搞，去报。最后再多的事情，再多的培训，只有二十万左右的纯收入，每个月够大家发点奖金就可以了，其他都是领导自己的利益。

这个J学院的领导没有想到他去做那些事情，打着G大学J学院的牌子和商誉，怎么就没有一点规范和程序呢？你打着J学院的牌子，J学院的员工有不同的分工，有些人从事科研，有的人投身教学，有的人创收也好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团队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来改善大家的待遇，同时也把教学质量和研究质量提高，管理质量提高，形成一个和谐的、欣欣向荣的环境。

但是他们怎么干的？不公开财务。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搞，不公开账务，那么他可以获得自己的好处，同时也可以让投自己所好的人获得好处。请问既然如此，其他人怎么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去努力搞好教学、科研？聪明人的精力肯定是要想办法放在政务和财务上。因为领导可以说了算，财务上也是领导说了算。对领导投其所好，可以获得一些利益。而这些利益的获得不是因为努力工作。那么你想一想，绝大多数聪明人，愿不愿意努力工作，愿不愿意来提高培养质量？只有傻瓜才愿意。

那个傻瓜明明知道J学院问题的严重性和可怕后

果，他还去说，去挑明，那怎么不是精神有问题呢？所以就被精神病化了。这是第七个案例，我们看出来，照样是生产注水文凭的一个环节。

十、注水文凭的案例分析之七

硕士生导师的遴选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你比如说硕士生导师的遴选，新导师可以让他招两个专业，三个专业，四个专业的研究生吗？正常情况下是不行的，但J学院就行，原因有可能就是和领导关系好。

我还跟你讲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关系不好，领导也可以让新导师第一次当两个、三个专业的导师。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J学院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和他关系不好的老师也参加导师的遴选。为什么呢？据说这个J学院马上面临领导干部任期三年期满，老师要对领导进行匿名投票。要投票的话，领导就想办法尽最大的努力把对立面减少啊。对立面减少，你们不是想当导师吗？我都让你们当导师。只有稍微沾点边的都过来当呀。你当了导师，我给了你们利益，你就要投我的票。

但是这样遴选导师的结果会怎么样？有很多不符合导师要求和条件的人，大量地进入导师队伍。那会不会使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这是在牺牲学生利益、牺牲学校利益、牺牲专业利益为他谋求连任寻求好的名声，在慢慢运作，在做工作了。

所以说，硕士生导师遴选一方面就往我领导这伙人去弄，没有规范也不要紧。如果想要不相关的人对我有好感，那么就牺牲专业利益。其实前一种研究生导师遴选情况也是在牺牲专业利益、研究生培养质量。

像这样的硕士生导师遴选，请问能不能够把优秀的导师和优秀的老师选出来？这样遴选导师的结果，导师质量怎么来保证？就像刚才那个案例一样——连学位分委员会的成员都不知道下午开会的内容和议题，这是要遴选硕士生导师吗？学位分委员会的成员都不知道，更何况其他人呢？这不是在搞儿戏吗？如果管理真的规范有效，那么像这样胡乱管理的这些人，他还能在这里当领导吗？他在这里瞎混，是对纳税人的犯罪，对学生、学生家长也是犯罪。我是怎样认为的。这样胡搞乱弄把那些老师往哪儿引导？把那些学生往哪儿引导？

硕士生导师的遴选，一要通过规范的程序，二要建立有效的规则。硕士生导师遴选就是把优秀的导师，有培养能力，合格的人选入这个队伍。如果不是这样，大量不合格导师带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不是水货呢？

我那个朋友非常郁闷，他指导学生很认真，但学生却不认真。为什么？学生说其他导师基本都是搞应付，走过场。要中期考评了，导师给学生签个字，很多连看都没有看，更不说指导修改了。既然其他人都这么行事，我也不能太不通情达理了吧。我那个朋友就想，干嘛要那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生呢？那这样的话岂不对

学生不公平？这些学生在别人那个地方就可以很轻松地过关，在他那里就有压力。那就确实太不公平了。搞得我的朋友没有办法坚持原则和标准。这是我那个朋友最郁闷的地方。所以我那个朋友没有人选他。没有人选他，他其实是想得开的。从他自己带的学生状况看，又有几个在这个环境下能够成才？

既然这样的话，这个环境把我那个朋友淘汰了。这是我那个朋友的荣幸，知道吗？这个环境没有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不鼓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有水平、有学识的老师。相反，这个环境却在鼓励干乌七八糟、乱七八糟事情的人，鼓励平庸，鼓励不学无术之人。我那个朋友在G大学很悲哀。这是我那个朋友的悲哀，也是那个J学院学生的悲哀，还是那个学院很多职工的悲哀。为什么？那个J学院的职工真的有一个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他们有很多非常聪明，也是可以做出成就来的。

这是这个J学院硕士生导师遴选的案例讨论。请问这样的遴选方式是不是生产注水文凭的一个环节？

十一、注水文凭的案例分析之八

研究生上课的问题。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我讲过了。我给你们讲过两个案例。一个案例就是十八节课上八节课的案例。还有一个案例是关于《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案例。有一个教授用《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英文版上课，难度和哈佛博士生的教材一样，英文板书，全部数学证明，习题也要讲解，最后还要英文考试。另外一个老师五十四个学时，听说上了四次课，而且还是让学生来讲，他来点评。这个神奇的老师和那位敬业的老师可以拿一份虽很微薄，但却是相同的工资——就是课时费。不考虑授课质量的差异，仅仅考虑授课时数的差异，后一位老师的实际单位课时费就是那个敬业老师的三倍以上。如果把质量差异计算进去，那么两位老师实际单位课时、单位质量的课酬差距可能是几十倍。

像这样的研究生上课方式及实际单位课酬的差距是不是在鼓励人们向那个不敬业的老师学习。向那个十八节课只上八节课的老师学习。只要你是聪明人，你不是蠢蛋，你就要向他们学习。最后坚守职业操守的那些敬业老师，那些蠢蛋老师就会越来越少。

本身那个队伍里面像那个敬业老师的人就不是很多。在这个制度环境下，这个敬业的老师、这个蠢蛋老师会越来越来，最后会绝种。请问敬业老师，优秀的老师都绝种了，留下来充斥台面的是不敬业的老师，是很差劲的老师。这是一个逆向选择。最后的结果研究生培养质量会不会下降？最后会不会出现生产注水文凭？会还是不会？杨老师是不是在和你们乱说？好。如果你们觉得我给你们乱说的话，我就蛮伤心啊。怎么找不到一个知音呢？

好了，这是研究生上课的问题；你们看它是不是生产注水文凭的一个环节。

十二、注水文凭的案例分析之九

我们再看学院博士点申报、硕士点专业结构调整问题。

博士点申报问题本质上和前面的问题是相似的。什么意思？我那个朋友所在的J学院要申报博士点。申报博士点的时候，这个J学院的院长居然没有在学院里通过教授委员会，或学位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或者相关专业导师开会，来论证也好，通气也好，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来上升为学院决策意见——决定J学院是否申报博士点。院长个人意见就代表了学院意见——J学院放弃申报，配合G学院申报博士点，这就是院长的J学院和G学院联合申报博士点的决定。J学院院长说，他已经代表J学院和G学院谈好条件了——J学院不申报了，放弃申报博点。他们申报成功后给我们J学院设一个博士点方向——这就是院长自己和G学院谈的交换条件。

博士点申报问题是学院学术、学科建设方面一个重大的决策。院长可不可以提出自己学院不申报，配合其他学院申报博士点的方案？我觉得他提这个方案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可以理解的。院长可以提，但是你提了以后，只能代表你个人意见。你的个人意见怎样才能形成学院意见？你首先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论证，是不是？通过比如学术委员会，或者导师的代表来论证这个事情。我院长提的这个方案，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通过严肃的规则和程序，院领导个人意见上升为学院意见——确实觉得我那个朋友那个学院在博点申报方面没有优势，那我们还不如支持某个学院某个专业来申报。这也可以。

问题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程序，没有任何的规范，就他院长说了算。请问如果是这样的方式，那和刚才的问题是不是一样的。这样的重大决定就是因为我是院长，我掌握了行政权力，所以我就决定了。你们搞专业的那些人，我院长可以不让你们知道，可以不让你们参与。你们有什么发言权？我院长个人意见就代表这个J学院的意见。

院领导个人独断专行，是这样一个状况的话，那些搞专业的教授、老师完全没有参与学科建设重大决策的权力，完全由院领导的个人意见代表学院意见，请问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些教授、老师对所谓博点申报，对所谓的硕士点的专业建设会有兴趣吗？还会努力形成合力吗？有热情吗？既然当了学院行政领导就有这么大的能量，那些浅薄之人，就会想我今后也去当院长。我当院长，当了这样的官以后，我就可以改变现在这样的局面。如果是这么看的人，那么我认为他是浅薄之人。那你说，他这么干，我掌权了也这么干，那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那还不是权力就是一切吗？即使您和他的干法不一样，干得比他好，本质上还不是迷信权力吗？有了权力就意味着有了一切吗？有了资源调动和决策的权力吗？

那么最本源意义上怎么样改变这种权力的滥用和绝

对权力？还得要教授治院，学术为大，规则、程序是最根本的。只有这样你那个J学院才有前途。否则，按照现有的激励规则，大家要么去抢他的院长位置，要么抱这个掌握权力的人的大腿。抱舒服了以后，就有搞头。这样的方式，这和前面讲的是一样的——职工往这些权势之人身上去投精力，投才智，不是将精力、才智用于搞研究，搞好教学，提高学生培养质量。

硕士点专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也是一样的。硕士点专业结构可不可以调整？可以啊。根据社会需求，根据现在情况的变化，根据我的师资力量，招生需求可以调整的。问题是，在调整过程中，有没有程序？有没有规范？没有规则，没有程序，也是我院长个人说了算。也是我掌握权力的人说了算。那么这和刚才博士点的申报是不是一样的。

我还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那个J学院曾经有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硕士点专业，据说2006年就申请成功了。居然这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就没有了。后面说什么呢？院领导和学校领导商量，把这个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换取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这个从学校专业建设的策略角度，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得有基本的规范和程序啊。你院长跟学校提是可以的。但是你的个人方案上升到学校层面之前，首先要在学院层面和相关老师有一个通气，有一个沟通，大家有一个意见。要让你所在学院里面，你院领导的个人意见变成学院意见，然后再将学院意见上升到学校层面。这才是合乎基本常识和程序的一种决策行为嘛。

可是实际情况是学院其他人没有你的戏唱。你们没有作用和发言权，就是由我这个院长说了算。请问个人意志就完全可以代表学院的意志？个人观点就可以代表这个J学院的集体意见？这样的办学理念行不行？不行。这样的搞法，只要不是混饭吃的老师，他们对这种行事方式要么是抵制，要么是沉默，但是心里肯定是不认同的，对你肯定没有好感。既然专业老师在专业培养、学科建设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还搞什么呢？这个学院都办成了你这个掌握权力的人的私人单位了，你个人的单位了，请问能不能够有效地激励其他人努力工作，努力提高培养质量？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环节是不是在生产注水文凭？这些老师有没有动力，努力去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本质意义上是把他们当作外人了。能够进入你那个圈圈的，不是依据规则，不是依据程序可以进去的，而是依据你的主观偏好进去的，没有依据。您这个院领导也可以形成一伙人，但是形成一伙人，对这个学院长期发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这个学院的学科建设，学院建设，专业建设能不能够形成良性循环这样一个状态？不可能的事情。

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当遍地都是摄像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失踪的孩子？

Social Critique
社
会
评
论

作者：杨大鹏

这些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建设所谓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数以亿计的摄像头遍布城市街道、车站、商场、小区、学校以及乡村路口。官方媒体不断宣传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声称能够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感知、精准管理和实时监控。然而，一个尖锐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始终摆在人们面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摄像头无处不在、人脸识别技术高度发达、个人信息几乎被全面收集的国家，仍然不断出现儿童失踪、人口拐卖以及长期无法侦破的案件？如果一个普通群众闯红灯，摄像头可以迅速识别身份；如果一辆汽车违章，系统可以立即锁定车主；如果有人在网上发表敏感言论，相关内容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删除，发布者也可能被有关部门关注。那么，为什么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失踪之后，却常常多年没有结果？

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权力运行逻辑和政府责任的问题。中国政府长期强调“维稳压倒一切”。据公开资料显示，每年投入维稳和监控体系的资金规模极其庞大。从遍布全国的摄像头网络到大数据分析平台；从人脸识别系统到手机定位和信息追踪，普通民众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套庞大的监控体系最主要的功能似乎并不是保护普通人的生命安全，而是维护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当民众上访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发现；当异议人士组织活动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锁定；当维权人士发表批评意见时，监控系统同样能够发挥作用；当政府认为某些声音“不稳定”时，相关人员甚至可能被提前约谈或限制行动。然而，当一些家庭寻找失踪孩子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却往往是漫长的等待、有限的信息以及无尽的绝望。许多失踪儿童的父母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们走遍全国，耗尽积蓄，失去工作，甚至导致家庭破裂。有些家庭最终找回了孩子，但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有更多家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答案。最令人不安的，并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透明和缺乏问责。公众不知道调查进展；公众不知道案件细节；公众不知道相关负责人是否受到追究；公众不知道案件为何长期没有结果；公众甚至不知道那些失踪的孩子究竟去了哪里。在一个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各种猜测和怀疑自然会不断滋生。有人怀疑拐卖网络长期存在却未被彻底打击；有人怀疑地方保护主义阻碍案件调查；有人怀疑某些利益链条长期存在而缺乏有效监督。

无论这些猜测是否准确，它们都反映出同一个现实：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并

非凭空产生，而是在长期的信息封锁、缺乏透明度以及缺乏独立监督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真正负责的政府，应该主动公开真相，而不是让公众在猜测中寻找答案。一个真正关心人民的政府，应该优先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是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对人民的监控之中。一个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不应该让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绝望中寻找几十年，却始终得不到明确交代。更令人讽刺的是，中国政府经常以“科技强国”“智慧治理”作为宣传口号，向外界展示其先进的监控能力。但对于许多普通家庭而言，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政府拥有识别每一个普通人的能力，却无法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政府拥有庞大的数据收集能力，却无法向公众解释许多重大案件背后的真相；政府拥有强大的维稳机器，却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信任。

这种矛盾暴露出一个根本问题：在缺乏监督和制衡的体制下，技术的发展未必服务于公民权利，而更可能服务于权力本身。当权力不受约束时，监控技术首先被用于维护统治，而不是保障公民安全；当政府最关心的是社会控制而不是社会责任时，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解决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对于我而言，这种现象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我逐渐认识到，一个缺乏独立监督、缺乏新闻自由、缺乏公开问责机制的体制，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真正保障普通人的权利。因为问题从来不只是技术落后，而是权力缺乏约束。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摄像头，而是是否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不是能够监控多少人，而是是否愿意对人民负责；不是能够收集多少数据，而是是否愿意接受公众监督。当遍地都是摄像头，却仍然有无数家庭找不到自己的孩子时，人们当然有权提出质疑。而当这些质疑难以得到公开回应，当批评的声音受到压制，当追问真相的人被视为“制造问题的人”而不是“寻找答案的人”时，这种沉默本身就已经成为制度性问题的一部分。一个真正值得信任的政府，不是让人民害怕被监控，而是让人民相信自己能够得到保护。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的是被监控，而不是被保护。

编辑：周志刚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三十七年的民主火炬

——从天安门到当代民间抗争相传

作者：卢超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八九六四”已经过去了三十七个年头。三十七年，足以让当年的热血青年步入两鬓苍苍的暮年，也足以让整整两代人在极权刻意制造的信息黑洞中长大。然而，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记忆或许会被高墙暂时封锁，但人类对自由的本能渴望却如同地底的岩浆，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破土而出。

回顾这三十七年，民间的反抗其实从未真正中断。虽然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曾换来过长期的表面高压，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赴后继的民间组党尝试，到2010年前后兴起的“茉莉花行动”与新公民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一直在威权的缝隙中寻找微光。

而到了近年来，这种长期的压抑终于迎来了全方位的爆发。

作为一名身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人，在纪念六四三十七周年的这一刻，坐在键盘前，我脑海中不断交织着几幅画面：一幅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头裹红布条、高呼“要自由”的年轻面孔；一幅是中共二十大前夕，在北京四通桥上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以及彭立发孤身一人挂出的那两幅振聋发聩的横幅；还有一幅，则是随后在上海、北京、洛杉矶和纽约街头，无数年轻人手举白纸、眼神坚定的身影。

这些人和事，在时空上看似零散，但当他们为了同胞的尊严、为了重获自由的权利而呐喊时，那一刻，六四的精神已经完成了一次跨越三十七年的无声共振。

这种共振，首先体现在抗争诉求的底层逻辑上。八九民运的核心，是年轻人对一个公义社会的追求，是对权力和体制黑箱的质问。而四通桥上那句“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则直接揭开了三十七年来被掩盖的脓包，用最直白的方式将政治诉求重新带回公众视野。随后爆发的白纸运动，正是将四通桥上的政治口号变成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体呐喊。从三十七年前的广场，到四通桥，再到遍地白纸，追求宪政民主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

其次，抗争的形态在残酷的维稳机器下演变出了新的坚韧。八九民运发生在相对集中的空间，依赖于大型集会；而在当代，面对无孔不入的数字监控，反抗化为了四通桥式的“孤勇者”一击，随后又演变成白纸运动中“去中心化”的网络快闪。这种形态的进化让强大的维稳机器一度措手不及，证明了即便是高墙耸立，民间的智慧与勇气依然能找到突破口。

然而，作为后来者和观察者，我们也必须在共振中看到局限。无论是四通桥的孤胆义举，还是白纸运动的自发泄洪，抗争者在事后都面临着严酷的秋后算账。这

恰恰提醒了我们：自发的、去中心化的情绪爆发，如果无法走向长期的、组织化的理性抗争，诉求就很难变成持久的政体改变。

身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作为中国民主党的一员，我们不仅是历史记忆的守护者，更应当成为抗争者之间的桥梁。我们拥有发声的自由与组党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悲愤的悼念中。我们要把这种时空共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向新一代的年轻抗争者提供经验与后盾，探讨如何在海外承接这些火种，凝聚成更有韧性、更具建制性的民间力量。

三十七年过去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似乎早已远去，但它留下的精神遗产，在四通桥的风烟里，在每一个举起白纸的夜晚，都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

反抗的火炬从未熄灭。从1989年到今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但这条通往自由与宪政的路，我们的方向从未改变。

编辑：周志刚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The Democratic Torch Across Thirty-Seven Years: From Tiananmen to Contemporary Civic Resist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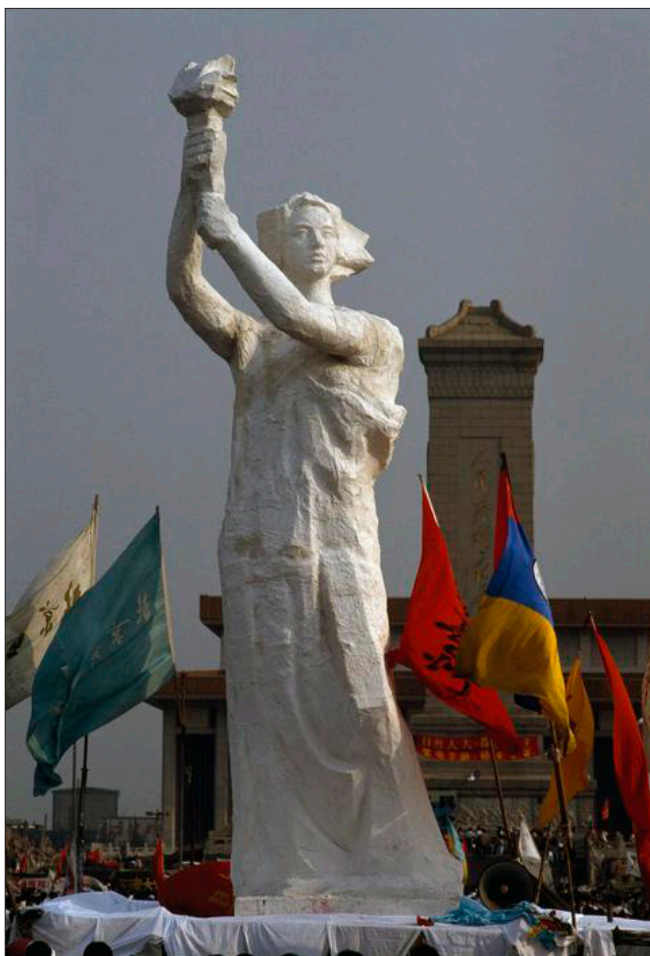
This essay reflects on the thirty-seventh anniversary of Tiananmen, linking the 1989 movement with later civic protests and arguing that aspirations for freedom,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reform have endured despite repression and changing forms of resista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人民还是中共的奴隶吗？

——写在“六·四”三十七周年前夜

作者：中国民主党美南党部副主席 陆乾坤



这些年在海外生活，经常有人会问我一句话：“中国老百姓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奴隶？”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都很难受。因为仔细想想，这句话虽然刺耳，却并不是毫无根据。很多时候，中国人民确实像被一个庞大而冷酷的政治机器长期控制着，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安全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能吃苦的民族之一。无数中国人从早到晚拼命工作，一辈子省吃俭用，只想给家人一个稳定生活。可为什么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依然活得如此沉重、如此压抑？为什么一个普通中国人，即使努力奋斗几十年，依然不敢说真话，不敢公开表达思想，不敢真正拥有独立人格？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中国人民从来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共从来就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它更像一个依靠暴力、谎言和恐惧建立起来的极权利益集团。

很多人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真正看清中共的本性。

它从诞生开始，就带着浓厚的流氓政治色彩。它靠枪杆子夺权，靠阶级斗争制造仇恨，再靠不断制造恐惧来维持统治。它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绑架整个国家，然后再告诉人民：“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

这种逻辑，本质上和绑匪没有区别。绑匪拿枪指着人质的头，说“没有我保护你，你会死”；而中共则长期用“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把十四亿中国人困在一个巨大的政治牢笼里。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其实一直活在这种被控制、被管理、被收割的状态中。共产党控制土地、媒体、教育、司法、互联网和金融体系，甚至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从小学开始，中国孩子就被灌输所谓“爱党教育”。共产党刻意把“国家”“民族”“人民”和“党”混为一谈，仿佛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中国。

可问题是，共产党什么时候真正代表过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有权自由选举政府吗？有权公开批评政府吗？有权决定国家未来方向吗？答案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普通中国人，只能在这个体制下小心翼翼地活着。小时候拼命读书，长大后拼命工作，再背上几十年的房贷。很多年轻人表面上生活在一栋栋高楼林立的大城市里，实际上却像被困在巨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永远不敢停下来。一旦失业、生病或者发生经济危机，一个普通家庭多年的积累就可能瞬间崩塌。

更可悲的是，很多中国人甚至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很多父母从小教育孩子的第一句话，不是“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而是“千万不要惹政府”。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整个社会长期被高压统治后的恐惧心理。

而中共最恶毒的地方，还在于它一边压迫人民，一边不断用“民族复兴”“国家强大”来麻痹人民。它天天高喊“人民至上”，可真正享受特权的，永远是那批所谓的“赵家人”。

普通老百姓拼命工作，一个月赚几千块钱，为房贷、学费和医疗费焦头烂额；而那些掌握权力的红色权贵阶层，却早已经把家属、资产和财富转移到了欧美国家。他们一边高喊“爱国”，一边让自己的孩子拿外国护照、住豪宅、上世界最好的学校。

真正留在中国承受高房价、高失业率和高压统治的，永远是普通中国人。

更加荒唐的是，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并没有真正用在中国人民自己身上。这些年，中共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拿着中国老百姓的钱，到世界各地“大撒币”。它向外国政府提供巨额援助，援建外国基础

设施，给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

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却有无数人在生存线上挣扎。

很多农村老人，一个月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块钱；很多普通家庭，因为一场大病瞬间倾家荡产；大量年轻人毕业即失业；还有无数普通人辛苦一辈子买下的房子，最后变成了烂尾楼。

中国人民明明生活在所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里，却依然活得没有基本安全感。

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是高楼有多高，也不是高铁有多快，更不是军舰有多少。真正伟大的国家，应该是人民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能够自由表达思想，能够不再恐惧权力。

可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像一个被严密监控的巨大空间。从地铁摄像头到手机实名制，从网络审查到人脸识别，整个社会正在被技术和权力层层包裹。很多中国人被迫活成两个人：一个是真实的自己，一个是“允许存在”的自己。

“六四”，就是这个体制最血腥的证明。

1989年，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北京市民走上街头，他们反腐败、要自由、要民主，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好。他们不是暴徒，他们只是希望，中国不应该永远被一群红色权贵统治。

可最后，中共用坦克和机枪回答了他们。

三十七年过去了，中共直到今天，依然不敢公开谈论“六四”。因为“六四”是这个政权永远无法洗掉的血债。它证明了一件事：共产党最害怕的，从来不是外国敌人，而是中国人民自己。

今天，越来越多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根本不是某一个贪官，也不是某一个领导人，而是整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因为这个制度从建立的第一天开始，就不是为了让人民自由，而是为了让共产党永远统治。

在这个体制里，人民很多时候只是被动员、被管理和被使用的对象。经济发展需要你时，你是“人民”；维稳需要你沉默时，你又随时可能变成“境外势力”。

所以，中国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什么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这个建立在暴力、谎言和控制之上的体制，本身就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又一个“六四”周年即将到来。三十七年过去了，那些当年倒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年轻人，如果活到今天，也已经白发苍苍。

但中共最害怕的一件事，始终没有改变。

那就是：中国人民有一天不再恐惧。

因为当人民不再恐惧的时候，一个真正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权力集团的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出现。

Are the Chinese People Still Slav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Written on the Eve of the Thirty-Seventh Anniversary of June Fourth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s continue to live under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restricts freedom,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individual autonomy. While recogniz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moderniz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many people remain politically powerless and unable to influence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ir lives.

According to the essa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intains extensive control over key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media, education system, courts, internet platforms, and financial sectors. Through censorship, ideological education, surveillance, and political supervision, the Party is portrayed as suppressing public discourse and limiting independent political activity.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official narratives often merge the concepts of Party, state, and nation, making criticism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ppear disloyal to the country itself.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ordinary citizens, including housing costs, employment pressure, healthcare expenses, and economic uncertainty. Many people are described as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their lives while possessing little influence over public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uthor argues, cannot replace political rights, civil liberties, and meaningful public accountability.

A major theme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ordinary citizens and politically connected elites. The essay suggests that privileged groups enjoy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unavailable to most people, creating frustration and weakening public trust. This imbalance is presented as evidence of deeper structural problems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events of June Fourth in 1989 serve as the article's central historical reference. The movement is portrayed as a call for reform, transparency,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while its suppression is presented as a defining example of the state's determination to preserve one party rule. Continued restrictions on discussion of the event are cited as evidence of unresolved questions regarding accountabil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conclusion, the essay argues that China's future depends not only on economic progress but also on greater freedom, transparency,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s. Human dignity,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involvement are presented as essential foundations for a more representative and stable society.

2026年六四在多伦多中国民主党集会上的演讲稿

作者：陈立群

各位朋友、各位同道：

今天，我们在多伦多再次聚集在一起，纪念1989年6月4日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7周年。

37年了。那一夜的枪声、坦克的履带声、鲜血染红的长安街，至今仍在无数人的噩梦中回响。那不是什么“平息动乱”，那是中共政权对和平请愿的大学生和市民，对要求民主、反腐、要自由的中国人，进行的血腥屠杀。它用最残忍的方式告诉全世界：这个党从来不把人民当人。

我们已经很多年不再喊“平反六四”的口号了。因为中共早已彻底失去了所谓平反的资格。一个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政权，没有资格审判自己，更没有资格被它屠杀的人民“平反”。平反的前提是承认错误、承担罪责、接受正义的审判。而中共至今仍在封锁真相、抹黑死难者、监禁纪念者。它不仅不认罪，反而把屠杀包装成“伟大胜利”。这样的党，我们只剩下一个词给它——清算。

37年过去，越来越多的真相从北京以外的省市浮出水面。我们看到成都、西安、武汉、长沙、广州、浙江……无数城市都发生过开枪镇压、坦克碾压、秘密处决和大规模抓捕。那些被掩埋的尸体、被消失的名单、被改写的档案，正在被幸存者、目击者和研究者一点点挖出来。这证明六四不是孤立的“北京事件”，而是一场全国性的、有预谋的屠杀运动。中共对人民的恐惧和敌视，从来不是局限于首都，而是遍及整个中国。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浙江省共有上百人被抓捕并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徒刑或劳动教养。其中，仅在集中关押“六四”政治犯的浙江省第四监狱（现乔司监狱），被判刑期在一年以上的政治犯就达45人。

因此，今天我们更要做的，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系统地、顽强地搜集、整理、保存所有屠杀证据：每一颗子弹、每一份死亡名单、每一段视频、每一张照片、每一位幸存者的证词。我们要把这些证据像钉子一样钉进历史，让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抵赖。唯有证据充分，我们才能为未来的大清算做好最坚实的准备。那一天终将到来——不是复仇，而是正义的审判，是把加害者绳之以法、还死难者一个公道、还历史一个真相。

与此同时，我呼吁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六四纪念馆的建设，关注和支持自由雕塑公园的建设。这不是哪一个组织的纪念馆和雕塑公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记忆！它属于所有曾经在黑暗中点过蜡烛、喊过口号、失去亲友、流亡海外、坐过牢、被监控、至今仍心怀恐

惧却不愿遗忘的人。它是我们对死难者的承诺，也是我们留给下一代最珍贵的遗产：记住真相、拒绝遗忘、传承抵抗。

朋友们，37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中共可以封锁互联网，可以删除历史，可以继续用谎言和暴力维系统治，但它封锁不了人心，抹杀不了记忆，更阻挡不了真相像种子一样在地下生根发芽。

让我们把悲痛化为力量，把记忆化为行动。继续搜集证据，继续支持六四纪念馆，继续支持自由雕塑公园，继续把六四的火种传递下去。直到有一天，当那个作恶的政权彻底倒下，当自由、民主、法治真正降临这片土地，我们可以告慰所有六四的亡灵：

我们没有忘记。
我们一直在战斗。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是陈立群，我在美国纽约。
谢谢大家。

2026年6月 多伦多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Speech at the 2026 June Fourth Commemoration Rally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in Toronto

This speech marks the thirty-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and honors those killed during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never acknowledg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killings and therefore has no moral authority to "redress" the event. Instead, the focus should be on preserving evidence, documenting victims, collecting testimonies, and exposing the full scope of the nationwide crackdown. The speech emphasizes that June Fourth was not limited to Beijing but affected many cities across China. It calls on supporters to continue building memor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June Fourth museums and freedom sculpture parks, to preserve historical memor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urging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truth, justice,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remembrance of those who suffered under political repress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民运人的道德操守与民主素养

——为纪念“八九六四”37周年而作

作者：吕易（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副主席）

谨以本文献给一切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为理念，奋斗、奉献、牺牲的真民运人士。那些打着民运旗号，故意损害、破坏民运的人；混迹于民运队伍，却有损民运声誉、破坏民运形象的人；带着中共任务，污名民运人士，分裂民运团队和组织的人；搜集所在国情报，收买国外政要，为中共服务效力，但却贴了民运人士标签，到处招摇撞骗的人……请离开。因为本文不适合你。

笔者曾多次撰文呼吁，要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必须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民运队伍。因为中共当权者，同中外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不会自动放下屠刀，不会自行放弃他们的权力和既得利益。相反，他们毫无例外地利用掌握的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极力迫害、镇压异议人士，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所以，必须要有一支坚强有力的民主运动队伍，站在运动的前面，带领亿万民众，抵抗中共反动派的镇压，方能取得民主运动的最后胜利！

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民主队伍如此重要，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呢？在纪念“八九六四”37周年之际，在思考怎样才是对“6.4”死难者最好纪念这一问题的同时，本人进一步认识到，要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民运队伍，应该从民运人士的道德操守与民主素养的提升两个方面着手。

一、真民运人的道德操守

1. 诚实守信与公开公正

诚实守信，就是信守诺言，言行一致。不撒谎，不欺骗，不散布虚假信息，不传播谣言以惑众。这是每一个真民运人，都要具备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行为。民主，不是只喊喊口号。不是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真民运人应该有平等的民主思想、民主意识、民主精神和民主素养。行动上体现民主，实际运作中真正按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办事。因此，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诚实无欺，是每一个真民运人士首先应具备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

公开公正，是指民运人士做事要光明磊落，正大光明。不能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诡计。我们从事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权利、谋利益、谋福利的正义事业。我们的诉求是公开公正的；我们的目标和目的是公开公正的；我们制定的路线和实现达到目标的方法手段等，都是公开公正的。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暗箱操作等，都是真民运人士不予采纳的。

中共专制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否定民主，夸口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更高效，更可控，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议来议去，效率低，干不了大事。但他们却掩盖了，个人独裁，专制暴

政，暗箱操作下的贪污腐败，挥霍浪费，损公肥私等实质。他们为什么不敢让人民自由公开发表言论？为什么不敢公开各级党政干部的财产状况？因为他们知道几乎在所有方面，都“猫儿腻”和陷阱，隐藏着极大的不正！

2. 尊重与包容

这是真民运人士应该具备的又一个基本道德标准。既然是民主制，那就不是也不应该一个人说了算，而应由这个群体，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共同参与决策，共同讨论、论证、决定。这就要充分尊重他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包容不同的想法和意见。有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对人的起码尊重。

在中共专制独裁制度下，个人独尊，一言九鼎，下级服从上级、底层听命于高层、平民百姓，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什么妄议中央，什么非法集会、非法游行示威等，都不被中共政权所容忍，都要被当局训戒、罚款、拘留或以罪论处。李文亮医生被训戒，致使全世界数千万条生命死亡，至今都令人胆寒！

在海外民运人士中，不尊重他人、不包容他人和相反意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著名异议人士王若望老先生就曾经说过，民运人士一定要打倒自己心中的小毛泽东。因为他看到当时的海外民运人士中，彼此互不服气，互相指责，争斗不断。各个都要争老大，好像个个都像小毛泽东。

真民运人士，就要尊重别人讲话的权利，包容不同意见和建议。动辄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这些不良现象必须克服。

当然，我们尊重、包容他人，并不是是非不分，混淆黑白，不能对那些搅屎棍、闹事者等一概纵容。在坚持民主的基础之上，要按民主程序和民主原则处理问题。如在会议上随意插话打断他人发言。故意挑起事端引发争吵或进行人身攻击等。对这些害群之马的纵容，就是妨碍正常民主的实行。为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我们要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于不具有基本民主素质的人，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劝退、或清除出民运队伍。

3. 脚踏实地与持之以恒

真民运人士都懂得，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千千万万民运人脚踏实地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坚持。

结束邪共暴力专制统治，不能只喊口号，而需要踏踏实实工作。如，宣传和发动民众参加到民主运动当中来，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如果说一呼百应还相对容易，那么，把响应者紧密结合团结起来，则是

很难很难的一件事。特别在西方民主社会，大家的地位平等，思想自由，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所处立场、发表的观点、意见等，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如果靠哄、骗、忽悠，怎能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呢？所以，诚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应该是真民运人的一个标志和特点！

中共靠强制迫使人服从。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统一指示，统一行动。但民主运动则靠民运领袖的道德感召；靠大家自觉自愿，同心协力；靠大家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持之以恒的道德要求很高，也是确保民主运动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记得儿童时代就有一篇铁棒磨成针的课文，告诉我们坚持到底，一定成功的道理。现实生活中常常有人就是因为没有信心和耐心，不能坚持到底，结果是功败垂成。

最近从网上获悉，因纪念“六四”而被中共当局判刑的民主人士董广平，一直都没有停止同中共当局抗争。他已经四次设法逃离中国，前两次分别逃到泰国和越南。都被中共当局分别联合泰国和越南警方，把他遣送回国，并加重处罚。后来，他又只身泅度金门，准备游泳到台湾。但也失败而被迫返回大陆。最近，董广平乘充气橡皮艇逃到韩国，被韩国警方拘押。相信他不弃不舍的坚持，一定会感动上帝，被加拿大政府允许他赴加与其家人团聚。

圣经有言：爱是亘久忍耐。如果我们热爱民主，愿意为中国民主而奋斗，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忍耐，不可以坚持到底的。同道的误会，可以通过解释而消除；邪共如此强大，那我们就以蚂蚁啃树的毅力和精神，日日夜夜的啃噬，相信邪共大树终有一天会倒下。哪怕努力千万次，最后定有成功时。坚持，坚持，再坚持！

持之以恒，不能忽冷忽热，不能半途而废；持之以恒，就是要历尽千难万险都不气馁、不放弃。邪共不亡不罢休！

4. 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

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事。而是千万民众的共同意愿、共同意思、共同事业、共同利益。所以，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对每一个真民运人士，都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质。

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组织，都需要这个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团结协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这就需要大家树立团体意识，发扬团队精神。单打独斗，各行其是，争名夺利，相互拆台，相互攻击等，就一定会给这个团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破坏。

民主运动必须按民主原则办事，并且要有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但还不够，还需要这个民运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具备团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因为民主运动，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参与的。个别人不按民主原则办事，违反民主制度，却不像国家那样有强制力，迫使他/她服从。民运组织只能靠组织成员自己的团体意

识和团队精神，靠自我约束，自觉服从团体的决定和决议。不明知故犯，不搞特殊，不特立独行。

某协会理事会举行理事长选举，理事会共六人（原七人，选举前一人辞职），按协会规则，理事长必须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即四票才能当选。选举时，理事长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只有三票。这个得票最多的理事长候选人是台湾人，在台湾也担任过社会职务，对民主规则不能说不熟悉，对协会的规则不能说不了解，其他理事也很了解，但这个来自于民主社会、口口声声要建立公民社会的人却依然当仁不让地坐上了理事长的位置。

笔者曾经工作过的澳洲某华人教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全澳会督选举。前些年一次选举会督，有一百多名牧师和教会领袖参加投票，进行了23轮投票都没有一位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以上。选举会议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到当夜十二点都无结果。直到第二天早上将近六点，终于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以上，最后当选为该全澳教会的会督。

上述两个例子，反应了一个社会组织的不同“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为什么海外民运团体众多，但不成气候？不能不说，缺乏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就有人说，中国人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一个中国人像条龙，一群中国人像条虫。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几十年没有多少起色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少有民主人士懂得如何按民主规则，进行民主运动。”诚哉，斯言！

中国民主人士，一个真正的民运人，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增强团队意识，发扬光大团队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逐渐让世人改变“中国人不团结”的负面印象和看法！

5. 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

这也是真民运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一方面要求民运人不轻易鼓吹、煽动他人承担自己不愿意承担的风险或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另一方面就是勇于承担责任，愿意并主动承担因民主运动而带来的后果。特别对民运领袖而言，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更为重要！

在通过何种方式或途径，结束中共暴政的问题上，民运界一直都有争论。一种观点主张通过“暴力革命”，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能通过“和平革命”（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简称和、理、非”）。几十年了，主张暴力革命的民主人士认真想过没有？手无寸铁的群众怎样赤手空拳，对付武装到牙齿，掌握了几百万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的中共暴力政权？特别在现代通讯技术和检查、检测、识别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平民百姓从哪里得到武器？现代社会，从苏联、东欧巨变，到“茉莉花”等颜色革命，又有哪个国家的政权更替是通过暴力革命成功的？还有，美日欧等现代文明国家，不但不支持暴

力革命，而且视主张暴力者为恐怖分子，全力围捕、消灭之都唯恐不及，哪一个会公开支持“暴力革命”？

问题来了，既然“暴力革命”不靠谱，不现实，为什么还有人鼓吹、煽动，并且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呢？他们是何居心？难道是故意让别人去做无谓的牺牲，而他们自己却躲在平安富足，自由民主的国家吗？这样的人不是什么真正的民运人！因为他们缺乏真民运人应该具备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笔者认识一人，他公开参加了党章明确规定“和理非”的某民主党派，却总是在各种场合反对别人提“和理非”。令人不得不问，他是老糊涂了，还是人格分裂？或者是有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

还有一位所谓民运大佬，大家都知道，过去他是一位“和理非”倡导者，而近十几年，他却转而成了一“暴力革命”鼓吹者。在纽约、洛杉矶等城市，他频频参加集会、游行，发表暴力革命的演讲。有人提出疑问，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转变？知情者直接回答说：为了钱！果真如此，实在可悲、可怜、可叹！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及所在组织主张和平革命，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反对暴力革命。和平革命是我们根据当前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形势所做的判断，从而提出的务实而策略的主张。对于暴力革命者的有效革命行为，我们真诚高兴。如果暴力革命成功，我们更是乐观其成。再者，广大劳苦群众为了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以武力反抗暴政，抵抗、打击掌权者的迫害行为，是合法合理的正当防卫行为。我们不但不会反对，而且还会大力声援支持。我们反对的是那些身在“和理非”组织的章程之下，却公然反对对自己“同意”了章程，非逻辑、不道德地鼓吹什么“暴力革命”！

二、真民运人的民主素养操练

真民运人，除了道德层面的要求，还必须经常不断进行民主素养操练。

1. 政治素养

正确理解本国和有关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等有关规定，及其运作程序与要求。

真民运人在民运活动中，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得做违法犯罪的事。如在澳大利亚，我们集会、游行或在中共国驻澳洲的使领馆门前举办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前，都要提前申请并获得批准。也有朋友，公开毁坏了财物，被澳洲有关执法机关给予了惩罚处理。这都是政治素养或水平造成的问题。

明确地说，民主运动是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不是情绪表达，不能靠大声喊叫。而是要事先制定妥善的计划，提出可行方案，分清实施步骤，明确分工负责等。不然，乌合之众，一哄而散，就表明这个组织和成员在政治上很不成熟。

我曾阅读过一篇很好的《六四反思》的文章，说

道：“妥协仅是解决争端的方式，不是最终目的，更不会改变极权体制本质”。但“妥协可以减缓冲突升级，实现阶段性的目的-即体制内改革派有话语和主导权，从而避免镇压，并有可能走向深化改革机会。这一目标在当时国内社会条件与国际政治环境是具有可行性的。但学潮自身的街头政治性质使政治目标与行为方式分裂，情绪高于理性，自由压制秩序，造成学生和社会各界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

早有西方学者提出，妥协和谈判是一门艺术。因此，学会妥协，掌握谈判技巧，对每一位真民运人的民主素养的提高都非常重要。

2. 认知能力

应该承认，任何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一定局限的。真民运人要十分注重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不断提高我们在各方面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了解本国历史与现状，学习国际民主运动历史和现代经验。从而帮助我们所从事的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

3. 公共沟通能力

本人自从事海外民主运动以来，参加过几十场次民运会议了。座谈会、研讨会、甚至重要的大型集会，经常出现插话，抢麦克风，或大打出手，最后导致大家不欢而散的场面。这都是因为大家不能理性表达，缺乏公共沟通能力，形成情绪对立，进而发声冲突。因此，能与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理性沟通。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也能让对方正确理解自己的意思，从而达成一致意见。使会议成功而顺利，使我们的民运组织健康发展壮大。

4. 组织能力与纪律

民主运动若缺乏组织伦理，没有程序，没有纪律。就容易引起内部失序、纷争、分裂。

每一场民主行动的成功举行，都需要领袖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这里，民主团体的领袖严格按程序办事和严格执行纪律是十分关键的因素。我们华人组织，多注重面子和人情，却往往轻视纪律的执行。这是民运组织的领袖特别应该改进的。

结语：无需讳言，中国民主运动，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许多争议。山头林立，夫妻店，永久主席，派系争斗，个人崇拜，“逢中必反”，双重标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位真民运人都应该重视，并思考寻求克服、解决之道。严格以民运道德标准规范自己，不断操练自己的民主素养，无疑会极大提升中国民主运动水平！

2026年6月3日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自由，不应止于国界

作者：张宇

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相似的感觉。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仿佛终于穿过了一道无形的墙。

从此不再需要翻墙看新闻，不再需要担心朋友圈里哪句话会被举报，不再需要在发言之前反复斟酌哪些词能说、哪些词不能说。许多人相信，只要离开中国，专制的阴影就会停留在过境线的另一边；只要身处民主国家，自由便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空气。

然而，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有的人参加了一场和平集会活动，几天后，国内父母接到派出所电话；

有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文章，随后亲属被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

有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谈论人权、民主和自由，结果家乡的亲人被国安局约谈；

还有的人只是转发了一条敏感新闻，便遭遇网络骚扰、账号举报、匿名威胁，甚至工作和学业受到影响。

他们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甚至已经取得当地公民的身份，但一种熟悉的恐惧却从未真正离开。

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所在国家政府，而是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北京。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不断扩张的一种权力形式——跨国镇压。

它不再满足于控制中国境内的声音，而是试图将审查、监控、恐吓和政治压迫延伸到海外。对于中共而言，国界并不是权力的边界，只是权力投射的起点。它希望所有中国人，无论身处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伦敦、悉尼，都能够感受到同一种压力：不要说不该说的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不要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事务。

于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出现了。

当海外华人在民主国家享有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时，却仍然要担心国内家人的安全；

当他们拥有集会和抗议的权利时，却仍然害怕被拍照、被记录、被列入某种看不见的名单；

当他们终于获得公开表达观点的空间时，却发现中国共产党仍然试图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必须沉默。

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影响力。

它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恐吓，一种针对海外华人社群的政治控制，也是一种对民主国家主权和法治原则的直接挑战。

因为一个外国政府如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制造寒蝉效应，能够通过骚扰、威胁和监控压制当地居民的言论自由，那么受到侵蚀的就不仅仅是个体权利，而是整个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长期宣称自己尊重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内政。但当它试图把自己的审查制度、维稳逻辑和政治恐惧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時候，它正在做的，恰恰是对其他国家主权最直接的侵犯。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是海外中国人的私人困境，它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国际政治问题。它关乎自由，关乎法治，关乎一个专制政权是否有权把自己的恐惧输出到全世界。

更关乎一个根本的问题：当一个人离开中国之后，他是否仍然有权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镇压延伸到海外？

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关注海外异议人士，是因为害怕反对声音。

但事实上，这只能说对了一半。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那些脱离了它控制范围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共产党拥有庞大的维稳体系。它控制媒体，审查网络，监控通讯，管理出版，限制集会，打压异议。通过几十年的高压治理，它已经建立起一套几乎覆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控制网络。

然而，一旦有人离开中国，这套体系便出现了裂缝。

当一个中国人身处纽约、伦敦、多伦多或悉尼的时候，他第一次拥有了过去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不受审查的信息环境。他可以阅读被屏蔽的历史资料；可以接触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公开批评执政党而不用担心警察敲门；可以参加集会，可以接受采访，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

对普通人来说，这叫自由。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叫失控。

因为极权统治最核心的基础，从来不是武力，而是信息垄断。

共产党能够长期维持统治，并不仅仅依靠警察、监狱和摄像头，更依靠对现实解释权的掌控。它决定什么是历史；决定什么是真相；决定什么能够被讨论；决定什么必须被遗忘。

而海外华人的存在，恰恰打破了一切。一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中国人，既了解中国社会，又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他能够用中文传播信息；能够向国内亲友讲述不同的观点；能够把被掩盖的事实重新带回中文世

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了一座连接自由与封闭世界的桥梁。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因为对于一个依赖信息控制的政权而言，最危险的不是外国政府，不是国际媒体，甚至不是街头抗议。最危险的，是一个会说中文、了解中国、又不再害怕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长期以来不断试图把自己的控制力延伸到海外。它害怕的不仅仅是某个异议人士发表文章，它害怕的是这些文章被更多中国人看见；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场抗议活动，它害怕的是有人发现，原来中国人也可以公开反对政府而不被逮捕；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段视频，它害怕的是视频背后所代表的事实——共产党并不是不可批评的，权力也不是不可质疑的。

对于民主社会来说，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公民权利。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们意味着一种致命威胁：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除了共产党讲述的世界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因此，跨国镇压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政治报复。

它是一场针对思想的围堵。

共产党试图通过骚扰、恐吓、监控和施压，让那些已经身处自由世界的人，继续按照中国国内的规则生活。它希望你人在美国，但思想仍然停留在防火墙里；它希望你拥有言论自由，但永远不敢使用它；它希望你能够看到真相，却不敢把真相说出来。换句话说，它希望把中国变成一种随身携带的监狱。而这恰恰暴露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不安全感。

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会害怕自己的公民出国。

一个真正稳固的制度，不会害怕人们接触不同观点。

更不会因为几篇文章、几场集会、几条社交媒体发言，就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进行追踪和打压。

只有那些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统治，才会如此恐惧自由。

因为它知道，一旦人们开始自由思考，开始比较不同制度，开始独立判断是非，那么权利长期精心构建的神话，就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人。

它针对的是自由本身。

它试图告诉所有离开中国的人：即使你跨越了国界，也不要试图跨越恐惧。

对于许多离开中国的人来说，移民、留学或者流亡，曾经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他们以为跨过海关，便跨过了恐惧；离开故土，便离开了审查；来到民主国家，便能够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那样生活。然而现实却告诉他们，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当外国政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恐吓居民，当人们在自由社会中依然因为政治观点而感到恐惧，当海外华人被迫进行自我审查，那么被侵蚀的不只是个人权利，更是法治、主权和公共安全本身。

因此，跨过镇压绝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内部事务”。

它是一场针对自由社会的挑战。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可以把他的审查制度输出到海外，那么今天受到影响的是中国人，明天受到影响的就可能是任何人。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礼物。

它需要被争取，也需要被捍卫。

言论自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人们有权说大家都同意的话，而是因为人们有权说权力不愿意听的话。

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中国，却仍然无法摆脱政治恐惧；

如果一个人在民主国家，却依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一个政权能够让远在海外的人继续生活在沉默之中；

那么受到威胁的，就不仅仅是某个群体，而是自由本身。

中国共产党或许能够监控一个人的手机，能够骚扰一个人的家人，能够向海外输出恐惧。但它无法永远阻止人们思考。也无法永远阻止真相传播。更无法让整个世界接受这样一种逻辑：一个人的自由，应当在国界线前停止。

自由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正因为它不属于某个政党，不属于某个政府，也不属于某个国家。

它属于每一个人。

而任何试图把恐惧输出到全世界的政权，最终都会发现一个事实：国界可以限制人的流动，却无法永远囚禁思想。

离开中国，不一定能够立刻摆脱恐惧。

但正因如此，那些敢于发声的人才显得更加重要。

他们所捍卫的，不只是自己的权利。

而是一个最基本、也最不应被妥协的原则：自由，不应止于国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reedom Should Not End at National Bord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tends political pressure beyond China's borders through intimidation, surveillance, family harassment, and censorship. The author argues that many overseas Chinese continue to experience fear despite living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Describing such practices a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he essay contends that they threaten free expressi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t concludes that freedom is a universal value that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by borders, political intimidation, or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影子、血证与家书

作者：曾洪伟

记忆回到2023年11月的美国加州旧金山。我和朋友在街头参与针对中国最高领导人访美的抗议活动。当时，对自由的渴望支撑着我们，但未曾料到，那只无形的手从未缩回，红色恐怖正精准地将阴影投射到我的生活里。

街头的影子与开枪的手势

在群情激愤的街头，一个异常的细节破坏了安全感。在马路对面的路口，一名身高约170公分、留短发、戴口罩的华人男子，正手持设备鬼鬼祟祟地对我和朋友进行近距离偷拍。

当我和朋友感到异样并试图上前制止时，他立刻转身穿过马路逃跑。而在逃跑的过程中，他突然转过身，对我们做了一个开枪的手势。那个极具恐吓意图的动作，在光天化日下的美国街头显得荒诞而冰冷，它在警告我们：反抗可能意味着肉体毁灭。

次日的血证与断裂的安全感

跨国镇压的残酷性在于，它的恐吓绝非虚张声势，而是会以极快的速度演变为现实的暴力。

就在抗议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一位与我一同并肩参与抗议的异见人士，在机场遭到了不明身份人员的残酷殴打，致使浑身是血。前一天路口戴口罩男子的开枪手势，在第二天就变成了同伴流血的肉体事实。这种极短时间内的暴力升级，瞬间击碎了海外的安全感。它向所有发声者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即便在自由世界，你依然随时可能沦为被猎杀的孤立目标。

跨洋的盘问与隐性的株连

然而，红色恐怖的触角并不仅限于海外街头的肉体威胁，更致命的是指向国内家人的隐性株连与跨洋的信息追踪。

抗议活动结束后仅仅几天后，远在中国国内的警察便突然前往我父亲的住所。他们向我父亲详细盘问了我在国外具体下落，目前在海外做什么，并严令索要我最新的联系方式。得知警察正在国内追查我行踪的消息，以及父亲透露出的深深担忧，让我感到极大的震撼与不安。在这场跨国镇压的链条中，这种跨越太平洋的恐吓传递，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敲山震虎”，试图通过让国内的亲人陷入恐惧，从而达到让海外异见者失声的目的。

守望相助，保障安全

经历这一连串的变故，说不恐惧是骗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家人都陷入了巨大的心理挣扎中。但恐惧过后的冷思让我彻底明白：对抗庞大国家机器的唯一方式，就是用组织的力量去对冲个体的脆弱。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痛感，我选择加入旧金山中国民主党，在合法政治团体的守望相助中寻找盾牌。在此，我向所有流亡海外、同样生活在跨国镇压阴影下的异见人士发出真诚的呼吁：请放下犹豫，打破孤立的状态，加入到民主党中来。我们只有融入一个有组织、有担当的成熟政治团体，互相帮助，才能把分散的微光汇聚成火炬，保障我们共同的安全，抵御潜在的风险。自由的土地不容红色恐怖跨境蚕食，克服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将那些在阴影里颤抖的个体，凝聚成并肩站立的钢铁盾。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Shadows, Blood Evidence, and a Letter Home

This article recounts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after participating in protests during the visit of China's top leader to San Francisco in November 2023.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 an unidentified masked man was observed secretly photographing protesters at close range. When confronted, he fled and reportedly made a threatening gun gesture,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intimidation. The following day, a fellow protester was allegedly assaulted and seriously injured, reinforcing fears among participants that threats could escalate into physical violence.

The author further describes how, only days later, police in China visited the family home and questioned the author's father about overseas activities, current whereabouts, and pers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This development transformed a local protest experience into a transnational one, extending pressure across borders and into family life. The essay argues that such tactics seek not only to intimidate individual activists but also to discourage dissent through concern for relatives and loved ones.

Reflecting on fear,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solidarity, organized civic participation, mutual support, and stronger community networks are essential for protecting overseas dissidents and preserving commitments to freedom, human rights, democratic values, and peaceful political express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名为共和国，何以失去人民？

作者：于越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共和国”本应意味着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由人民授权，并对人民负责。然而，当一个国家以“共和国”为名，却缺乏真正的选举制度、言论自由与信息透明时，这一称谓便失去了应有的内涵，沦为形式上的装饰。

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建立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上。人民拥有选票，能够自由表达意见，能够获取真实的信息，并对公共事务进行监督。这些不仅是制度设计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是否承认人之尊严的根本标志。如果人民没有选择权，没有知情权，也没有表达权，那么所谓“代表人民”的说法就缺乏正当性基础。

历史反复证明，依靠控制信息与塑造单一叙事来维持的治理模式，或许可以在短期内稳定局面，但难以获得持久的认同。因为真相不会永远被遮蔽，人们对自由、公正与尊严的追求也不会消失。信息越封闭，谎言越容易滋生；而谎言一旦累积，信任就会逐渐瓦解。当信任不复存在，任何宏大的叙事都将变得空洞。

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惧怕不同声音。相反，多元意见的存在恰恰是社会活力的体现。允许批评、鼓励讨论、保障表达，不会削弱国家，反而会增强制度的韧性。

因为只有公开与透明中，错误才能被纠正，政策才能不断完善，权力才不会失去边界。

我们所呼吁的，并不是对秩序的破坏，而是对规则的重建；不是对社会的否定，而是对公正的追求。权利从来不是某种可以被施舍的恩惠，而是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保障。当这些权利被忽视或剥夺时，提出质疑与要求改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蒙混一时，不能蒙混一世。”这不仅是一句警示，更是一种历史规律。任何脱离人民、缺乏监督、依赖单向叙事的权力结构，都将面临合法性的挑战。而真正稳固的国家，必然建立在人民的信任之上，而信任只能来源于真实、开放与参与。

因此，推动一个更加公开、公正、以人民为本的制度，不仅是权利的回归，更是社会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属于人民的权利，不应被掩盖，也不应被延迟，而应当在制度中得到切实体现，在现实中得到真正保障。



Why Has a Republic Lost Its People?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gap between the ideals of a republic and the reality of governance when citizens lack meaningful political rights. A genuine republic depends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Without these foundations, the claim of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become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sustai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long-term stability cannot rely solely on information control or a single official narrative. Trust is built through transparency, open discussion, and public oversight. When citizens are unable to question authority, obtain accurate information, or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gradually erodes.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lasting legitimacy comes from the consent and trust of the people. A stronger society emerges not from silence, but from openness, participation, and respect for fundamental righ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纪念 64

本文系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发布平台所有。文章来源：@baodiantimes

转载者：付静争

1989年6月4日刺耳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距今已整整37年。时间在流逝，但那天留下的问题，从未真正得到回答。有人说，这段历史早该翻篇；也有人始终坚持，死难者与受迫害者理应被铭记，血案的责任方理应被追究。而在所有这些争论之上，还悬着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六四，究竟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存在怎样无法切割的内在联系？

今年的周年纪念日前夕，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渠道正式发布马尔科·卢比奥国务卿的声明，以中文向世界重申这段历史。声明中写道：

6月4日是中国共产党命令其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数以千计的和平示威者发动攻击37周年，全世界都铭记这一天。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平民，为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并要求民主改革以及对腐败问责而遭到杀害。我们缅怀他们的生命，并向他们的业绩致敬。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那些为捍卫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做出牺牲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也许天意使然，我们永远不知道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官方封锁了数字，销毁了档案，连遇难者的名字都成了禁忌。这个无法填补的空白，本身就是一种罪。正因如此，我们才年年都要纪念、回忆、揭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因为：一个连死亡人数都无法言说的民族，是一个尚未从伤口中醒来的民族。

这份声明之所以令我感到震动，不仅因为它来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机构之一，更因为它用中文、用清晰的语言，说出了一件在中国境内被系统性压制的事实。37年间，审查机器不断升级，关键词被屏蔽，亲历者被噤声，历史课本里这一页从未存在过。

我在加拿大曾经问过许多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对六四仍然一无所知，只有极少数人来到加拿大之后，才第一次听说了那个夜晚。看着他们茫然的眼神，我不知道该愤怒还是心疼，他们不是冷漠，他们只是从未被允许知道。这种感受让我更加确信，我们在海外发声，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

遗忘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被中共精心设计、主动维护的一种状态。“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朴素而坚硬的真理：权力可以压制记忆的流通，却无法消灭记忆本身。只要还有人记得，历史就没有死去。

纪念不只是悼念，它必然包含一个道德层面的追问：是谁下达了命令？谁对数以千计的生命负责？多年

来，六四重新评价的呼声之所以被视为威胁，恰恰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被正式提出，就意味着要触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

声明提到，那些聚集的平民“为行使天赋权利而遭到杀害”，这不是模糊的历史表述，而是对加害与被害关系的清晰界定。“天安门母亲”群体三十余年来坚持记录遇难者名单、寻求官方对话。每次读到她们的名字，我都感到一阵刺痛，那些母亲，用一生在等待一句本不该需要等待的话。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永远缺席。

1989年走上街头的学生与工人，要求的并非推翻体制，而是对话、透明与反腐，这是一次改革的呼唤，而非革命的号角。中共的血腥镇压终结了这场运动，却始终没有解决运动所回应的深层矛盾。此后数十年，经济腾飞的表象下，政治体制的封闭性愈发明显，公民社会的空间愈发收窄。

这意味着，六四不仅是一段需要被铭记的历史，更是中国政治转型路途上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没有对那段历史的正视与和解，任何关于中国走向的讨论，都将是建立在裂缝之上的。“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我愿意相信这句话，不是因为天真，而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强权可以永远将真相压制于地下。

有人或许会问：一纸外交声明能改变什么？我理解这种疲惫，这种质疑。但我更清楚地知道：对于那些无法在国内公开发声的人而言，外部世界的每一次发声，都是一种支撑。它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被遗忘，这段历史没有被遗忘。包括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将永远铭记在心。

美国驻华大使馆选择以中文发布声明，显然意在让这些文字穿透语言的屏障，触达那些正在翻墙寻找真相的人。记忆需要被反复重申，才能对抗遗忘的侵蚀。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说，继续写，继续让这段历史存在于可以被看见的地方。

烛光不能让坦克后退，但它能让黑暗变得不那么绝对。37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海外各个平台纪念六四，是因为那些生命值得被铭记，是因为那些追问从未得到回答，更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真正走向未来的中国，终究必须回望那个血色的六四，诚实地面对自己。

历史不会因为中共的沉默而消失。正义，终有一天会到来。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一个普通人对六四的认知与反思

作者：朱晓娜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六四”从来不是一个被完整讲述的历史事件。在国内，我只零星听到过几个词：“坦克”“大学生”“天安门”。这些词像被切割后的碎片，彼此孤立，无法构成完整的历史画面。关于19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与主流媒体中都未曾获得完整信息。

说来有些奇怪，一个影响了无数人的历史事件，却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只剩下几个模糊的名词。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会去追问。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长一段历史，在我的认知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直到来到美国之后，通过不同的信息来源、历史资料，以及参与纪念活动，我才逐渐拼凑出那段历史的基本轮廓。

那是一场围绕改革与公共诉求展开的社会运动，并在1989年6月以悲剧方式结束。此后，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长期被限制讨论与公开表达。我也逐渐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六四”的理解仅停留在零散词语，甚至完全空白。并非因为他们不愿了解，而是因为信息本身在结构上被长期隔离。

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代人只能接触到符号，而无法接触到叙述时，这种“集体性遗忘”究竟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被刻意塑造的结果？

2026年6月4日，我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参与了六四三十七周年纪念活动。

夜幕降临，人群逐渐聚集。有人点燃蜡烛，有人摆放鲜花，有人静静站立，也有人低声交流那段历史。

现场没有喧嚣，但气氛是沉重而克制的。在这里，那些在国内被压缩成关键词的记忆，以完整叙述和公开表达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我也有幸参与了一段六四纪念诗歌朗诵，其中一部分由我朗诵：

“当鲜血流过长安街，夜色比枪声更沉重。

有人在恐惧中学会沉默，也有人在沉默中选择坚持。

不是所有人都被迫遗忘，总有人在时间深处守住记忆。”

在漫长岁月中，总有人在深夜轻声追问：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一天的经历。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零散词语。

想起曾经对那段历史的陌生与空白。也想起纪念现场那些默默点燃蜡烛的人们。

我忽然明白，纪念并不只是为了过去。它也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

对于我而言，这次纪念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参与，更像是一堂迟到了很多年的历史课。它让我从一个只听过几个词语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了解历史、记住历史的人。

或许我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我知道了那一年发生过什么，也知道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愿意在每年的六月，点燃一支蜡烛，守护一段记忆。因为记忆不只是为了回望过去。也是为了告诉未来的人：有些事情，可以被尘封，却不应该被遗忘。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宪法承诺与现实打压之间

——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困境

作者：张超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从法律文本来看，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也有权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进行宗教活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教会信徒所经历的情况却与这一宪法承诺存在明显落差。对于基督徒而言，信仰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祷告、查经、敬拜以及与其他信徒共同聚会，都是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受到保障的宗教活动，在一些地方却被视为需要严格管控甚至打击的对象。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对未纳入官方宗教体系的家庭教会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许多坚持独立聚会的家庭教会被认定为“不合规”或“非法”，聚会场所遭到查封，教会活动被迫停止，信徒和教会负责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调查和施压。对于许多家庭教会成员来说，他们并非从事任何违法活动，只是在私人场所进行祷告、查经和敬拜。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宗教活动，也可能面临警方介入、行政处罚或持续监控。一些教会被要求停止聚会，一些牧师和同工被约谈、传唤，甚至遭到拘留。

这种情况使许多信徒感到困惑：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为什么正常的宗教聚会却会受到限制？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整顿行动在多个地区持续发生。一些规模较大的家庭教会被强制关闭；教会财产被没收或查封；聚会地点被迫搬迁；信徒个人信息被登记备案。部分教会负责人因组织宗教活动而受到刑事调查，甚至被判处刑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监控体系的不断扩大，也让宗教信仰徒面临更大的压力。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以及网络信息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聚会地点、参与人员以及活动情况越来越容易被有关部门掌握。不少信徒反映，他们曾接到警方电话询问宗教活动情况；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信仰背景；教会负责人被要求定期汇报活动内容；部分信徒甚至因为参与家庭教会聚会而受到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影响。

这些现象表明，家庭教会信徒所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宗教管理问题，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实压力。作为一名长期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基督徒，我对此感受尤为

深刻。我始终相信，信仰属于个人良心自由的范畴。一个人选择信仰什么、如何敬拜、与谁一起聚会，不应成为受到调查或处罚的理由。

然而，中国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持续打压，使我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处境。我担心自己的宗教背景会被有关部门调查；我担心过去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经历会成为被关注的原因；我担心自己继续坚持家庭教会信仰后，会受到约谈、监控或者其他形式的压力；我也担心因为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立场，而被视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担忧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近年来大量家庭教会和基督徒所遭遇的现实情况之上。当家庭教会不断被关闭，当牧师和教会同工因组织聚会而受到处罚，当普通信徒因参加宗教活动而受到监控和调查，当宪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充分落实时，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返回中国，自己同样可能因为家庭教会背景和持续参与宗教活动而面临风险。一个真正尊重宗教自由的社会，应当允许公民按照自己的信仰进行和平聚会；应当保障信徒正常的敬拜权利；更应当让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条款不仅停留在纸面上，而能够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

遗憾的是，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教会信徒而言，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与现实处境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使我对返回中国后的处境感到深深担忧。而这也是我害怕返回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Constitutional Promises and Practical Restric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gap between China's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experiences of many house church Christia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dependent worship, Bible study, and prayer gatherings often face restrictions, surveillance, and official pressure. Citing reports of church closures, investigations, and monitoring of believers, the essay highlights concerns about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religious right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genuine religious freedom requires not only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on paper but also consistent safeguards that allow believers to practice their faith peacefully without fear of punishment or interfere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

——洛杉矶中领馆前集会声援国内良心犯

作者：沈美花



2026年5月24日，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了声援徐光活动。当天阳光很强，大家顶着烈日站在中领馆门口，高举横幅与标语，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徐光以及毛庆祥目前遭遇的不公。

现场来了不少民主人士、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朋友。大家拉起民主党创始人朱虞夫先生毛笔手书的大型横幅：

“中共摧残徐光天理难容！迫害毛庆祥神人共愤！”并讲述了毛庆祥和徐光在浙江活动的一些故事。

很多人手里举着“徐光无罪”、“声援徐光”的牌子，还有人展示介绍徐光经历的展板。站在中领馆门口，我感触很深。虽然只是一场海外街头的抗议活动，但大家都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外界继续关注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

据朱老介绍，徐光曾参与1986年和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也曾参与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工作；1999年，他曾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五年；2022年，又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

让我尤其难受的是，徐光在狱中长期绝食抗议，身体状况令人担忧。但即使如此，外界对他的关注依然十分有限，所以大家才会来到中领馆前，希望发出声音。

除了声援徐光，我们也声援毛庆祥，他只是因为在徐光出狱后前去探望徐光，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与徐光会面的照片，随后就被警方带走。到活动当天为止，

已经超过48小时没有被释放。很多参加活动的人都认为，仅仅因为探望朋友，发布合影照片就遭到拘押，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现场我们不断呼喊，希望立即释放毛庆祥。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在中国仍然有人因为言论、因为交朋友、因为表达观点而失去自由。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募捐，委托《在野党》杂志，转交给徐光家属。我们也会把类似活动及募捐项目持续下去。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大家举着横幅、喊着口号，内心很复杂：一方面，觉得个人的力量很小；但另一方面，如果连声音都没有，那很多事情就真的会被遗忘。

也许一次活动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我们没有沉默。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China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lliance Rally Supports Chines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On May 24, 2026, activists gath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to support Xu Guang and Mao Qingxiang. Participants displayed banners, share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cases, called for their release, raised donations for Xu Guang's family, and urged continued attention to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hina.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纪念六四三十七周年

— 旧金山花园角广场举行民主女神像清洗活动

作者：吕小静



抗议中共六四大屠杀的巨大横幅及大合照

【旧金山讯】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数百万学生、市民与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呼吁反腐败、新闻自由与政治改革。然而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当局出动军队与坦克，对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展开血腥镇压，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三十七年过去，“六四”在中国大陆依旧被封锁，但在海外，仍有人坚持纪念历史、守护真相。

2026年5月24日，六四三十七周年前夕，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Portsmouth Square）举行“民主女神像清洗活动暨六四历史图片展”。多位八九民运人士、海外民主活动人士、青年团体成员及社区民众到场参与。活动现场，许多人认真擦洗民主女神像，也有不少民众驻足观看六四历史图片展，在一张张历史照片前沉默阅读、低声交流。



民众驻足观看六四历史图片展

广场上，民主女神像在阳光下格外醒目。现场同时展出大量六四历史图片

与文字资料，从学生绝食、市民游行，到坦克进入长安街的画面，令不少路过民众停下脚步久久凝视。

方政：希望民主女神像终有一天回到中国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前排中间

八九学运领袖方政在现场发言。1989年六四镇压期间，方政在撤离天安门途中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成为六四惨案的重要亲历者之一。三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推动六四纪念与中国民主运动。

方政首先特别感谢此次“清洗民主女神像”活动的长期发起人、前“人道中国”主席葛洵。他表示，自2010年以来，葛洵每年都会提前准备清洗用品与活动物资，让这一纪念活动能够持续至今。

方政表示，旧金山民主女神像不仅是一座雕像，更是一代海外华人共同守护的历史记忆。

“每年六四前，我们来到这里清洗民主女神像，不只是擦去灰尘，更是在提醒大家，不能忘记六四，不能忘记那些为自由付出生命的人。”

他说，这座建立于1994年六四五周年期间的民主女神像，是美国西海岸极具象征意义的民主地标，也承载着无数中国人对自由与民主的希望。

方政表示，希望民主女神像所代表的自由精神，能够继续在海外华人心中传承下去。

“我们最终还是希望，有一天民主女神像能够回到中国，让中国人民能够公开纪念六四，真正拥有民主与自由。”

现场响起长时间掌声。

葛洵：让六四记忆继续被看见



清洗民主女神像活动主要发起人葛洵（左一）

活动发起人葛洵表示，自己1989年时已在美国留学，当年积极参与声援中国学生民主运动，之后长期投入海外六四纪念活动。

他回忆，2010年前后，有人提出在六四前清洗民主女神像，此后大家决定将活动持续下来。十多年来，无论天气如何变化，这项活动始终没有中断。

葛洵表示，希望通过持续纪念，让更多人知道六四历史，也让仍在中国坚持争取自由与人权的人看到希望。

周锋锁：六四是一场永久无法被抹去的历史记忆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周锋锁则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层面，回顾了1989年民主运动的意义。

周锋锁是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也是天安门广场绝食团成员。六四后，他遭中共通缉，后流亡海外，长期推动中国民主与人权运动。

“六四是一场永久的纪念”

周锋锁表示，六四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整个中国社会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觉醒。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

“1989年，北京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全国三百多个城市都有人声援。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和平地争取民主自由。”

他说，中共最终却以坦克、机枪与屠杀回应人民的呼声。

“那些人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死难者里，有九岁的孩子，也有八十岁的老人。直到今天，外界仍无法知道，那场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

周锋锁表示，正因为历史被封锁，人们才更需要继续纪念六四。

“六四已经不只是中国的历史，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重要象征。”

“柏林墙倒塌，也受到六四精神影响”

周锋锁回忆，曾有参与推倒柏林墙的人亲口告诉他，1989年北京学生争取民主自由、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东欧人民巨大的鼓舞。

“他们告诉我，北京学生站出来反抗专制，让很多东欧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人民也可以站出来争取自由。”

他说，自由与民主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独有的价值，而是全世界共同追求的理想。

“无论在中国、东欧，还是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人争取自由，这种精神就会彼此影响、彼此点燃。”

“从被嘲笑到越来越壮大”

周锋锁还回忆，早年海外纪念六四时，参与人数非常少，甚至经常遭到冷嘲热讽。

“二十多年前，我们刚开始在旧金山公开纪念六四时，很多人觉得没有意义，还有人嘲笑我们，说不会再有人记得六四。”

但他表示，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有人坚持站出来。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主动了解六四历史，民运队伍也在不断扩大。

“中共一直希望人们遗忘六四，但实际上，每一年都有新的年轻人开始认识真相。只要还有人愿意了解历史，中国就一定还有希望。”

华语青年挺藏会会长段荆棘到场声援

活动当天，华语青年挺藏会会长段荆棘也到场参与，并分享长期推动汉藏交流与人权倡议的理念。

她表示，中共长期利用恐惧与分化制造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而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彼此，而是制造压迫与恐惧的极权制度。

段荆棘展示了一面仿制旗帜。她表示，原型来自1989年一位藏族学生在

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所持旗帜，希望借此提醒世人：1989年的民主抗争，并不仅仅发生在北京。

她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汉人与藏人之间的桥梁，让更多华人了解西藏历史与现实处境。

“如果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就会完全活在谎言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为良心犯徐光募捐：让坚持自由的人感受到温暖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一人一美金”募捐活动，专门为中国国内因争取民主自由而遭受迫害的良心犯及家属筹集援助资金。



此次募捐重点声援刚出狱的民主人士徐光。

徐光是1989年杭州学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国民主党早期成员之一。多年来，他持续公开纪念六四并推动民主理念，因此多次遭到中共打压。2022年，徐光再次因纪念六四及发表言论被捕，后被判刑四年。

在狱中，徐光长期绝食抗议，以表达对政治迫害的不满。近期出狱后，他公开表示：

“为了纪念六四，无怨无悔。”

这句话也令现场许多人深受触动。

方政在现场表示，当天活动所售出的文化衫收入，将全部捐赠给徐光，希望让所有为中国争取自由的人士感受到海外华人的温暖与关心。

“我们不能只享受自由，却忘记那些仍在黑暗中坚持的人。”

组织者表示，本次募款将通过“在野党”账户转交至徐光本人手中，希望能够为其提供实际帮助，也让更多良心犯感受到外界仍在关注他们。

活动最后，现场民众共同高喊“勿忘六四”“自由中国”“结束专制”等口号。

阳光下，民主女神像静静矗立。而围绕雕像的人群，也让人再次看到：即使三十七年过去，仍有人坚持守护历史、守护真相，也守护着中国未来走向自由的希望。

编辑：张娜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华语青年挺藏会会长段荆棘（右一）、年轻艺术爱好者Ruty手绘坦克图像（中）、中国民主党组织部部长周云龙（中）

圣荷西集会吁加拿大庇护董广平

作者：关永杰

2026年5月31日，来自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党及当地民主人士等十余人，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政厅前举行集会，声援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并恳请加拿大政府尽快给予其政治庇护身份，使其能够与已定居加拿大的家人团聚。

活动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北加州负责人李海风等人发起。李海风在开场发言中介绍了董广平的经历，并表示此次活动虽在美国举行，但声援不受地域限制，只要发出声音，世界各地都能听见。

据介绍，董广平出生于1958年，河南郑州人，曾担任警察。1999年因公开声援“六四”而被开除公职。此后，他长期参与民主维权活动，多次因政治原因遭到拘押和判刑。2001年因参与民主活动被判刑三年；2014年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后再次遭到关押。董广平在出狱后并未停止追求民主与自由，而是持续进行抗争。2015年，他携家人离开中国前往泰国，当时加拿大已同意向其提供庇护，但在中共当局施压下，泰国警方将其遣返回中国，其家人则先行抵达加拿大。此后多年间，董广平不断尝试离开中国，与家人团聚。他曾尝试游泳前往台湾金门，也曾经由越南出逃，但均遭挫折并再次被遣返。今年5月25日，68岁的董广平驾驶皮划艇从山东烟台出发，横渡黄海抵达韩国，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李海风表示，数百公里的海上航程充满危险，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而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他认为，支撑董广平一次次逃离中国的，是对自由的向往以及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

李海风还透露，据维权人士盛雪传来的消息，加拿大方面已经传出积极信号，董广平获得庇护身份“应当没有问题”，但最终官方文件尚未公布。因此，集会参与者仍希望通过公开声援，向加拿大政府表达支持，也让远在韩国的董广平及其在加拿大的家人感受到来自海外民众的关心与支持。

活动期间，中国民主党人士马相平带来了自己亲笔书写的声援标语，并发表感言说：“自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他来说却需要拼尽全力，甚至要用生命去争取。68岁的他独自驾驶一艘小小的皮划艇，从中国海岸出发，穿越茫茫黄海，在惊涛骇浪与黑夜之中漂泊了三十多个小时，没有护航，没有退路，只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因为在海的那一边有他向往已久的自由世界。当一个人宁愿把生命交给大海，也不愿意继续留在中共这个牢笼之中，这趟远航便不再是一次简单的逃离，而是一场关于勇气、信念和尊严的抗争。有人跨越山河去寻找财富，有人跨越国境去追寻梦想，而他跨越生死只为投奔自由。这一段真实的人生传奇，一次用生命完成的远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海的彼岸，而

是从恐惧走向自由。”

多位与会者随后发言，对董广平长期坚持民主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表达敬意。

中国民主党成员惠汝涛回顾了董广平数十年来的维权历程。他表示，董广平出身于官员家庭，曾经当过兵和警察，但最终选择站在良知与正义一边。无论是因纪念“六四”而遭受迫害，还是后来多次尝试逃离中国，都体现出他对民主、法治和人权理念的坚定坚持。

活动发起人之一张勇则指出，董广平原本属于体制内人士，家庭条件优越，可以说是共产党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然而，他在认清中共本质后，选择站到人民一边，为民主自由持续抗争，最终失去了工作、家庭团聚和国内的一切根基，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认为，这种精神尤其令人敬佩。

陈伟文、杨坤等与会者则从个人感受出发，表达了对董广平勇气的钦佩。陈伟文回顾自己当年在国内开始“网络翻墙”时那突然之间的信念崩塌，夹杂着惊讶、恐惧与绝望，但从未有董先生这样的勇气，董先生多次冒死出逃，这次同样是冒着生命危险横渡一望无际的黄海，说明其对中共政府现状已经彻底绝望，也体现出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杨坤还分享了自己疫情期间骑自行车从上海返回河南与家人团聚的经历，认为董广平为追求自由和与家人团聚所付出的代价远超常人想象。

何冬玲表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人们都应尊重每个人追求自由、尊严和表达权利的基本权利。她呼吁相关政府部门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公平、公正地审理董广平的庇护申请。

张辉、杨宗阔、盛虎等发言者则认为，董广平事件不仅是个人遭遇，更反映了中国异议人士长期面临的政治压力和人权困境。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试图离开中国，反映出中共专制统治所带来的深层问题。董广平作为曾经的警察和体制内人士，仍然坚持公开纪念“六四”、表达政治观点，并因此长期遭受打压，其经历具有象征意义。

发言者们普遍表示，希望韩国政府能够保障董广平的人身安全，不将其遣返回中国，并期待他能够尽快前往加拿大，与家人团聚。

活动结束后，李海风再次重申了当天集会的主题——“恳请加拿大政府给予董广平政治庇护身份”。他感谢所有参与者到场发声，并表示每一次公开表达都将成为历史记录的一部分。与会者随后在圣荷西市政厅前合影留念，为此次声援活动画上句号。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举行“六·四”37周年纪念活动

作者：孟家虎

2026年5月30日,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迎来37周年祭日之际,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于檀香山中国城文化广场隆重举行纪念活动。民主党员和家属在夏威夷和煦的阳光下集结,通过慷慨激昂的演讲与发放传单的方式,共同缅怀为民主自由献身的先烈,向国际社会传递不熄的自由火种。

活动开始前,所有与会者庄严伫立在文化广场孙中山雕塑前,高举“纪念‘六·四’37周年”的白色横幅,向“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活动中,四位代表发表了富有感召力的讲话。身着“勿忘‘六·四’”黑色T恤的湾区党部副秘书长张小驹字字铿锵:“37年来,中共政权机关算尽,试图抹去那段血染的历史。但历史不会因压制而断流,真相更不会因沉默而湮灭!”他指出,无论是严密的舆论封锁、对亲历者的残酷打压,还是对年轻一代的“洗脑式”遗忘教育,都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尊严与公义的渴望。

张小驹特别提到,曾经的香港支联会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维园的烛光成为华人世界永恒的记忆与反抗图腾。然而,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支联会被迫解散,李卓人、邹幸彤等也身陷囹圄。这一巨大变故更让世人看清,“六·四”非但未能平反,自由世界香港的空间却被进一步蚕食的残酷现实。他呼吁:“在今天,我们坚持纪念‘六·四’,不仅是在守护历史真相,更是守卫人类文明的底线与良知!唯有铭记伤痛、直面历史,中国社会才谈得上和解与进步,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宪政民主!”发言后他带领与会者高喊口号:

勿忘“六·四”屠城,结束一党专政!Never Forget, Never Forgive!

夏威夷支部副主任王礼华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他指出,中国在“六·四”屠杀之后,不但从未向遇难者及其家属作出任何道歉与忏悔,反而在37年后的今天,使这个政权演变得更加专制,对人权与自由的压迫也更加系统化、全面化。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高压统治,如今又叠加了大数据监控、人脸识别、网络审查与人工智能追踪等高科技数字极权手段,让社会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王礼华表示,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严峻的国家之一,大量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宗教信仰群体及少数民族仍持续遭受打压。然而,他同时强调,历史的发展从不会永远停留在黑暗之中。民主浪潮或许会有起伏,追求自由、人权与普世价值的道路也许充满艰难,但人类对尊严与正义的向往终究不可阻挡。他呼吁海内外同胞,尤其是在高压与逆境中的民主人士,更应坚定信念、守望相助,继续为真相、自由与未

来中国的民主化坚持发声!

夏威夷党部党员吕斌发言指出,在高压维稳与数字监控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民基本权利持续受到压制,许多异议人士和维权群体仍身处困境。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关注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对人权问题的持续关注与监督,应以实际行动推动基本人权保障的落实,让自由与尊严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坚守的底线。

身着黑色“StandwithHongKong”党员李艺在总结发言中动情展望了未来。她强调,民主事业从来不是一代人就能够完成的使命,而是一场需要薪火相传、代代接续的长期奋斗。正因为如此,青年一代的觉醒与参与,决定着未来中国能否真正走向自由、法治与宪政民主。她特别鼓励年轻人勇敢接过追求民主与宪政的接力棒,不论身处世界任何角落,都不要放弃对自由、人权与尊严的向往,更不要因为现实的压力而选择沉默与遗忘。她呼吁身处自由世界的年轻一代珍惜自由社会所赋予的权利与空间,通过学习、交流与行动,将民主、人权与法治的理念不断传播下去,让更多人理解自由的价值,并为未来中国的和平转型积蓄力量。

为了让更多国际友人了解这段历史,参与者在现场积极向过往路人派发精心制作的英文传单,内容详尽介绍了“六·四”事件的时间线、背景及深远影响,不少游客驻足阅读并与成员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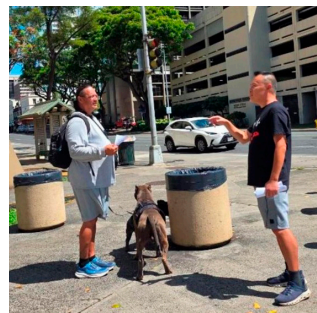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主任孟家虎重申,将持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直至正义最终实现,荣光归于人民。

在慷慨激昂的气氛中,此次活动在夏威夷支部副主任王礼华带领下,绕文化广场游行后圆满结束。

活动参与者:

王礼华、张小驹、孟家虎、李艺、吕斌、伍雄、龙君红、阙美娇

编辑: GeoffreyJin 校对: 熊辩 翻译: 戈冰 美编: 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六·四”37周年：枪声之后的中国，沉默之下的民族

作者：曹泽锋

民运行动
Democratic action

2026年6月4日，我再次站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

37年前，北京的长安街上，坦克履带碾过的不只是青年学生的身体，也碾过了一个民族刚刚苏醒的公民意识；37年后，中共依然不敢面对那一夜的枪声，不敢公布死难者名单，不敢允许母亲悼念孩子，不敢让中国人自由说出“六四”两个字。

一个政权，如果真的清白，何必害怕记忆？

一个政党，如果真的伟大，何必恐惧真相？

1989年的学生不是暴徒，市民不是叛乱者，天安门广场不是战场。他们要的不过是反腐、透明、自由、尊严，是一个现代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可是中共给出的答案，是戒严令、机枪、坦克和清洗。那一夜，它没有镇压“动乱”，它镇压的是中国人要求做人的权利。

“六四”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更漫长、更阴冷的时代。枪声停止了，但恐惧没有停止；广场被清空了，但审查没有清空；尸体被运走了，但国家机器从此学会了如何让整个社会闭嘴。

中共最残忍的地方，不只是杀人，而是杀人之后还要禁止记忆；不只是制造死亡，而是逼迫活着的人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它把历史从课本里删除，把关键词从网络上屏蔽，把母亲的哭声变成“寻衅滋事”，把悼念者变成“境外势力”。在这个政权眼里，鲜血不是罪证，记忆才是罪证。

所以，“六四”从来不只是1989年的一天。它是中共统治逻辑彻底成形的一刻。自那以后，法轮功被镇压，维权律师被抓捕，香港自由被碾碎，新疆集中营震惊世界，白纸运动青年被秋后算账。所有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共同证明：当一个政权曾经用坦克镇压人民，它就会不断用恐惧统治人民。

37年过去，中共最成功的工程，不是高铁，不是大楼，不是GDP，而是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沉默社会。许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六四”，许多人知道却不敢说，许多人不敢说久了，便开始骗自己说“不重要”。这正是极权最可怕的地方：它不只控制人的嘴，还改造人的记忆；不只让人沉默，还让人把沉默误以为成熟。

可我们站在海外，不能替暴政完成遗忘。

我看见有人举着烛光，有人举着死难者的照片，有人高喊“平反‘六四’”，有人沉默地低头。那一刻我明白，纪念“六四”不是形式，不是口号，更不是政治表演。它是对死者的交代，是对活人的提醒，是对中共谎言的持续抵抗。

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中共就没有真正胜利。

只要我们还说出“六四”，它的封锁就没有完成。

只要还有人站在中国领事馆门前点燃蜡烛，那一夜的枪声就不会被历史吞没。

“六四”真正划出的分水岭，不只是人民与政权之间的分水岭，也是记忆与遗忘之间，尊严与苟活之间，沉默与抗争之间的分水岭。有人选择忘记，因为忘记看起来安全；有人选择沉默，因为沉默看起来聪明；也有人选择继续说，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伤口都不敢看，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站起来。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悼念37年前倒下的学生和市民，更是为了告诉这个世界：中共所谓的“稳定”，建立在恐惧之上；所谓的“发展”，掩盖不了血债；所谓的“民族复兴”，如果不能容纳真相与自由，不过是一个更精致的牢笼。

真正的中国，不应该属于坦克和谎言，不应该属于审查和告密，不应该属于那些靠删帖、抓人、封号、恐吓来维持统治的人。真正的中国，应该属于那些在1989年举起横幅的人，属于那些在黑暗中守护记忆的人，属于那些即使流亡海外、仍愿意为真相发声的人。

“六四”没有结束。它活在每一个被删掉的词里，活在每一个被监控的母亲眼中，活在每一个不愿跪下的中国人心里。

37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强大，而是因为我们不能背叛记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恐惧，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恐惧一旦成为习惯，奴役就会成为命运。

愿死者安息，愿真相归来。

愿每一个拒绝遗忘的人，都成为暴政无法熄灭的火种。

愿有一天，“六四”不再只能在海外被纪念，而能在中国大地上，被公开悼念，被真实书写，被庄严平反。

编辑：韩立华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勿忘“六·四”，星火不灭

——洛杉矶各界人士纪念“六·四”三十七周年

记者：贾嘉



“六·四”纪念馆外，来自南加州各地的民众参加“六·四”三十七周年纪念活动

六月的洛杉矶阳光明媚，却无法冲淡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2026年6月4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与国际联盟）、“六·四”纪念馆、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公民抵抗协会、中国社会民主党、香港自由民主党以及《皇帝除三害》电影工作组等团体联合举办的“勿忘‘六·四’星火不灭——‘六·四’大屠杀三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在加州艾尔蒙地（El Monte）“六·四”纪念馆举行。

三十七年前，北京街头发生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至今仍牵动着无数人的记忆。三十七年后，不同城市、不同背景的人们汇聚而来，共同缅怀逝者，追思历史，守护真相。

下午两点半，纪念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开始。

纪念馆内陈列着大量与1989年民主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图片和实物。对于许多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年轻人而言，这些展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历史课。泛黄的照片记录着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理想与热情，保存下来的文献则默默诉说着那段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岁月。

活动开始后，全体与会者起立默哀，向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们致以最深切的哀思。

随后，现场合唱《历史的伤口》。歌声缓缓响起，许多参与者轻声跟唱。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段无法忘却的人生记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歌声则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一座桥梁。

在宣读《天安门母亲宣言》环节中，现场气氛格外凝重。几十年来，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始终没有停止对真相与公义的追寻。岁月流逝，但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从未改变。宣言中的每一个字句，都让人感受到历史留下的伤痛与坚持。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六·四”纪念主题壁画揭幕仪式，成为现场另一项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环节。

在众人的见证下，一幅大型纪念壁画正式向公众展示。壁画以鲜明而强烈的视觉语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世界：一侧是蓝天之下象征自由与希望的现代城市景象，另一侧则以深沉厚重的红色调展现历史的记忆与伤痕。两种色彩形成鲜明对照，寓意着人们对自由、人权与民主价值的向往，也表达了对历史真相的坚守与追寻。



“六·四”纪念主题壁画前，与会人士共同高唱歌曲并发表演讲

随着壁画揭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多位嘉宾站在壁画前发表讲话，与会者共同高唱纪念歌曲，表达对历史的铭记与对未来的期许。

壁画作者在现场介绍创作理念时表示，希望通过艺术形式记录历史、传递记忆，让更多年轻人能够了解那段历史，思考自由、人权与公民责任的意义。

不少参观者在壁画前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对于“六·四”纪念馆而言，这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更是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历史记忆坐标。它提醒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历史不应被遗忘，真相值得被铭记。

活动中的“坦克人”行为艺术重现，成为现场最具震撼力的环节之一。

当那熟悉的历史画面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许多人举起手机记录，也有人静静凝视。三十七年前，一名



“六·四”纪念主题壁画正式亮相，成为纪念馆新的历史地标

普通公民孤身站在坦克车队前方，用自己的身体阻挡钢铁洪流。世界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但他的身影早已成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

勇气并不总是轰轰烈烈。

有时，它只是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

献花仪式上，与会者依次走向纪念区域，献上鲜花，表达对逝者的追思。

一束束鲜花静静摆放在纪念碑前，也寄托着人们对历史真相与人类尊严的敬畏。现场许多人神情肃穆，有人低头默祷，有人驻足沉思。在鲜花与纪念标语之间，人们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对生命的敬重与缅怀。

在随后举行的演讲环节中，多位嘉宾围绕历史记忆、公民社会、人权价值以及华人社区的责任等议题发表讲话。发言者们一致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保存历史记忆、尊重生命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始终具有重要意义。

活动现场，不仅有1989年事件的亲历者，也有许多年轻面孔。他们或许没有经历那个年代，但通过纪念馆的展览、现场的讲述以及一代代人的传承，开始认识那段历史，理解记忆的重要意义。

历史或许会随着时间渐渐远去，但只要还有人愿意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朱虞夫先生参加活动并与参会者合影

讲述、愿意倾听、愿意记录，记忆便不会消失。

纪念的意义不仅在于回望过去，更在于提醒未来。

离开纪念馆时，人们陆续散去，但那些关于勇气、良知与责任的话题，仍在人们心中回响。

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相信：

记忆可以穿越时间；

真相值得守护；

而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的精神，也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中继续前行。

勿忘“六四”，星火不灭！

（摄影：邢志远 林小龙）

编辑：韩立华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The June Spirit Lives On

On June 4, 2026, a coali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tic organizations held a memorial event at the June Fourth Memorial Museum in El Monte, California, commemorating the thirty-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Tiananmen crackdown. Participants gathered to honor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preserve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affirm the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ceremony included a moment of silence, musical performances, a public reading of the Tiananmen Mothers Statement, speeches by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and a flower-laying tribute. Visitors viewed historical photographs,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related to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while many younger attendees encountered this history through the museum exhibition for the first time.

A newly unveiled memorial mural became one of the event's highlights, using contrasting imagery to symbolize both historical suffering and the enduring hope for liberty. A reenactment of the iconic Tank Man scene also left a profound impression, reminding participants that the courage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continues to inspire people across generations.

Speakers emphasized that remembrance is more than mourning the past. It i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historical truth, defending human dignity, and passing memory to future generations. As the ceremony concluded, participants departed with a shared belief that the spirit of June Fourth endures, and that the pursuit of freedom,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remains a responsibility that transcends tim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 64 抗暴 37 周年有感

作者：侯改英



在中国民主党今天开展的64抗暴37周年法拉盛集会游行活动中，我作为中国民主党主席助理、党中层骨干及优秀青年代表和活动的副总指挥全程参与了活动，并上台发言。以下是我全程参与活动的一点感想。（节选自发言稿）

今天，我们站在这片自由包容的土地上，共同谴责中共暴政和纪念8964当年为自由民主献出生命的人们，我百感交集。同时我今天作为现场活动的副总指挥，看着台下党员义工们一起努力的成果——整齐肃穆的队伍和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党旗，我的内心既沉重，又充满了难以言喻的自豪。

首先，感谢大家的时间，更感谢其中的一些前辈和老面孔一如既往到场对六四活动的支持，你们数十年如一日对六四真相的坚守，如今，在场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我看来这种多年毫不懈怠并以此为己任的坚守就是六四精神的具象之一。这也是我今天的演讲题目——IT'SMYDUTY!（这是我的职责！）

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一个片段：37年前，在8964中共血洗天安门前的几小时，一个骑着自行车兴冲冲赶往广场的年轻人，在面对镜头时回答老外记者的提问，那就是明知军队已进场，他为什么还要去游行？那个年轻人对着镜头自豪的喊出一句响彻至今的话：“Itismy duty”——这是我的职责！

是的，这简单的四个字，就是我所理解的八九精神最纯粹的底色。

它包含了那个年代最优秀的年轻人公民意志的觉醒，也包含了北京市民对学运的正义支援和5月20对中共暴力大阻截的责任担当，这是那一代中国人在面对专制转型时，集体迸发出的最高尚的利他主义和公民精神雏形。

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我们的青年以文明、热血和普世价值素养的形象在与政府的对抗中以“国家主人”的纠错姿态践行了刘晓波先生“我没有敌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原则”。他们以形而上的精神抗争：绝食静坐、拉起条幅和竖起的自由女神像等方式表达对自由民主的诉求……面对这群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以文化人的体面表达政治主张时，中共管这叫“暴徒”？他们如此深爱这片土地，关心中国的未来和960万平方公里一草一木所有生灵的利益…他们用豆蔻年华的热血做出了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做最朴素也最坚定的承诺——Itismy duty!

那也是一个悲怆的年代，64血洗后，长安街上那个迎向钢铁巨兽的白衣孤影，定格成了20世纪人类反抗绝对暴政的终极图腾。它的背后，是以我们民族最优秀、最清醒的一代青年被彻底血洗为代价的。那场屠杀不仅绞杀了肉体，更斩断了文明的脊梁——它用最残酷的方式，为当代中国走向迷乱、盲从与软弱的国民性断层，写下了一个时代的血色注解。

所以不要再说中国人不勇敢，因为三十七年前的那场春夏之交，早已给出了答案；不要再跟风所谓的“民族劣根论”，因为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早已洗刷了耻辱；更不要说中国不配拥有民主，因为八九六四那流淌的鲜血，就是最神圣的入场券！回望历史，纵然是严谨如德国人民，也曾举国陷入纳粹的疯狂；聪慧如犹太民族，也曾极权的铁蹄下经历血洗。面对绝对的暴政，任何民族都曾有过屈服与黑暗。但唯有中国人民，在1989年的北京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人类历史上反抗绝对暴政的丰碑，这一场血染的风采，不是奴隶的顺从，而是公民的诞生！

但是，在历史巨大的伤痕中，三十七年过去了，中共政权依然在延续，暴政暗影重重。在践行公民职责的道路上，当年的学运领袖也就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先生，从哪里结束从哪里开始，他将一生致力于延续六四的抗争至今。从建党第一天到距今30多年；从第一个党员到至今逾1000人的海外反共组织；从夜晚的星空到晨起的破晓，从纽约高温酷暑到暴雪封路，从第一场时代广场茉莉花街头抗议到第793场，从年富力强的青年到满头白发的老人，王军涛主席数十年对六四的执念，从不抛弃从不放弃。正如他曾在公开演讲说过，他不能让六四英烈死不瞑目、他必须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们一个交代。他点起了民主接力的火把，他说那是他的职责！

但回望坚持抗争这30多年的历程，不仅有火光，更有外界刀子般的质疑、冷眼与辱骂。有人站在功利主

义的高处冷嘲热讽：“三十七年了，年年纪念，有什么用？中共那么强大，你们现在又推翻不了它，简直是不自量力！”。有人用阴暗的奴化思维肆意构陷：“你们不过是在海外作秀、拿政庇的投机分子！”“你们活动不给钱？！甚至连有些我们拼命想要去唤醒的同胞，也会用麻木和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们，嫌我们“多管闲事”。

战友们，面对这些冷水与恶言，我们怎么可能不委屈？！我们也是肉身凡胎，在异国他乡要养家糊口、要陪伴家人、由生活的艰辛和疲惫。我们冒着国内亲人被骚扰的风险站在这里，换来的却是同胞的冷眼。这种委屈，常常化作深夜里难以言说的孤独。

但是，今天作为中国民主党人的一分子，我要在这里字字千钧地回答世界：我们民主党人上到王军涛主席，下到每一个参与活动建设普通党员，全部都是义工！我们自发自愿的对抗中共暴政，缅怀六四英烈，关心中国的未来，这是我们民主党人的职责，ITISOURDUTY!

中国民主党人所做的每一次努力，无论是发一个小小的推特，转发一个撕开中共画皮的新闻、在长城防火墙上戳洞，哪怕只是一米阳光向黑暗中传射而过，它对于黑暗中绝望的人、坚守的人、政治犯、维权人士、。。。等等人而言，它就是自由和民主的火种，中国民主党的每一次活动、每一次祭奠、每一次启蒙、每一次记录，都是在中共的“东德”极权围墙上日复一日、滴水穿石、清脆而坚定地敲击！只要敲击不停，裂缝就会蔓延；只要裂缝蔓延，那座看似不可战胜的高墙，终会在某一个历史的瞬间，轰然倒塌！

现在，我想对所有在场人士，尤其是中国民主党那些默默无私奉献的义工党员们说，三十七年后的今天，面对外界的冷嘲热讽，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世界万般选择，我们选择了负责，我们甘愿为了自身价值观抗起六四抗争的大旗，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请你们擦干眼泪、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在风雨中走自己不会后悔的路。

古人云，家国天下。请像对父母子女扛起我们的职责那样，扛起驱除中共救赎中国的责任吧。

“咽下所有的委屈，击碎所有的质疑，在极权的高墙上敲击到底，替国内无法发声的中国同胞呐喊，坚守到墙倒屋塌的那一天——Itisourduty!”（这是我们共同的职责！）谢谢大家！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Reflections on the 37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Fourth Resistance

This speech reflects on the auth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s commemoration of the thirty-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Fourth crackdown in Flushing, New York. Serving as assistant to the party chairman, a member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and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event, the author describes both the solemn atmosphere and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hared by volunteers who continue to preserve the memory of 1989.

The central theme is the phrase "It is my duty," inspired by a young participant in the 1989 movement who answered those words when asked why he was returning to Tiananmen Square despite the approaching military. The author presents this simple statement as the purest expression of civic responsibility, moral courage, and commitment to the public good. According to the speech, the students and citizens who demonstrated peacefully represented a generation determined to pursue freedom,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reform through nonviolent ac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vents of June Fourth left deep scars on Chinese society, yet also revealed the courage of ordinary people. The sacrifices made in 1989, the speech contends,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or dismissed, but recognized as evidence of a genuine desir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tic values.

The speech also highlights the continuing efforts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ove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Members organize commemorations, public demonstration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advocacy entirely as volunteers despite criticism, financial pressure, and concerns that relatives in China may experience official retaliation because of their participation abroad.

Responding to claims that these activities are meaningles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every public event, article, historical record, and act of remembrance helps preserve truth and strengthen public awareness. Each contribution is described as another strike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gradually weakening the barriers built by censorship and fear.

The address concludes by encouraging fellow activists to remain steadfast despite misunderstanding and hardship. Remembering June Fourth is presented not only as honoring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but also as accepting an enduring civic responsibility. The repeated declaration, "It is our duty," serves both as a tribute to the generation of 1989 and as a continuing call to pursue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historical truth through peaceful and persistent civic engagemen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6·12 雨伞不倒·并肩同行

——湾区举行“反送中”七周年纪念集会

记者：关永杰

【旧金山湾区讯】为纪念香港反修例/“反送中”运动七周年，由海外流散港人社群及多个民间团体发起的全球接力活动“6·12雨伞不倒·并肩同行”于2026年6月12日在全球多个城市同步举行。根据海外媒体《追光者》全球现场联动统计，活动至少获得全球20多个主要城市响应，包括英国伦敦、利兹、诺丁汉、雷丁、曼彻斯特、伯明翰，美国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圣地亚哥、亚利桑那凤凰城、夏威夷，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澳大利亚多个城市，以及新西兰的奥克兰、基督城、台湾台北等地接力举行纪念活动。

6月11日傍晚，由美国香港人会馆（USHongKongers Club）、北美香港会（NORCAL HK CLUB）、香港自由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党等联合发起的湾区纪念活动在旧金山举行。数十名湾区香港人、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及各界支持者到场参与。活动开始前，现场拉起“Free Hong Kong”、“Free Jimmy Lai（释放黎智英）”等横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迎风飘扬。活动由美国香港人会馆成员Bruce与Jenny共同主持。



Jenny在开场致辞中表示，过去七年间，大批异见人士身陷囹圄，许多声音被消灭，自由逐渐消失，无数香港人被迫流散海外。然而，她相信香港人并没有遗忘。她说：“七年过去，我们的家园已面目全非，时间不断向前，但伤口从未愈合，记忆也从未消失。”她感谢仍然愿意站出来的人们，用行动证明香港的故事仍被铭记。

开场致辞结束后，主持人带领全体参与者，向那些为争取自由而失去生命的人们默哀一分钟。

随后，全体与会者合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重温2019年香港街头争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记忆。



刘俊：香港曾是“六四”逃亡者的生命通道

“六四”学运领袖之一、经“黄雀行动”逃往香港后再流亡美国的刘俊律师回顾自己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经历。他表示，当年广州学生走上街头，是为了抗议中共以坦克和机关枪镇压无辜学生和市民，而非破坏社会秩序。刘俊特别感谢香港人在“六四”之后对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援助。他表示，自己被通缉后能够成功逃离中国，正是因为香港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大陆营救民主人士。他认为，中国争取民主自由、结束一党专政的现代民主运动真正始于1989年。而对于香港今日的处境，刘俊深感痛惜。他表示，37年过去，中国大陆仍未实现民主自由，而香港也已经失去原有的自由空间。他呼吁香港人、大陆民主人士、西藏人以及维吾尔人等各受压迫群体团结合作，共同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



方政：香港曾是“六四”受难者最大的精神慰藉

“六四”亲历者、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率领多位党员参加活动。方政表示，“反送中”运动中同样有人失去生命、失去自由，而香港长期以来对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支持令人难忘。他说，“六四”之后，支联会和维园烛光晚会给予无数“六四”受难者巨大的精神慰藉和希望。然而，2019年之后，香港自由空间急速萎缩，维园烛光晚会成为历史。他感慨地说，香港人在

2019年6月12日所展现的抗争精神，很可能是香港历史上最后一次百万人民能够自由表达诉求的时刻。方政认为，要让香港重新获得自由，最终必须结束中共专制统治。他最后带领全场高呼：“End CCP! Free Hong Kong!”



Ken: 镇压可以囚禁人民，却无法囚禁思想

北加州香港会负责人Ken在演讲中回顾了“反送中”运动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七年前香港人最初反对的似乎只是一项引渡条例修订，但后来事实证明，人们低估了这项法案背后的意义。“反送中”运动之后发生的，不仅是一场抗争的失败，而是香港整个制度、自由和多元价值的系统性瓦解。Ken列举《香港国安法》实施、《苹果日报》被迫停刊、香港47人案以及黎智英被重判等事件，指出香港原有的自由社会正被有计划地拆解。他进一步将香港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台湾民主化历程进行比较，指出，历史反复证明：专制政权可以暂时压制反对声音，却无法消灭追求自由的思想。他说：“中共花了七年时间试图让香港忘记自己是谁，但它没有成功。因为你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在世界各地香港人居住的城市里，烛光仍然燃烧，呼声依然响亮。故事仍在继续，最后一章远未到来。”



Cindy牧师：爱是否能够胜过恐惧

来自香港的Cindy牧师在发言中坦言，在当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许多人已经害怕谈论香港、害怕公开发声，因此当天能够看到这么多人站出来，让她十分感动。她表示，今天站在现场的人，不只是支持香港，更是在支持正义、真理与自由。长期从事流亡港人心理辅

导工作的她介绍，许多离开香港的年轻抗争者至今仍饱受创伤后压力综合征（PTSD）困扰，经常做噩梦，不敢出门，甚至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与家人断绝关系。她分享自己在精神健康机构和教会中的工作经历，表示自己能够做的或许有限，但仍希望尽己所能陪伴这些流亡者，协助他们接受心理咨询与治疗。活动现场，她特别准备了黄色玫瑰送给参与者，希望大家以此纪念2019年运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们。她说：“当你们拿起这朵黄玫瑰，请记住正义的精神、真实的精神，以及无畏抗争的精神。”



易碎君：保存真相，守护火种

流亡美国四年的香港青年梁启骏（网名“易碎君”）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回忆，2022年香港国安人员搜查其住所，没收电子设备，并要求交出密码，甚至劝说他“改邪归正”。在不断加剧的政治压力下，他最终决定离开香港。梁启骏2022年踏足美国的时候，只有15岁，他坦言，争取公义需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许多人难以想象其中的痛苦、漫长、煎熬。然而，他相信只要团结一致，坚持保存真相、守护火种，未来仍然有希望。他说：“只要我们把真相保存下来，把火种保存下来，星星之火终将可以燎原。”

撑起雨伞 重现2019抗争记忆

活动最后，全体与会者合唱《愿荣光归香港》。随后，参与者高举示威标语和撑起黄雨伞，共同重现2019年香港街头抗争的经典画面。

“雨伞不倒，并肩同行”，参与者表示，无论身在何方，都不会忘记香港人为自由付出的牺牲，也将继续传承“反送中”运动所代表的民主、公义与抗争精神。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铁汉不回头，真相待昭雪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纪念李旺阳遇害十四周年

记者：沈美花



2026年6月13日下午，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及社区民众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悼念六四铁汉李旺阳，向中共追究死亡真相”纪念活动，以此缅怀这位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终身、最终含冤离世的民运先驱。

活动由中国民主人士联盟美西支部发起组织。下午两点，多位民运人士手持横幅和标语，在中领馆门前集会。现场悬挂着写有“六四铁汉李旺阳被害十四周年”“铁汉也不回头”等标语的纪念展板。在集会过程中，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资深民主运动人士朱虞夫先生首先发表讲话。他回顾了李旺阳先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历经磨难的一生，高度赞扬其宁折不弯的精神品格，并指出李旺阳之死至今真相未明，是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重要见证。在朱虞夫先生的带领下多位民主人士先后登台发言，他们严厉谴责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行一党专政，对异议人士进行政治迫害，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系统性压制，要求当局公开李旺阳死亡真相，追究相关责任。参与者通过演讲等方式，表达对李旺阳的缅怀与敬意。



李旺阳出生于1950年，是湖南邵阳著名民主运动人士。自20世纪80年代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以来，因坚持争取自由、民主和工人权益，多次遭到中共当局逮捕和监禁。漫长的牢狱生活使其双目失明、听力严重受损、身体遭受不可逆转的伤害。

然而，即使在最严酷的打压下，李旺阳依然拒绝低

头。

2012年“六四”纪念日前后，李旺阳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绝不后悔当年参与民主运动，并将继续坚持民主理想。仅数日之后，他被发现离奇死亡。官方迅速宣布其为“自缢身亡”，但由于现场情况与官方结论存在明显矛盾，引发海内外舆论强烈质疑。至今，中共当局始终未对外界提出的关键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发言最后，与会者共同呼喊口号，包括“还原真相”“打倒中共”“推翻中共政权”“还人民民主与自由”等，以表达持续关注此事件的立场与诉求。

此次纪念活动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举行，虽然规模有限，但在海外华人社区中仍引发一定关注。组织者表示，未来仍将继续通过纪念、传播与公共讨论等方式，推动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与反思，并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人权议题。

编辑：赵杰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The Iron Man Never Turned Back: Seeking Justice Fourteen Years After Li Wangyang's Death

On June 13, 2026, activists gath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to commemorate the fourteenth anniversary of Li Wangyang's death. Participants honored his lifelong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questioned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his death, called for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demanded accountability, and urged continu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human right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China.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华盛顿 DC 纪念六四 37 周年

— 国会、听证会与烛光悼念接力举行

记者：关永杰

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37周年到临之际，全球各地、各族裔、各组织用各种形式来缅怀所有那些以和平方式争取自由、问责制度和反对腐败的人们。记者于6月4日在华盛顿DC参与了三场纪念活动：

活动一、国会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由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领衔，该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担任主持，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一同出席。列席嘉宾中有三位都是当年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分别是“对话中国”智库负责人王丹先生，“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先生及前美国陆军退役随军牧师熊焱；其他嘉宾还有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女士；黎智英先生的女儿黎采等。



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自由与民主的立国精神不仅塑造了美国，也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而37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使天安门成为屠杀无辜自由民众的代名词。两党议员都认为，中共“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后经香港“黄雀行动”救援到达美国，现为加州湾区律师的刘俊，近年来由于其本人和女儿在美国本土遭遇中共特工的跟踪与跨国骚扰，成为

中共跨国镇压的典型受害者之一，他在发布会中现身说法并接受媒体采访，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敦促公众铭记这场运动，并呼吁人们“不要忘记那些因当年参与民主抗争至今仍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们”。



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举起天安门事件中的经典图片“坦克人”，并说道：“今天，我们要缅怀‘坦克人’，是因为他身上体现的品质，以及在那场抗议和屠杀中，所有参与者身上体现的品质，为什么？因为今天在中国，还有很多人遭受持续的压迫。我指的是藏人，我指的是香港人，我指的是维吾尔人，我指的是所有异见人士，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我们不会忘记‘坦克人’一样。”



当他把图片反过来显示空白一面的时候，他借此动作直指中国当下的审查制度与人权现状（封锁信息及掩盖真相）。



黎智英先生的女儿黎采现身发布会现场（右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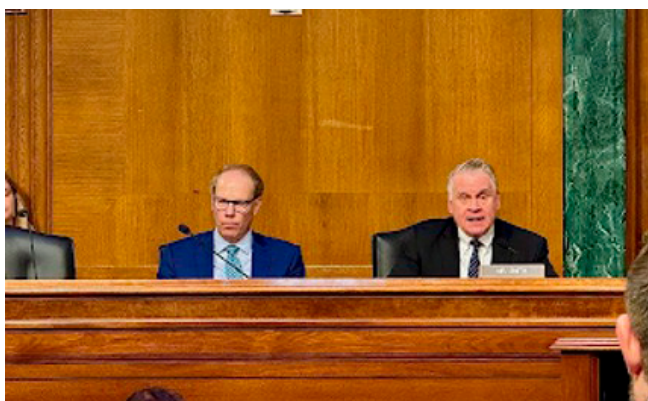


魏京生基金会赠送给记者的“纪念六四大屠杀 37 周年”T 恤

分别从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地赶来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成员，在现场拉起横幅，抗议中国对对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的“跨国镇压”。



活动二、国会议员办公楼——《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人的威胁：跨国镇压与州级层面的回应》听证会此场是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 2026 年 6 月 4 日下午 1:30（美东时间）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的官方听证会。主持人是克里斯·史密斯（美国联邦众议员，新泽西州共和党籍，现任 共同主席）。台上委员还有：丹·沙利文（现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同时也是 的现任主席）；詹姆斯·麦戈文（美国联邦众议员，现任资深议员）。



作为此场听证会的委员，克里斯·史密斯及丹·沙利文在开场陈词中极力谴责中共当局通过实体暴力、数码骚扰以及恐吓家属等跨国压迫工具，试图在美利坚领土上孤立和恐吓异见人士的行为，强调这不仅是人权问题，更是对美国国家主权的直接挑衅，并呼吁联邦必须加强与各州地方政府的执法协作。

詹姆斯·麦戈文众议员作为民主党在委员会中的首席代表，同样在台上的主位发表了讲话，他指出针对不同政见者的“长臂管辖”是无法被美国社会容忍的，他强烈



呼吁国会应当加速推进两党联合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案》，全面赋能美国国务院和执法部门，用更严厉的法律手段对那些在美国领土上跟踪、骚扰或恐吓居民的外国代理人进行反制。



台下证人席分别作证：

1、斯蒂芬·J·考克斯（Stephen J. Cox），他是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法律顾问，前美国联邦检察官。他强调美国各州政府和地方当局在应对中共长臂管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此类地缘政治冲突已经延伸到了地方的基础设施、新技术以及消费者保护等日常前线领域，州政府必须强化跨部门合作来保护本地居民和供应链安全。

2、埃利奥特·博斯塔（Eliot Bostar），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州参议员。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不仅局限于华盛顿特区，而是对美国“每一个州和每一个社区”都构成了直接威胁，他呼吁从州级立法层面采取反制措施，以防范地方商业、高校和公共官员受到中方的胁迫和渗透。

3、刘俊（Arthur Liu），太平洋法律机构负责人/律师，八九学运领袖之一。他作为跨国镇压的直接受害者家属（注：其女儿为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刘美贤 Alysia Liu，此前曾遭涉嫌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人员跟踪和间谍监视），刘俊律师以自身经历作证，揭露了中方长臂管辖对在美国领土上的法律居民、异见人士及其家属进行恐吓、跟踪和滋扰的恶劣手段，并呼吁联邦与地方执法部门提供更实质性的保护。

4、郭凤仪（Anna Kwok），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会董事、前任执行总监。她讲述了香港活动人士在海外正面临着严峻人身安全威胁与“长臂管辖”。她特别提到由于自己在海外的公开倡议，留在香港的亲人（如其父亲）遭到港府的针对、拘留和连带审判惩罚。她揭露了

中方利用实体攻击、数字骚扰以及株连国内家属等“全球胁迫工具”来迫使海外异见者噤声的策略。



获邀出席此场听证会的民运团体——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其主席金秀红向委员提交了一份报告，据金主席介绍，报告中包含她及其组织成员遭遇中共跨国镇压的一些材料。



活动三、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雕像——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7周年烛光悼念活动 2026年6月4日傍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华盛顿特区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雕像前举行了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7周年烛光悼念活动。悼念活动还未开始，但民主女神雕像前已经摆放着祭奠的鲜花，还有几幅当年大屠杀的遇难者照片。



主席埃里克·帕特森向香港民主人士许颖婷颁发了“2026年异议人士人权奖”，表彰其抗争精神。许颖婷在发言中表示，“勇气并不是没有恐惧，它是在恐惧存在时选择承担责任。”尽管香港维园烛光被熄灭，但抗争精神已薪火相传，她将奖项献给被囚禁的香港政治犯（如邹幸彤、李卓人、黎智英等）、当年的天安门学生和过百万为自由而游行的香港人。



刘俊律师带领在场参与者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他在发言中感谢当年香港人的帮助，并呼吁中共释放所有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治犯。



香港海外民主活动人士邵岚作为国际特赦组织香港海外分会发言人发表了讲话。她表示，维园是自由的灯塔，在过去数十年里，香港曾是中国领土上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这些维园的蜡烛当年不仅是为了悼念1989年在北京牺牲的六四平民与学生，也是为了香港自身的自由而点燃。而每年的六四晚会本身就是一种对“我们是谁”的身份宣示，“我们依然记得那些政权想要强行抹去和篡改的历史真相。”由于目前香港本地已不具备讲出真话的空间，海外港人和社运人士如今承担起在国际舞台上传递六四火炬的责任。我们应共同展现与独裁对抗的坚定韧性，她借由华盛顿的烛光表明，香港人、中国内地异见人士、西藏人和维吾尔人等群体，在对抗压迫和极权主义的道路上将持续站在一起、共同抗争。



陶智，曾长期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与高级法律顾问，现任中国政策高级主任是美政府内部最积极推动遏制（跨国镇压）的官员之一，他在发言中表示，中共禁绝纪念六四，“正如《1984》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杨杰凯，他批评对华绥靖政策，控诉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呼吁各界与仍在抗争的信仰人士及维吾尔人、藏人等站在一起。



新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伊利夏提表示，对中共将迫害常态化，我们必须反对，对北京天安门屠杀的纪念，就是拒绝遗忘，因为遗忘会助长更多的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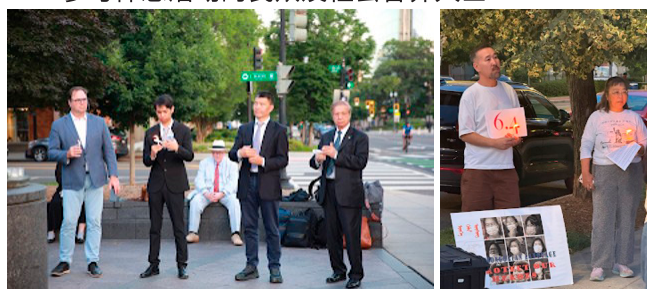
西藏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共对西藏的镇压，至今仍在发生。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女士发言，她强调今天大家齐聚在雕像下，“是为了重燃希望，推翻中共”。她指出，现在可以看到中国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甚至军队里的人都已经逐渐醒悟过来，她乐观地展望，“中国的希望就在前方，民主自由的曙光就在我们面前”。



参与悼念活动的民众及社会各界人士



愿点点烛光化身黑夜的星辰，在每个人的心中延续，永不熄灭。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旧金山纪念六四 37 周年系列活动

— 清洗民主女神像暨六四图片展

记者：关永杰



清洗旧金山华埠花园角广场的民主女神像，是美国加州湾区每年纪念六四的一项标志性传统活动。5月24日，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华语青年挺藏会、美国香港人会馆等多个海外民运与人权团体联合发起，各界人士再次齐聚旧金山唐人街花园角广场（Portsmouth Square），为铜锈斑驳的女神像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从而拉开湾区整个六四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的序幕。

这座高约10英尺的民主女神青铜雕像，于1994年六四事件5周年时正式落成，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被坦克推倒的民主女神像原形的化身，它也是全球第一座在公共土地上永久竖立的民主女神复制像。

六四事件亲历者、本次活动召集人之一方政表示，清洗雕像象征着“洗去历史的尘埃，拂去对真理的掩盖”；通过亲手擦拭，人们在海外延续着对真相的守望、对极权历史的拒绝遗忘，以及更坚定对中国未来实现自由民主的信念。



同时举行的还有“六四”事件图片展，吸引众多旧金山市民及游客驻足观看，图片展的目的在于让世人重新认识和了解这段被中国共产党极力掩盖的历史



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先生现场发言：六四要纪念的，不只是死难者，更是中国人曾经为民主、自由、不惜牺牲的精神。

1989年，数百万中国人在三百多个城市和平抗议，却遭中共以坦克、机枪镇压，至今死难人数仍不明。

尽管中共长期封锁与打压，但仍有无数人持续纪念六四。无论是“坦克人”、民主女神像，还是后来白纸运动中的年轻人，都说明追求自由与正义的精神从未消失。六四已经不仅属于中国，也成为世界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重要象征。



本次活动的另一主题是“每人一美金，援助良心犯”，为刚刑满出狱的徐光先生捐款。旧金山地区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李海风负责，所得款项将转交给朱虞夫先生，然后再统一送到徐光先生手中。

徐光（1968年9月11日出生，浙江省富阳市人）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异见人士、八九学运领袖，以及“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核心创办人之一。他因为长期在中国大陆公开坚持民主宪政理念并参与政治抗争，曾多次被捕入狱，累计服刑时间已超过9年。他已于2026年5月19日凌晨刑满出狱。据海外中国民主党同仁及多位杭州异议人士透露，徐光在长达4年的羁押与服刑期间，为了抗议当局的构陷，长期处于绝食抗争状态，后半程主要依靠监狱方面进行强制鼻饲维持生命。这导致他出狱时身体状况极度糟糕、骨瘦如柴（体重一度降至80多斤），出狱当天是由几个人用担架将其抬回杭州市西湖区的外东山弄家中。出狱后，徐光通过海外友人表达了谢意，并再度发表感言，呼吁外界“勿忘六四”。

重申今年纪念活动的口号：勿忘六四，审判中共，还我民主！

勿忘六四 砥砺前行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参与纪念六四三十七周年活动纪实

《在野党》特约记者：繆青（旧金山报道）

美西时间2026年6月3日19时，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人道中国、北加州香港会、美国香港人会馆、旧金山致公总堂、擦星星事务所、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等多个民主团体联合举办的“勿忘六四，砥砺前行——纪念六四三十七周年暨抗议中共天安门大屠杀”活动，在美国旧金山中国领事馆门前举行。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西藏及美国社会各界的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和社区代表齐聚一堂，以公开集会、演讲、献花、点燃烛光等方式，悼念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死难者，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转型进程。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协办单位，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积极参与组织和筹备工作，与社会各界共同表达对六四英灵的追思，以及对中共民主未来的坚定信念。

活动开始前，全体与会者共同合唱《历史的伤口》。熟悉的旋律将人们带回那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年代。主持人周云龙与Jeny随后宣布活动正式开始。



现场主持旧金山党部组织部部长周云龙和美国香港人会馆施臻莹 (Jeny)

主持人在开场致辞中指出，三十七年前，无数中国青年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和反腐败走上街头，却遭到中共政权的血腥镇压。时至今日，中共仍在掩盖历史真相，压制言论自由。然而，历史记忆不会因封锁而消失，民主追求不会因镇压而终结。



六四幸存者、天安门屠杀受害者方政

六四幸存者方政先生发表了开场演讲，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方政在三十七年前因抢救学生而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如今的他依然活跃在民主运动第一线。他表示，中共持续封锁六四历史，不仅是对死难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整个民族记忆的伤害。

方政强调，中共最害怕的是真相，因为真相能够唤醒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只要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说出真话，改变就终将发生。

方政的讲话赢得现场热烈掌声。随后，全体与会者肃立默哀一分钟悼念所有六四死难者。

活动期间，多位来自国际社会及不同族群的人权代表发表讲话。

国际特赦组织代表加芙丽拉·威尔兹指出，中国大陆及香港的人权状况近年来持续恶化，大量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及民主活动人士遭受打压。她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支持所有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人们。



西藏之友组织的乔瓦尼·瓦萨洛

湾区西藏之友组织主席乔瓦尼·瓦萨洛表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关系汉族民众的未来，也关系包括藏族、维吾尔族等各民族的人权与自由。



旧金山致公总堂盟长赵炳贤

旧金山致公总堂盟长赵炳贤则表示，自由与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任何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政权都无法长期违背历史发展规律。



北加州香港会的 Ken Chan

来自北加州香港会的Ken Chan回顾了香港维园烛光晚会的历史。他表示，过去三十多年间，香港是全球华人纪念六四的重要阵地。然而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大规模公开纪念活动被迫停止，香港民主人士遭到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压。

活动中还宣读了香港民主人士邹幸彤的狱中来信。

这位因坚持纪念六四而身陷囹圄的民主活动家，在信中写道：“守护六四的记忆，其实也就是在守护同一条人性的底线。”她呼吁人们继续记录历史、传播真相、拒绝遗忘。

现场许多与会者听后深受感动。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出现了许多年轻人的身影。



擦星星事务所代表包卓轩以及华语青年挺藏会代表段姜（Ginger Duan）分别发表演讲。他们表示，虽然六四发生时自己尚未出生，但了解历史真相后，深感自己有责任将记忆继续传承下去。

青年世代的积极参与，成为当天活动的重要亮点，也让许多老一辈民主人士看到了希望。



旧金山党部活动部副部长李小林

记者现场采访了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多位干部。

党部活动部副部长李小林表示，三十七年前的学生和市民曾经真诚地相信，中国可以变得更加自由、公正和开放。他们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却遭到军队和坦克的镇压。



旧金山党部副秘书长张小驹悼念现场

民主党湾区党部副秘书长张小驹则从香港问题切入。他指出，香港支联会数十年来坚持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使香港成为全球华人纪念六四的重要象征。然而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支联会被迫解散，李卓人、邹幸彤等民主人士被关押，自由与法治受到严重侵蚀。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网络技术部副部长庄帆则从信息自由的角度发表讲话。他表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在突破信息封锁，使越来越多中国民众能够接触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作为技术工作者，他认为维护历史记忆、促进信息自由流通，是推动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途径。



旧金山党部网络技术部副部长庄帆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文宣部部长缪青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文宣部部长缪青表示，纪念六四不仅是追思历史，更是守护真相与良知。

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记忆，就无法拥有未来。纪念六四，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曾经有人为了自由与民主付出生命代价。历史可以被掩盖一时，却无法被永远抹去。”

随着夜幕降临，活动进入最后阶段。

主办方播放了“天安门母亲”录音。录音中饱含失去亲人的悲痛与对真相的坚持。

随后，与会者依次向民主女神像献花并点燃蜡烛。

一支支烛光在夜色中缓缓亮起，汇聚成温暖而坚定的光芒。

人们高呼：“勿忘六四！”“血债血偿！”“推翻暴政！”“中共必亡！”

这些口号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的上空久久回荡。

三十七年过去了，中共依然试图抹去那段历史；然

而三十七年过去了，仍然有人在世界各地坚持讲述六四的故事。

对于中国民主党以及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而言，六四不仅是一段历史记忆，更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责任。

当真相仍被掩盖，当良知仍遭压制，纪念便不会停止。

正如活动主题所表达的那样：

勿忘六四，砥砺前行。

因为唯有记住历史，才能走向未来；唯有坚持真相，才能迎来自由中国的曙光。

摄影：缪青 庄帆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Never Forget June Fourth, Continue the Journey: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San Francisco Chapter Commemorates the 37th Anniversary of June Fourth

On June 3, 2026, democratic organizations gath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to commemorate the thirty-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Tiananmen crackdown.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San Francisco Chapter and partner organizations, the event brought together activists, survivors,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and supporter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Tibet,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ipants honored the victims through speeches, songs, moments of silence, flower tributes, candlelight remembrance, and public appeals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historical truth.

June Fourth survivor Fang Zheng recounte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fter losing both legs during the military crackdown and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historical memory despite continued censorship. Representatives from Amnesty International, Tibetan organizations, Hong Kong community groups, and other civic associations also spoke, emphasizing freedom,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 prison letter written by Hong Kong activist Chow Hang Tung encouraged participants to continue recording history and resisting collective forgetting.

Younger speakers expressed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preserve the legacy of 1989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s the ceremony concluded, participants laid flowers before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statue, lit candles, and renewed their commitment to remembering June Fourth and supporting the peaceful pursuit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historical truth in China.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维园烛光为什么让中共害怕？

——从香港支联会谈六四记忆的传承

作者：《在野党》编辑部副主编 陆乾坤



如果要问，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哪个华人民主团体最具象征意义，我想香港支联会一定名列其中。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已经很难理解，一个民间组织为什么会让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掌握庞大国家机器的执政党如此紧张。毕竟香港支联会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财富，更没有推翻政权的能力。它做的事情看起来甚至十分简单：每年六月四日举办烛光晚会，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组织，却在三十多年间始终被北京视为眼中钉。直到2021年，支联会被迫解散，多位负责人被捕入狱，维园烛光晚会也成为历史。

为什么？

因为支联会守护的，从来不仅仅是一场纪念活动，而是一段中共最不愿意被人记住的历史。

1989年春天，北京爆发学生民主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市民走上街头，要求反腐败、争取民主与自由。彼时的香港尚未回归，但香港社会对这场运动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从普通市民到知识界、工商界，许多人都相信中国正站在历史转折点上。

1989年5月21日，在全港声援北京学生的浪潮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正式成立，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香港支联会”。成立之初，它的使命是支援北京学生运动；六四镇压之后，它承担起了另一项更加艰难的责任——保存历史记忆。

对于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六四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道分水岭。

在六四之前，很多人相信共产党能够改革；在六四之后，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一个政权最大的恐惧并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外部压力，而是人民要求自由。

枪声响起之后，中国大陆迅速进入漫长的沉默时期。关于六四的报道被删除，书籍被查禁，相关讨论被视为禁区。随着时间流逝，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不知道六四真相的环境中成长。对于中共来说，这种遗忘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只要没有人记得，历史就仿佛没有发生过；只要没有人追问，责任就不需要被追究。

然而，香港支联会偏偏不肯让这段历史被埋葬。

1990年6月4日，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了第一次六四烛光晚会。超过十五万人参加活动。从那以后，每年六月四日的维园，都成为华人世界最特殊的地方之一。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变化，总有人来到这里，点燃蜡烛，悼念死难者。

三十多年里，维园的烛光已经超越了一场纪念活动的意义。

对于大陆人而言，它是了解六四真相的重要窗口；对于香港人而言，它是公民社会精神的象征；对于中共而言，它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提醒——1989年发生过什么，世界并没有忘记。

许多人认为，中共最害怕的是反对派组织。我却认为，中共真正害怕的是记忆。

因为专制政权最大的力量来自遗忘。





一个组织可以被取缔，一篇文章可以被删除，一个异议人士可以被监禁，但如果人们始终记得历史，谎言就无法完全取代真相。支联会三十多年坚持举办烛光晚会，本质上是在与遗忘对抗。

事实上，支联会从来不仅仅是一场纪念活动的主办者。它长期坚持自己的政治诉求，包括平反六四、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以及建设民主中国等目标。对于一个存在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民间组织而言，这种坚持本身就具有特殊意义。

支联会的发展历程，也映照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历程。

从司徒华到李卓人，从何俊仁到邹幸彤，几代支联会成员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司徒华被视为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象征；李卓人长期关注中国劳工与人权议题；而年轻一代的邹幸彤，则在组织最困难的时候选择继续公开纪念六四，并因此遭到起诉和监禁。

如果说维园烛光是一种精神，那么这些人就是这份精神的守护者。

2020年以后，香港局势发生剧烈变化。《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维园烛光晚会被禁止，六四纪念馆被关闭，支联会骨干成员陆续被捕。2021年9月，成立三十二年的香港支联会正式宣布解散。那个曾经组织过全球最大规模六四纪念活动的团体，从法律意义上走入



历史。

很多人将此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

曾经照亮维园夜空的万千烛光不再出现；曾经公开讨论六四的空间不断缩小；曾经活跃的香港公民社会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讽刺。

支联会之所以会被如此严厉地打压，恰恰证明它所守护的东西仍然具有力量。如果六四已经被彻底遗忘，如果历史已经失去影响力，那么支联会根本不会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正因为记忆仍然存在，真相仍然具有穿透力，所以才需要动用国家机器来压制它。

今天，当我们回顾香港支联会三十二年的历史时，会发现它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告诉人们：历史可以被掩盖，却无法被彻底抹去；真相可以被压制，却不会永远沉默；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面对未来的能力。

维园的烛光或许已经熄灭，支联会也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那些曾经举起蜡烛的人，那些坚持三十多年不愿遗忘的人，那些不断向世界讲述六四真相的人，终究会被历史记住。

因为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个组织。

而是一段民族共同的记忆。

而只要还有人记得1989年6月4日发生过什么，香港支联会就不会真正消失。

编辑：张娜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政治民主

第三章 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第四期）

作者：祝正明

三、言论自由的意义

人类的行为方式并无固定的模式可世代通用，任何人想把一种固定的模式作为人类千年通用的准则都是枉费心机，其作用反而是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反对、批评的意见与建议，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然动力。保护言论对政治思想、政府结构、政府官员进行反对或批评的自由，目的并不是出于对批评者个人的关心，更非是赞同他们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言论能及时地使社会发现自己的缺陷，使社会明白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反对、批评的言论，较之拥护的言论，更能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

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反对的言论也许并不动听、并不在理，但是，让它们有发表的机会仍然是必要的。只有保护了这些言论，才能集思广益，使各种有关政治理论和政治结构的问题、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能够接受严格的检验，使存在的缺陷充分暴露，也才能使那些最能经得起论战考验，最合理，拥有最多支持者的见解与论点来主导社会的各项事务。最终使全体公民的利益得到最好的维护。

一个社会，就算其宪法、法律、社会结构、政策已经到了很完美的程度，仍然应该让反对者与拥护者有均等的机会表达意见。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对之进行评论，正可以使已有的优点更深入人心，获得更多的支持，人们更自发地拥护，也正是最好的加强巩固它们自己的机会。

在一个公共场所，对于一个宣讲革命的人，没有人肯定周围的群众会作出何种反应。人们可能报以掌声，也可能把他轰下台，或置之不理，嗤之以鼻。宣讲者可能是位煽动家，但群众不可能是一煽就动的暴民。即便是鼓吹推翻一个合理合法的政府，只要他还没有动手侵犯别人的利益，就应该容忍他发表言论，不要去打扰他，允许他象路标一样站在那里，借此也可以表明我们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能在种种错误的导向牌面前经受得住考验，没有误入歧途。

批评的自由，发表反对言论的自由，无论多么不受欢迎，在民主制度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民主是民众的意志参与决策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必然依赖于民众的各种主张能够自由地提出并进行自由地讨论。执政党压

制批评意见和反对意见的行为，无论有多少理由，都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

如果说出版一本书就会导致信仰的破灭和政府的垮台，那么，这样的信仰就应该破灭，政府就应该垮台。它之所以会垮台，正说明了它信仰的伪善、结构的缺陷和制度的腐朽已经使它不堪一击，而并非单单是一本书造成。事实上，一个愚昧无知、专横贪婪的政府官员，比一个仗义执言的作家，更能使政府威信扫地，更能对政府的垮台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民主是民众参与全社会治理的过程。而人的正确判断依赖于获得充分的、准确的信息。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民众就不可能了解有关的背景知识，不知道存在的问题，不晓得有哪些可能的选择。民意也就很难显得明智，很难使决策达到最优化。公民有权知道自己生活的社会的情况，有权了解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公民神圣的知情权利，任何人均无权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

现代文明是对话的文明，这意味着各种意见应能够进行自由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便于将各种思想观点加以对比，共同改进。因此，言论自由包括在思想和著作方面犯错误的自由。社会必须珍惜这种自由，这种看上去无用的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在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办报、出书以后，任何人的观点都能够在自由的新闻出版媒体上发表出来，乏味的说教报道很快就会从传播媒体上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大量事实性、评论性和观感性的报道，从而能极大地增强新闻媒体的信息量、可信度、趣味性和观赏性，增加民众对新闻媒体的阅读量和收视率、对社会问题的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程度，缩小民众与政治的距离，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会同步增加，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准，改变社会的风气都会带来明显的好处。

四、鼓吹与煽动

鼓吹是言论的一种形式，大鸣大放的辩论与鼓吹是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鼓吹任何东西。一切党派，不论其观点如何偏激，都有同样的权利去鼓吹任何东西。口头

鼓吹如此，文字鼓吹也一样。

煽动是鼓吹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每一种主张都是一种鼓吹，每一种鼓吹都是一种煽动。它们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相信。煽动、鼓吹、挑动，在民主国家中，决不能被视为非法，它们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人人都有自由地煽动、鼓吹的权利，不论什么都可以，包括鼓吹暴力革命。只要没有以暴力违法，口头攻击现行的法律亦不违法。

在民主社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鼓吹任何主义。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在专制制度下曾被封为禁书的书籍，都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地印刷、发行、出售、阅读、研究。这样做，并不等于就是社会赞同了作者的观点，也不是为了保护出版者的利益，其目的在于使各种赞成、反对当代社会制度的人的一切观点，都能让公众了解到，让民众自行判断正确与否，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公民神圣的选择权利。

当然，民众也有暂时被愚弄而误入歧途的可能。但是，民众有能力很快察觉和纠正。对付这种愚弄的有效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一个能干的煽动家会发现，要煽动群众在短时期内相信他并从事某种行为是有可能做到的事，但要让群众长期维持在这一状态中则绝无可能。因此，完全不用担心存在这种误导的可能性，民众有能力发现其问题，人类理智的判断力是邪恶所无法战胜的。

大吵大闹，粗野放肆的辩论与攻击是民主政治的特色。那些经常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政治家必须对此有所心理准备，必须具备相应的忍耐力，容忍别人直接反对自己的观念，并把支持自己观点的人从自己的阵营中拉走。民主之所以奇特，在于它要求有权力的一方具有和反对派共处的意向，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和讨论问题，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把权力交给对方。

没有在剧场禁止叫失火的法律，因为，如果真的失火，众人还要感谢他，如果没有失火，受到惊扰的众人随后自然会惩罚他。因此，用不着制定法律禁止人们在剧场叫失火，只要有惩罚造谣与诽谤行为的法律就足够了。

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控制取消后，短期内，也许所有刊物上最初都会充满鼓吹、煽动，但是，由于这些报道的目的各不相同，它们的作用会相互抵消，短时期以后，民众会逐渐习惯，产生应有的分析辨别能力。在这种环境中，个别人的某一种言论，即便其再奇特，也不可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一种新奇的言论一出笼，

立即就会遭到各方面的抨击，如果其没有坚实的基础，很快就会在诸多抨击的重压下溃败。只有那些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引起大多数人共鸣的言论才能够逐渐脱颖而出，变成一种社会性意志，推动社会进行改良。

五、诽谤与中伤

对于一个有尊严的公民来说，身外之物再也没有比清白的名誉更有价值的了。言论自由应受到保护，人的名声同样应受到保护。保护言论自由，并不等于就是保护以言论蓄意伤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如果言论自由可以变成诽谤与诬陷的自由，社会舆论就很难变得明智。民主制度下，社会允许任何人自由地发表任何言论，但必须对自己言论的内容与后果负责。这就是言论的事后负责制。

拥有了权利，也必须承担行使这种权利所附带的责任。言论自由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必须以法律来明确规定，这就是《新闻出版法》与《诽谤法》。它们的作用就是既要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又要保护公民名誉不受无礼侵犯的权利，解决这两种权利冲突时的争端。

通常，恶意的言论对公民利益的侵犯可以分为四类：

1. 打扰公民的隐居或安静的生活方式。
2. 未经授权，公开泄露私人不宜公开的事实。
3. 公开那些在公民心目中对公民产生错误看法的材料。
4. 为了得到好处和利益而盗用他人姓名和肖像。

新闻出版界的根本任务是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以哗众取宠，招摇撞骗。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责任感。对于用造谣、诽谤手段侵犯他人利益、诬陷他人清白的责任人，社会必须以法律进行限制和制裁。一般认为，构成诽谤罪有以下要素：

1. 动机 — 怀有恶意，故意损坏他人名誉和人格。
2. 手段 — 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凭空制造虚假事实，强加于他人，并以众人能够看到或听到的方式散发出去，中伤他人。
3. 有明确的对象 — 针对具体的人。
4. 表现形式 — 语言、文字等。

必须认识到，对杰出人物进行忘恩负义的诽谤的恶劣行径，对社会的政治稳定也是一种威胁，那些有能力，有影响力，肩负重任的人，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作出任何反应都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诽谤面前，他们可能会消耗大量的精力而穷于应付，也有可能急流勇退，拒绝为公众服务，或进行的有力回击，产生专断行为。

言论自由不是诽谤自由。社会需要言论出版自由，但不能庇护造谣、中伤、诽谤者。社会的法律必须保证，任何人，只要受到不正当的伤害，都可以随时依法向法院起诉，让诽谤者在法庭上露面，接受陪审团和法官的审判，只要控告成立，责任人就必须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承担民事责任，使其在经济上、名誉上加倍损失，自食其果。

有时，故意发表某些内容真实，但又不宜公开的材料，也可造成恶意的伤害。因此，故意伤害别人的公开言论，并不能仅仅因为内容真实即可摆脱对诽谤的诉讼。只要是出自不纯正的动机，对他人做出不正当的伤害的责任人，都应承担法律责任。

六、传播媒体的责任

现代社会传播媒体已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承担着向社会提供信息的双重任务，但是，电视、广播节目往往由少数人制作产生，报纸、杂志、书籍的稿件也绝大部分出自个人之手，因此，新闻报道与出版发行的内容极易受个人好恶的影响，受党派利益的左右。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限制解除以后，新闻媒体将会首先成为各党派团体进行论战、攻击的工具。

偏袒是新闻媒体最易出现的问题，是影响新闻客观公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编写新闻报道时，从业人员有根据个人的好恶来选择材料的倾向，从而影响公众对全部的事实真相的了解，甚至会使公众产生错觉，损害公众利益。

民主社会在建立初期要注意的是，应尽量避免新闻媒体因失去约束而变得不负责任。否则，传播媒体有可能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但在向民众提供真实充分的信息方面，却没有完成任务。

个人好恶人皆有之，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有客观公正地向公众提供全面事实材料的义务，不作删减，不添加自己的见解，没有多余的赞扬、推荐、指责、嘲笑。而反映某些人观点的评论性文章应与事实报道分题另列，不应与事实报道混融一体。

言论自由是社会的治病良药，诽谤与诬陷却是它的副作用。社会为了能够享用出版自由带来的好处，必须忍受它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酸痛。新闻出版是一种事后责任制，当诽谤罪名成立时，伤害已经造成，而且往往不可愈合。要让诽谤者受到惩罚，受害者还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进行法律诉讼，损耗精力、财力，这是不公平的。但是，社会又不能为了避免这种对少数人的伤害而

取消言论自由。减少这种副作用的主要办法就是要求新闻出版界加强社会责任感，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实行自律，自己加强对自身言行的约束，做到在各种情况下，都不应该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对别人的人格进行恶意攻击。

在任何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都是无法避免的，要用大家都满意的方法来解决争端并非经常可能。因此，民主社会要求矛盾的双方乐意以妥协的办法来解决分歧。如果双方都不妥协，即无达成协议的可能，问题长久搁置无法解决，对双方都没好处。

客观、公正是新闻媒介需要长期追求的目标。民主社会之所以繁荣兴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闻出版界提供的准确信息、健康的评论和负责任的导向。责任、自由、独立、真实、诚信、公平、正直、庄重，是新闻出版从业人员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只有遵守这些原则，社会才能在稳定祥和的政治环境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增强国威，壮大国力，提高全民族的福利。

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培养自由与健康的新闻事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需要各方面长期认真的努力。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Political Democracy-The Mean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Advocacy, and Media Responsibility

This section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freedom of speech, advocacy, protection of reputation, and media responsibility within a democratic syste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riticism, opposition, and open public debate are essential drivers of social progress because they expose institutional weaknesses, encourage reform, and help societies correct errors. Citizen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express opinions, publish ideas, advocate political change, and discuss public affairs without censorship or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text emphasizes tha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not equivalent to defamation, fabrication, or malicious attacks on personal reputation. Individuals must remain legally accountable for knowingly false and harmful statements. The author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dependent journalism, ethical reporting, and responsible media practices. According to the text, a democratic society depends on open discussion, informed citizens,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Freedom, responsibility, integrity, fairness,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in journalism are presented as necessary foundation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trust,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long-term nat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国主确权动议

作者：左智海

诸位中国主人翁：

大家好！

我们被共产党给骗了。

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隶属于共产党的党权专制国家，与秦汉之后的皇权专制一般，你我正在被中共一党独裁。

从1949年至今，中共从没有实行过公有制，而是党有制，是中共高层领导所有制，中国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自然资源，所有的矿藏、森林、河流、海洋、天空等等，都已被中共以国有、公有的名义收为党有，归中共高层领导及其家属支配、享用，就你我这样的平民百姓一无所有。

中共也从未在中国实行按劳分配，而是按中共党内地位及权力大小、关系亲疏远近来分配，党内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与领导干部关系越近越好者能享用的资源及社会财富就越多，无权、无关系、无地位者不得或只得极少分配。

且中共在中国推行的并非集体主义，而是个人主义，而这里的个人仅包括它们中共高层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因为，中共从来没有把中国利益、民族利益或是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把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及人民利益之上。

诸位，所有的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的，也因为集体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合集，所以，任何一个个体合法权益的损害都会侵害到集体的利益，因此，任何牺牲及损害个体合法利益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在侵害集体的利益。

那中共还为何一直倡导我们要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因为在中共的大局里只有中共高层领导及其家属的利益，而没有你我，也没有国家、民族及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们不惜牺牲你我，谋夺国家、民族及人民的利益而只为去维护它们的统治和私利。

在中共的刻意混淆误导下，我们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私有制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私”这个字是带贬义的，所以，当读到私有制时多数人便会误以为这是不光彩、不应该提倡，甚至是不道德所有制的一种暗示。

但生而为人，我们凭什么不能拥有自己通过合法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汗水换来的土地和财产？各位，我们有权力拥有个人财产，而也正是因为现代私有制的出现才让普通人真正成为了人。因为，一个无权拥有财产，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被皇帝、官员的命令，或被政党以国有、公有、集体所有的名义剥夺土地和财产的人其实不是人，而只是皇帝、官员或那群政党领导

干部的半个奴隶。

事实上，现代私有制的实质是保护任何个人（包括普通人在内）的合法财产不受非法侵害。它的意义在于，当你不愿意出卖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抢走你的土地和财产，不管是皇上国王、国家元首、政党领导、村干部或是其它人民群众都不行，这便能保护住你、我这样普通人的财产权，确保你的土地和财产不会因为皇上、国王、政府、某个党、某个领导或其它人民群众的某个决定而被强占！没收！强拆！征用！

因此，普通人有权力拥有财产，且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是什么道德滑坡、自私自利，更不是什么落后倒退，普通人有权力拥有私产是生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社会的文明和历史的进步。

那中共又为什么要污蔑、抹黑现代私有制，这实在是因为现代私有制生来就是中共的天敌！

大家想想，要是新中国的每个人民百姓、每个普通人都有权拥有土地和财产、自然资源，且人民百姓拥有的私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中共还怎么去共人民群众和老百姓的产，它们还怎么以国有、公有、集体所有的名义去抢劫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普通人拥有个人财产并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也造不成什么社会危害，唯一损害的就是像中共这样欲要共你产的政党私利，因为这样它们便无法再共你和共国家的产了。普通人拥有个人财产是一种完全正当的利己行为，天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

而且，不知道大家反应过来没有，只有奴隶主才不允许奴隶拥有私产，也只有奴隶主和奴隶才害怕其它奴隶拥有私产。

但更重要的是：各位国主，请擦亮你们的眼睛，中共从来只为剥削我们，而没有为人民服务过。

大家好好看看，1949之后中共做的都是些什么？

中共利用手中的国家权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打造成了一架“人民收割机”，而在这收割机下大多数中国人民不可能不贫穷，因为在其“新中国收割系统”当中，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勤劳、天赋和努力都会被这套社会系统给无效化，所以，无论你怎么拼命的刻苦努力，也无论你有什么好的才能和天赋，你都赶不上中共这套社会系统对你的收割、利用和锁死、打压。

看，中共先以公有制，以国有、公有、集体所有的名义骗走了本该属于你的国家资源，盗走了本该属于你的公共财富，它们将本该供中国民众使用的、归中国民众所有的国家资源和公共财富（包括国家财政收入）都占为中共私有，并为它们所专用专享优享。中共让中国人民无权享用国家资源，无权享受公共财富，它们甚至

将国家财政也变成了控制、搜刮民众的工具。它们规定人民无权拥有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想方设法的把国家资源、公共财富从老百姓身上剥离出来，把中国人民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让你我一无所有，让中国人丧失了现代人所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国家民生和社会保障。

同时，中共再以垄断的方式扼住了中国人民生存之必须的资源，它们将党企伪装成国企央企集体企业，然后抓住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从中国人民的生存繁衍下手，把新中国的土地、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市场、金融、水、电、煤气、石油、矿藏、通信、交通、烟草等等民生之必须都统统打造成为收割中国人民之利器，并冠以国家的名义，打着为人民服务为幌子收割、压榨人民。

以至于，我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始终只能在中共打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被中共给控制、收割、压榨，然后只能在苦、穷、忙、卷中为中共的领导干部和其家属们的岁月静好疲于奔命、负重前行，并成为了中共的社会制度其“新中国社会系统”所生产制造的国家奴隶。

于是，今天的中国人成为了全世界工作最勤劳，却又生活最辛苦的民族。于是，我们甚至成为了只有考试及无休止的工作、劳动，而几乎没有生活，只有一辈子劳苦到死的民族。

但可惜在中共的洗脑和舆论宣传之下，多数中国人并不清楚自己之所以活得贫穷劳累、艰难困苦、毫无希望，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中共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系统性贫穷与结构性困境当中。所以，今天的我们买不起房、结不起婚、供不起小孩、也养不起老。而且，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无论如何努力的学习工作、劳动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

更过分的是，中共还掌握着中国人的生杀予夺，他们可以轻易的动用公检法将任何无罪的人逮捕、定罪、判死、消失、关精神病院，甚至是做成人体标本，或贩卖、活摘人民器官，它们更可以动用公检法合法的掠夺民营资产，打劫人民的房子土地公司，没收老百姓合法购买的财产（如电动车），充公小摊贩赖以维持生计的财物（如瓜果蔬菜、三轮车）等。

但是，各位主人翁，我等不是中国的国家主人吗？中国明明白白也只应当是中国人之中国，而非一党一姓之中国！那为何我等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却活成了这样？近乎于成了中共之半奴？

因为我们被共产党给耍了。

诸位，国家主人并非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更不是一个虚名，他实打实的是一种伴随着具有国家主人权力及享有国家主人利益的身份。而不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头挥挥手喊几遍“人民万岁”，来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就成国家的主人了。也不是共产党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们就真的是了，我们得真实的具有中国国家主人的权力，得真正的享有中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身为中国国家主人的我们，应当具有哪些权力？

第一、我们有权力决定谁在中国当官当政，并且有权力让这些政府及官员下台。

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元首、省长、市长、区县镇乡长由谁来担任，或是由什么党来主政当政（如：共产党或国民党）都得由我们这些国家主人通过投票说了算，并且，我们这些国家主人也有权力让他们下台，当然，身为国家主人的我们也有权力自己参与竞选。

而不是像现在共产党高层指定谁是国家主席，谁就是国家主席，它们让谁当省长、市长、区长，谁就成了省长、市长、区长。

就习近平你们有谁给他投过票选他当主席的？从你们当地的省长到乡长，你们谁有权投过票了？请问这市长除了蒋万安外你们还认识谁了？是不是只认识南京市长江大桥？

各位，其实我们连选谁来当县长的权力都没有，就这我们还 TM 的是什么国家主人？

但当下最恐怖的是什么？共产党说它们要当政时，我们就只能拍手，习近平说它要做主席了，我们就只可以叫好评赞。因为我们这些国家主人要是敢反对，那共产党就能给我们判刑或直接让我们被消失，而更不要提你想去竞选个市长或省长，你今早刚宣布参选，夜里就会被它们关到精神病院。

就这，我们算哪门子的国家主人翁？

由于在中共的刻意歪曲误导之下，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晓选举的意义是什么？

选举是把那些能够发现并有能力解决我们国家、民族现阶段问题，并能真心实意的为我们这些国家主人翁服务的人给选出来为我们服务；是把那些能够真正解决你们当地问题，能够真正的为你们争取权力及带来利益的人选出来，为你们争取权和利。

而当你们发现主政的这国家元首、这些省长、市长等等没有能力或尸位素餐，不真心实意为你们服务，不能真正代表你们的权力及利益的时候，你们就有权弹劾他们，或下次不再选他们，让这元首、这些官员不敢不真心实意的用心为你们服务，并淘汰那些能力不合格或是贪污受贿违法犯罪的官员。

就像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95% 的中共官员都是贪污犯，可即使我们明知道它们每天都在违法犯罪，在贪污受贿，在肆意的滥用民脂民膏，但我们这些国家主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只有我们能有权力让它们下台，能有办法让它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到法律的惩罚时，它们才会敬畏人民，才会不敢不为人民服务。

而也只有人民有了选票，只有那什么主席、省长、市长、县乡镇长需要你们的选票才能够当选时，那些官员才不敢在你们面前摆谱耍官威，才会拼命的讨好你们，争先恐后的推出有利于你们民生及福利的政策以为赢得竞选。

否则，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只要这些官员是由共产党领导任命的，那它们的官位、地位和权力、利益也都只来自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提拔，那么，它们也只会为那些能任命并废除它们官职的共产党高层服务，而不用理会我们这些屁民。

第二、政府有多少权力，取决于我们给政府多少的授权，如果没有我们的授权政府就没有任何的权力。

政府不是国家，也不天然的代表国家，政府只是一个用来服务国民的公共机构。其实不光是政府，包括国家元首、立法机构、公安检察院法院、军队和所有其它国家机构的权力及他们的构建、设立、选举方式、任免办法等等都需要由我们这些国家主人来通过《宪法》授权，如果没有我们的授权他们的设立就是非法的，即使有了我们的授权，他们也只能在我们授权的职权范围内行事，一旦他们的行为超越或是违反了我们的《宪法》的授权，那这就是违宪，我们就有权力依法追究他们的行为责任。而且，只要我们高兴，我们这些国家主人随时可以依照宪法来撤换这些政府和其它任何的国家机构。

只有这样，我们才是这些政府及其它国家机构、公务机关的主人，他们也才会规规矩矩的为我们这些国家主人服务，而不是如同目前的中共政府这般，我们不仅没有权力告诉它们，它们应该怎么为我们服务，它们还反过来强制洗脑 PUA 诱导我们，让我们努力的为中共和其政府领导干部及家属的私利做出牺牲和奉献。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非是中国政府，它也不隶属于中国人民，其实质是中共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一手操控并设立、组建的只隶属于中共，并用来维持共产党在中国统治人民，是它们用来控制并收刮压榨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工具。

而更可恶的是，今天的中共政府天天打着国家的旗号，扛着国家的大旗，以“国家规定”“国家大局”来控制、收刮、盘剥我们这些国主。

它们划一条红线，你家的房子、土地就得拆了归它们。

它们出一份文件，你的电动车就可以被它们没收了卖到非洲。

它们画一个圈，就可以把景区变成收费站。

它们出一纸公文，国家一级公路就可以再次收费。

它们出几项政策，烟草、电信、石油、燃气、电力等等所有能赚钱的、垄断、暴利的行业都只能它们做。

它们下一道法律，就能每年在老百姓身上收刮出二十多万亿的税费。

因为它们说：上面这一切统统都是国家规定。

但，各位，政府不是国家，政府也不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是国家，我们中国人民才是中国真正的国家主人，没有我们人民明确的授权，没有我们这些国主的同意，中共政府它就没有任何的权力可以代表或处分国家。

那中共政府目前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它们其实在做着曹操的勾当，在挟国家之名以令我们中国人！是在没有经过我们这些国家主人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就私自制定有利于它们享有并维持特权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资源和财富分配方式，及始终在以国家的名义规制和剥削、压榨我们这些国家主人，掠夺我们国家的资源财富。

第三，身为国家主人，每年交多少税费只应由我们来表决，并且这些税费用在什么地方，也只应当由我们说了算。

国家财政是国家对国家财富的收支和管理，现代化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税收，在现代化社会，国家财政属于公共财政，因为其国家财政的所有权及支配权都被国家主人公民们牢牢的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被那政府或哪个党派给掌控，且其国家财政的使用都必须满足“公共性”这个目的，所有非因公共性的目的而使用的国家财政都是非法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现代化国家他们的税怎么征收？收多少？怎么存放管理？用在哪里？归根都是由公民共同来决定的。

因为现代化国家都根据《宪法》设有立法院（或是议会），由公民通过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组成。关于怎么征税？征收多少？如何存放管理？用在哪里？都只能由法律来规定，而这些与税相关的法律制定，都必须经立法院民意代表的投票表决，只有获得多数民意代表的同意这税法才能通过，否则就是不予批准；关于政府、警察、检察院、法院、军队的运转经费和公务人员的工资及其它的公共开支、预算也都必须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否则就是不予批准。如果没有立法院的同意，这些行政机关、司法部门、军队的运转经费和其公职人员的工资就一毛钱都拿不到。

而这些立法院的民意代表每个适龄公民都有权力参与竞选，且只能由公民选举产生，只有真正能够反映公民的意愿，能够有能力胜任公民的委托，能够被公民喜欢的人才能够当选。如果你觉得你选的这个民意代表不好，你选错了，你上当了，这个代表当选前后不一，前恭而后倨，或别有居心，不能真实的反映民意，又或是其能力不足以胜任的，你下次就可以不再选他，而另选一个你认为能反映你民意的人。如果你觉得这届参选的不行，都不能真正代表你或是都能力不足，那么，你也可以亲自下场参选，去实现你的公民权利。

就是在这种民意代表制度之下，公民可以通过控制立法院来掌控国家财政的预算、收支和管理，而且，所有的财政预算、收支、管理都会由《宪法》规定的机构进行审计，如果审计机构发现国家财政的预算、收支、管理出现问题，便须立马就出现的问题上报立法院并向全社会公开，同时由警察、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介入调查，若其中有违法犯罪问题，则当即启动刑事追责，并追回流失的公共财产。

并且，所有的国家财政预算、收支、管理都必须向全社会公开，媒体、记者、律师、独立团体、公民个人随时有权就国家财政的预算、收支及管理进行询问、监督、检查，以履行公民职责，确保国家财政只用于“公共性”的项目事务。

而且，为了防止公职人员贪污受贿，滥用公权力侵占国有资产，现代化社会还设立了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上到国家元首，下到村长，包括公民民意代表、公检法、军官等等，只要身上有公职的都必须将所有家庭财产，将本人及配偶、子女的劳务所得、投资收益、买卖交易、赠与和赔偿、债务、房地产等等向全体公民公开，并且必须是定期向社会更新申报。这样，便有效的防止了公职人员滥用公民授予的权力将国家资源和公共财产以隐秘、非法的手段流入公职人员家庭，也有效的防止了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

而你们再看看，中共所谓的新中国是没有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这为什么？

因为，中共只要设立了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就会动摇中共的国本，到时，我们这些国家主人便会立马反应过来，这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国家财产和社会财富到底流入了谁的口袋？到时，大多数国家主人就会幡然醒悟，会立马看清这中共和其新中国的实质。

大家觉得，新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得的资源、财富大多数流向了哪里？

答案并不是阿里、腾讯、百度这些民营公司和企业家，也不是流向科学家、知识精英、高管、白领、教师、运动员、艺术家，更不是流向工人、农民、司机、骑手、个体户、小商小贩这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是流向了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流向了那些所谓的红色家族，流向了那些部级省级、厅级高官、国企领导和各个市县的领导干部班子，以及流入上面这些各级领导的家属、亲友、二奶、白手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堂堂一个所谓的新中国，一个号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但它的国家财政却是私有的。对，你没听错，就连那些共产党口诛笔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财政都是公有的，属公共财政，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财政却是私有的，是独属于中国共产党顶层领导的私有财政，而这也正是导致你我之所以是穷人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新中国国家财政的预算、收支、管理和使用都不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手中，而在中共这个私党手中。

因为，新中国国家财政运转的后果就是将国家资源和公共财富及民企民脂民膏都统统尽可能的收刮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骨干成员及其家属的口袋。

各位国主可知，中共新中国的税收和罚没收入最大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在于现代化国家的政府收税只能用于公共事项，只能用于改善民生，用于医疗、教育、养老、育儿、

失业保障、社会救济、科技、国防这些公共事务。而且，这些税金怎么花，用在什么地方，也只能由公民及公民代表投票来决定，并且公民有权对这些公共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

但在新中国，每年二十多万亿的税费被中共这样收刮走之后，就与你我这些国家主人无关了，中共和它的政府想怎么享用就可以怎么享用，领导干部们爱怎么浪费就可以怎么浪费。

因为新中国的政府及国家财政预算的批准执行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自己家开的，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也是中共指定的，而不是由人民群众和老百姓选的，所以，这些人民代表它们代表的并不是人民，它们代表的只能是给它们带来利益和职位的中共领导，它们也只需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为中共这私党服务，而不用对人民负责，所以，对于新中国的财政支出人民百姓无权参与表决，更无权参与分润、花销，中共高层领导可以随意的批准和执行国家财政的预算，这也是之所以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共的，是独属于中共领导私有的原因。

所谓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中共这里就是个口号，它们只需东拼西凑、堂而皇之的列出一堆项目表格假装这些税钱和罚没收入都已用于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等，就算是给我们这些国家主人一个交代了。

至于你人民百姓信还是不信，它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人民百姓没有任何的权力和手段能去监督、审查这些税收和罚没收入到底被用到了那里。因为新中国所有的行政机关、立法机构、司法部门都是中共家自己开的，甚至连军队也都是中共自家的党卫军，如果你胆敢质疑，胆敢根究，那么，你最终的结局不是被公检法收押，就是被精神病。

所以，这些从人民、老百姓、国家身上收刮得来的钱财，会很容易、极快的通过各种方法手段被中共拿去给领导干部和它们的八千万同志们发工资、发福利、发奖金，拿去给它们盖豪华政府大楼，拿去开会摆国宴、省宴，拿去培养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培养天安门的持伞黑衣人，拿去公款吃喝，拿去购买豪华座驾，拿去公款旅游，拿去搞烟酒、绿色食品特供，拿去国企分红，拿去建老干部病房，拿去无上限的报销领导干部医疗，拿去给领导们配备警卫、司机、生活秘书、随身护士，拿去给白手套然后分赃等，但，人民百姓对此又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的办法。

又如2026年5月1日以后，中共所有大小官员及公职人员们，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罪门槛已经从30万涨到了300万人民币，但期间农民的养老金只涨了20块钱，尽管很多国家主人对此强烈不满，可丧失了国主权力的我们又会有什么办法呢？

再则，身为中国主人的我们，应当享有的国家利益

和社会保障有哪些？

一、中国所有的国有资源及国有企业我们都享有1/13亿的所有权及分红；

二、我们有权拥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个人资产，且我们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三、我们有权自由选择职业，有权享受公正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四、我们有权通过工作获得公正合适的报酬，以保障我们本人和家属享有尊严生活所必须之条件（我们的工资收入必须能够满足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及育儿医疗教育养老等）；

五、我们享有休息和闲暇之权利，包括工作时间内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之权利（如：八小时工作制，每年带薪年假不低于15天）；

六、当我们遭受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其它不能控制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国家提供的为维持本人和家属之健康和福利所需之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之社会服务；

七、当我们在海外遭遇恐怖分子绑架勒索嘎腰子时，中国政府有营救及保护我们之义务；

八、当我们的海外华人、侨胞遭遇种族屠杀时，中国政府有出兵护侨之义务；

九、任何外国人都不得在中国获得超国民之待遇（如：一众有女大学生陪读的外国留学生老爷们）；

十、等等等……

诸位国主，请问你们有真实的享受过上述这些本应当属于国家主人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如果，你们连这些身为一个国家主人所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国主权力和国主利益都没有，那还凭什么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国家主人翁？

而且，身为国家主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力和利益还有很多很多，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一列明，但其实这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就只一点：这中国到底由谁说了算？或者说，这中国的规矩该由谁来定？

是习近平？

是共产党？

是那些领导干部官员？

还是应当由我们人民说了算！应当由我们中国人民来定中国的规矩？

其实，“只有将中国《国家最高规则》的制定权力牢牢掌握在我们人民手中时，只有中国的规矩由我们人民来定时，我们中国人民才能真正的成为中国之国家主人。”

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从秦汉到现在两千多年来，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命如草芥的原因。也是我们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朝历史上都不乏岁大饥，人相食的原因。更是为什么无论何朝何代那穷苦、吃亏、上当、受罪的都全

是老百姓的根本原因。

因为，从秦汉到现在，历来中国的《国家最高规则》制定权力都不在国人手中，因为中国的规矩一向都不由老百姓说了算，而是在皇帝、独裁者、中共领导、专制政党这些私人私党手中，中国的一切都只由它们说了算。

在1912年2月12日以前，中国的皇帝们口含天宪、至高无上，掌握着国人百姓的生杀予夺，它们皇帝说什么什么就成了《国家最高规则》，就成了老百姓需要去敬畏拜伏遵守的规矩，朝廷和王侯将相都只是其维护皇权的工具，而我们的国家和国人百姓全都只是皇帝的私人财物。

而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共以人民民主专政、以为人民服务、以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名义骗走了包括制宪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军权在内的所有中国国家公权力。从此，它们说什么就是法，它们说什么合法什么就合法，它们说什么违法什么就违法，它们将包括中国《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法规，将中国的国家规则和国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它们更是将中国人民的政府、立法机构、公检法、军队这些国家公共服务机关都变成了其私党的工具，从此，我们的国家及国家权力、国家机关都不在人民手中，而在中共这私党手中并成为了它们掌控、收割我们人民的工具。为此，我们中国人民才从本应该的国家主人，跌落成了中共新中国的国家奴隶，以至于我们今天十三亿的中国人民从生至死都处于中共的愚弄、规制、操控、役使、收割、压榨当中，且人民无法拒绝、无力抵抗。

那么，现在，不知各位是要继续如同我们这两千多年来的祖祖辈辈那般，世世代代的被这些皇帝、国贼、独裁者、中共领导、专制政党继续规制？继续成为它们的餐桌、菜单上的食材？继续的被它们玩弄、鱼肉、收割、践踏？还是要勇敢的去争取属于我们国家主人的权力？去勇敢的坐上餐桌，勇敢的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成为能够上桌参与国家规则的制定，并以此国家规则来确保我们能够掌握国家主人的权力，确保我们能够享受到国家资源、公共财富及其它的国家利益。而，不再如同现在这般，新中国的一切繁华、富强都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与我你无关。

时至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仅792万，甚至远低于战争时期1949年的1391万，再加之最近几年中国人口的莫名消失、减少，验证了我们中国人民已经无法在中共的这套社会收割制度下正常的生存繁衍。各位，我们当下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中共社会剥夺其生存及繁衍之权利，将来等待我们的就只有慢性的绝后、死亡和消失。

诸位，中共必须死，中国人民才能生。今天的我们要想活下去，要想活得幸福，要想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要想摆脱当下的贫穷与困境，唯有从中共手中夺回我们的国家，拿回我们身为国家主人的权力，然后砸烂中共这套收割我们的国家规则，重建一套真正能够让每一位

中国人当家作主，能够真正确认并维护每一位中国人的国主权力及国主利益的《国家最高规则》，然后再依照这《国家最高规则》重新组建真正隶属于中国人民，并只为服务、保障和维护中国人民的国主权力及国主利益而存在的公共政府、国民立法机构、正规警察局、正规检察院、正规法院、正规国家军队，并将我们的国家资源与公共财富（包括国家财政收入）都真正用在国计民生，用于保障每一位国人的生活条件，保障每一位国人的健康安全，保障国家及国民个人的发展。并让所有的国家机关，所有的公共及社会机构、部门、组织、团体、法人，所有的人都处在此《国家最高规则》的约束之下。并把新中国按权力、血缘、关系的分配方式更改为按劳分配、按创造力分配、按贡献分配，我们必须让勤劳能够致富，让每位国人的才能和天赋都有用武之地，让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得到丰厚的奖赏。只有这样，我们中国人才能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摆脱中共或其它专制政党对我们的掌控和收割，才能真正建立公平、良性的社会制度及分配方式，也才能过上富足、闲暇、健康、体面的生活。

而在现代化社会，一国的《国家最高规则》或是国家的最大规矩通常被称之为《宪法》，这种有权利参与国家统治的国民被称之为公民（公民的实质就是国家的主人），这种以全体国家主人一起约定的《宪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规则及最根本法的治理模式被称作“宪政”，而这种全体国家主人一起参与制定宪法，并将《宪法》确立为国家最高规则及最根本法的过程被称之为“制宪、立宪”。

也就是说，当下我们中国人民要想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就得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独裁与专制；2、如何建立一套能够确保中国人民享有国主权力及国主利益的国家最高规则（即宪法）。

但，现在要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有多难？其难度不亚于人类第一次登月。不信，你随便问一位中国或是外国人，告诉他们我们能推翻中共在中国的统治，他们大多数的反应就只会如同在 100 年前你告诉当时的人们，说人类可以坐火箭登上月球一般。

那我们今天要想绝大多数中国人一起参与制宪、立宪，然后合议表决，创造出真正能够保障中国人民的国主权力及国主利益的规矩，或一套国家最高规则出来有多难？难于古时候的人类上青天。

为什么？因为在中共的愚化、奴化教育，洗脑灌输、信息封锁，舆论宣传、管控之下，今天的中国最少有 70% 的中国人不知道《宪法》是什么？他们更不知道要如何及怎样才能设计出一套能够确认并保障他们国主权力及国主利益的国家规则。甚至他们中还有很多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被中共给控制和收割，并误认为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吃饱饭是因为有中共的恩赐才养活了他们，误以为要不是有着中共的保护，中国早就被那些莫须有的帝国主义国家给消灭了。

而且，就算那 30% 清醒的中国人也因为缺少民主实践，缺乏政治运动的经验，所以他们还没有学会或是说还不知道如何才能团结到一起制定并协商表决出一套国家规则出来。可这也恰恰成为了今天的反共民主人士不善于群，不会团结，无法形成合力的一大原因。

是的，今天那么多反共的人士、团体、组织之所以一盘散沙是因为没有共识，因为我们达不成一致的政治共识，我们不知道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更找不到一套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够接受的国家规则。

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反共，知道民主宪政，知道现代化国家的构建，知道三权分立、公民权利、人权的普遍性共识，知道我们应该团结到一起等等。但我们或者各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意见和主张，或者我们不知道什么才应该是正确的政治观点、意见和主张，或者我们容不下他人的政治观点、意见和主张，或者我们干脆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甚至于有些反共人士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高尚纯洁的，而其他和自己行为、观点不一样的反共人士就都是卑劣，甚至是别有用心。

所以，我们今天那么多反共的人士、团体、组织始终无法形成合力对抗中共。

所以，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很难团结起来，并建立一套能够确保中国人民享有国主权力及国主利益的国家规则。

所以，尽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想反抗中共，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反？不知道我们该如何组织起来积蓄力量推翻中共改变中国？不知道我们该加入哪个组织？该如何下手？如何的使力？

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没有方向，也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但，我要告诉大家，天佑中华！是的，因为老天爷一直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了一条路，我们大陆中国人的出路其实一直就摆在那个地方，只要你能洞穿中共的骗局和谎言就能够看到，那就是——台湾。

是的，我们根本无需从无到有苦思冥想的去设计一套完美的国家规则，我们也不消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去动员十几亿的国人，然后各种耗时耗力耗钱无休止的去争论协商开会表决，各位，我们何必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可以直接走桥的，只需照抄台湾的民主制度就好。

诸位国主，天佑中华！

从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退位开启的那场中国政治现代化民主革命并没有结束，更没有失败，中华民国他一直都在，而且已经在台湾开出了民主之花，如今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台湾人民已经真正成为了台湾的主人，他们已经实现了民治民享民主共和之国，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政治现代化、文明化、民主化转型之实例，已经破除了中华民族不适合民主化之谣言，更为我们大陆的中国人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出路。

当然，不可否认，民主并非是完美的社会制度，台湾也一样存在着他的问题，但是，民主虽然不是最好最

完美的社会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社会制度。关键在于，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又或者就就以我们现阶段的人类智力及经验而言，根本设计不出完美的社会制度，但，相比较中共的那套对人民群众的收割制度而言，台湾这套民主规则下人民所掌握的国主权及所享有的国主利益至少在及格分数以上（台湾 68 分、美国 70 分），而在中共那套一党专制、毛习独裁的规则之下，我们中国人民连 TM 的人都算不上，只是它们那群领导干部的盛世之牛马，乱世之炮灰。

诸位，政治是现实的需切实可行，从现实层面来讲，不要一来就想什么完美座驾，我们最好先脚踏实地的登上台湾这辆民主的大巴，先让人民坐上民主的车，先用台湾的这套民主规则落实我们中国国主们最基本的身份、权力、利益及福祉，然后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再依据大陆的现实情况，逐渐的学习民主，积累民主的经验，根据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去逐步的修改和完善。

而且，从中国的法统来看，中华民国的这套民主国家规则（台湾制度）才是我们中国合法的正统制度。各位国主，中国的法统其实一直在台湾，在中华民国，其 1912 年 2 月 12 日的清帝退位诏书当中已明确清帝退位让予大中华民国。

而中共政权的实质是什么？是一帮靠撒谎骗民、打家劫舍起家的赤匪俄俄，一帮在苏联的扶持、资助下祸乱中国的反革命、反中华、反文明的武装叛乱抢劫分子。

中共为什么一直对攻陷台湾深怀执念？它为什么一定要拿下台湾？因为中共的来路不正，因为它们害怕人民反应过来中华民国才是我们中国的正统！

大家翻开历史，共产党从来没有保护过中国，二战期间真正保住中国的是中华民国国军将士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当年的中共除了配合苏俄卖国、破坏、捣乱、割让土地之外，它们唯一做的就是清算、屠杀、关押当年国军的抗战英雄，及斗死、流放、劳教清末民国期间我国在科学、教育、文化、工业、商业、艺术等各方面各阶层涌现出来的民族精英，以及饿死了 5000 多万的中国农民。而现今，中共这帮土匪一直在做的也还是它们的老本行，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借口，以公有国有集体所有的名义抢劫全中国。

所以，各位国主醒醒，中华民国才是我们中国的正统，我们今天也理应当在中国实行中华民国的这套国家规则——台湾民主制度，而并非共匪或其它人士、团体、组织所制作的什么国家规则制度。

当然，非常高兴有很多反共的朋友集思广益提出了许多关于在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国家规则的设想和建议，比如：有的认为中国应该实行联邦制，有的认为应该各省独立，也有的认为某些省份应单独脱离中国独成一国等等。

但大家必须考虑的是，我们所提出的这些政治观点、意见和主张是否有群众基础？能否得到中国老百姓们的支持？像联邦制、各省独立、某省单独建国等这些，绝

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是无法接受的，而如果我们的政治主张得不到老百姓支持的话，那这反共就成了无源之水，我们又还如何能推翻中共？

且就认知层面分析，我们必须考虑在中共 70 多年的愚化教育下中国老百姓们的认知程度。如果我们现在提出一个什么全民立宪共和，或是来个联邦宪法的制定讨论，或构建个中国民主议会，老百姓们根本就参与不了。其实，不要说什么三权分立、代议制、统治权的公共化这些现代化政治概念，就连“公民”两字都还有一半的中国人不解其含义，更有一大半的中国人连国家和政府都不清楚。而就在这种情境之下，其实很难向老百姓们解释清楚我们的政治目标，也很难让他们理解清楚我们所需要追寻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如此，我们要想将他们动员起来就更不可能了。

但只要我们将这些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抽象的国家规则、社会制度、政治概念具象为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台湾，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学台湾，应当过台湾人一样美好的生活，那么，国内的老百姓们才能够理解我们说的具体是什么，也才能明白我们在追求并为之抗争的是什么。

且尽管中共尽力的筑防火墙封锁外网，管控国内互联网操纵舆论愚化人民思想意识，但还是有部分中国民众开始觉醒，他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历史的真相，知道了推翻清朝结束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并真正推行国之权在民的是中华民国，知道了中华民国国军将士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当尤其再看到如今台湾完善的民生与医疗保障，看到台湾保有的传统文化比中国还中国，看到台湾的经济、股市、科技行业正在飞速的发展与增长，看到台湾的官员在老百姓面前卑躬屈膝的拉票，看到台湾的公务人员对老百姓极尽讨好的求好评，中国人民对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对其三民主义，对蒋介石先生及国军将士的抗日功绩，和对中华民国及台湾的认同度都在前所未有的飙升！所以，我们只有主张在中国实行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这套民主制度，才能够获得越来越多中国老百姓们的支持与认同。

况且，东德西德，朝鲜韩国，中共治下的我们与台湾的现实都摆在那里，但凡有脑子的中国人迟早都会看清楚。

然后，必须明确我们反共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夺取中国的政权，然后替代中共成为新的特权阶级统治中国，控制人民，收割老百姓？又或是为了成为一省小国的统治者，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满足权力的欲望？还是说，我们反共的目的是为了秀学识，为了提出个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政治方案？

但如果，大家反共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每一位中国人的国主权及国主利益，建立一个国之权及国之利在于民的社会，为打破中国政治的私有化，实现中华民族政治上的公共化，那么，我们就得遵循民主，那关于中国应该实行联邦、各省独立、或某省单独建国等等就不应

当只由少部分人来决定。

当然，大家可以提出任何的政治观点、意见及政治主张，但其能不能在中国实行只应当由 13 亿的中国人民通过全民公投说了算，因为这 13 亿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中国国主，只有他们才有权力来处分中国。

而且，也必须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及《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例》来进行表决，因为中华民国和其这套国家最高规则才是我们中国的正统。

更迫于实际的一点是：只有我们这些反共的个人、团体、组织都先放下异议重拾中华民国的这套国家规则，我们大家才能够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合力而不再是一盘散沙，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赢的希望。否则，我们有的要求搞联邦、有的要求各省独立、有的要求某省单独建国等等，都用不着中共动手，大家的力量就会在彼此相互间消耗、抵消，甚至是互为攻击、敌视，如此就算再过几代人我们还是成不了事，更推不翻了中共。

诸位，中共目前能在中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一大原因是什么？中共的领导又没有什么神魔伟力？它们凭什么把我们十多亿的中国人按在地上摩擦、收割？

其答案就在先秦诸子的一句话里：“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因为中共能群，是一个有 8000 万在编人员，有军队、有财政收入、有行政的严密政党组织，而我们这十多亿的中国人却不能群，却形不成自己的组织力量。

诸位，人类个体的力量是非常有限、脆弱和渺小的，单个的我们不要说战胜中共，我们这些一个、一个、一个的社会个体沙粒，在现实中就连和中共对抗的资格都没有，不要说中共碰下你就碎，就连县委书记打个喷嚏你我也挨不住。但只要我们将这一个个看似普通、平凡、弱小的个体集结起来，逐步尽可能多的把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整合到一处形成组织、团体、联盟，那我们就能汇聚成为一股新的能与中共抗衡，并一定能战胜中共的政治洪流，因为中共只有 8000 万在编人员，而我们中国人民有十多亿。而这也正是中共禁止中国人民组党、结社的真正原因，因为这里面蕴藏着摧毁中共的力量。

到这里，要如何确权并拿回我们的国主权力及国主利益，及如何与中共对抗，并战胜中共的方法和路径都已经明摆着了。也就是说，要与中共对抗、并战胜中共说简单也简单，只要我们这些被中共做局欺骗、愚弄、控制、收割压榨的十多亿国人学会能群，大家能够醒来举起中国正统中华民国的这杆民主旗帜，然后以中国法统中华民国的最高国家规则《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宪法性文件为共识团结起来，组织成反共的团体、联盟，并建立反共统一战线，只要我们这十多亿的中国国主们能团结到一起一致合力的对抗中共，那么，中共便会在瞬间融化。

但要说难，就难在我们这十多亿的中国人要怎样才能学会团结起来一致的对抗中共！

如果，我们这群十多亿被中共愚弄、收割的中国人连台湾已经走出来、摆好、放在面前可以让你照抄的制度，我们都学不会、抄不来。那么，就依我们这群人的这种智力和尿性，我们还真活该被中共统治，也活该被中共这样一代代的给控制、收割、压榨、迫害下去。

或许，这是一种自然选择，智力高的、有胆气的、能群的、会协作的淘汰或奴役那些智力低、懦弱、不能群、不会协作的。

那么，你是要选择被中共控制、收割利用完了淘汰，还是要选择学会以中华民国的这套国之权在于民的规则，以民主的方式来群，来相处，来协作，来团结一致的驱除中共，恢复中华！

诸位：中共必须死，因为中国必须生！

最后，诸位国主！我今天以中国国主之一的身份，向其余所有的中国国主们提出动议：建议所有的中国国主们一起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的推翻中共，并以台湾民主制度重塑中国，以确认与保障我们 13 亿中国国主的国主权力及国主利益。

并为了推翻中共！为了我们 13 亿中国人民能够真正的成为中国之国家主人！为了我们中国人人如龙！天下大同！本人再附行动建议如下：

一、有请所有不甘沦为中共牛马、炮灰的国主们尽可能的一起努力，将“应当在中国实行中国正统——中华民国的台湾民主制度”塑造成中国共识；

二、有请所有反共的人士、团体、组织相互间尽可能的包容、互助、合作、支援，并争取早日达成反中共统一战线；

三、有请所有中国国主们能站出来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起构建反共的团体组织，并筹集反共资金，建立反共基金或金库支援反共，及尽可能的组建或动员解放军从党卫军回归国家军队，整合所有中国国主的力量一致推翻中共。

动议人：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成员左智海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Motion on Affirming the People's Sovereign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gap between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reality. It argues that a genuine republic depends on popular sovereignty, free election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Without these foundations,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public trust inevitably weaken.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lasting stabili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 transparent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fundamental rights through meaningful constitutional and democratic refor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 29 期

(2026 年 5 月 25 日)

作者：张维清

本期介绍被迫害人士：毛庆祥，1950 年 2 月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独立作家、民主活动人士、中国民主党筹委会创办人之一、《在野党》杂志策划人，复刊后的《在野党》杂志荣誉主编。

最新近况：

现年 76 岁高龄的毛庆祥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前后被杭州警方强行带走，目前处于“强迫失踪”状态。5 月 19 日，杭州中国民主党人、八九民运领袖徐光获释出狱。毛庆祥因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并转发了徐光出狱感言及呼吁“勿忘六四”的视频，随即被强行带走。经证实，具体办案控制单位为杭州市金沙湖派出所。由于毛庆祥无直系亲属在身边，警方对其前妻的询问仅口头回应“人很安全”，拒绝透露关押地点、罪名及拘留期限。

一、个人简历

- 1、1970 年代末：参与杭州“民主墙”运动，创办民间异见刊物《四五》月刊和《华东民刊》。
- 2、1981 年：因从事民主启蒙与维权出版活动，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 3 年。
- 3、1998 年：与王有才、朱虞夫等人共同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公开申请政党注册，创办党刊《在野党》。
- 4、1999 年：因公开筹组政党遭官方大抓捕，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有期徒刑 8 年。
- 5、2010 年出狱至今：长期留守国内，常年遭受国保严密监控，在敏感政治时期频繁被软禁或带离杭州。

二、政治立场

- 1、废除一党专政：主张建立开放、合法的多党竞争与民主轮替政治体制。
- 2、保障公民权利：呼吁中国政府兑现宪法承诺，尊重言论、结社、集会及出版自由。
- 3、和平非暴力转型：坚持通过公开化、合法化、非暴力的渠道推进中国的宪政改良。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 1、第一次获刑（1981 年）：因参与民主墙运动，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 2、第二次获刑（1999 年）：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8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 3、强迫失踪（2026 年 5 月）：因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异见人士徐光的出狱感言及呼吁“勿忘六四”的视频，

遭杭州市金沙湖派出所带走，目前面临新一轮的政治迫害与司法指控。

四、社会评价、国际评价

- 1、国内民间评价：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前驱与中流砥柱，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刚毅守候，激励了多代追求自由的维权人士。
- 2、国际组织评价：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International) 及人权观察 (HumanRightsWatch) 长期将其列为“良心犯”重点关注。国际社会谴责中国当局对其长期实施的法外迫害与权利剥夺。

五、《在野党》人权观察部对此发表紧急声明：

- 1、立即释放毛庆祥：强烈谴责杭州当局因言治罪，要求杭州市金沙湖派出所立即无条件释放 76 岁高龄的毛庆祥。
- 2、公开关押信息：敦促办案单位依照法律程序，立即向外界公开毛庆祥的羁押地点、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涉嫌罪名。
- 3、停止政治迫害：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中国民主党人及所有政治异见人士的法外监控、强迫失踪与司法打压，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Opposition Party Human Rights Observation Brief No. 29 (May 25, 2026)

This briefing documents the case of Mao Qingxiang, a seventy-six-year-old Chinese writer, democracy advocate, co-found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Preparatory Committee, and honorary editor of Opposition Party magazin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Mao was taken away by Hangzhou police around May 20, 2026, after sharing messages and videos related to the release of democracy activist Xu Guang and calls to remember June Fourth. His whereabouts, legal status, and detention conditions have not been publicly disclosed. The article reviews Mao's decades-long involvement i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including previous imprisonment for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1981 and 1999. It concludes with calls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disclosure of detention information, and an end to political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s in China.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的六四记忆

——从维园到天安门，从香港到枫叶国

作者：黄维克

“六四”之前

那是1989年初春，北京的天气依然刺骨。我刚在北大一位老师家中做完客，打电话叫“首汽”出租车来接。对方一听是“北京大学”，立刻沉默，然后挂断。无奈，我只得步行出校。谁知刚到大门口，就听见前方一片嘈杂，人群汹涌，许多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们穿得极为单薄，脚上一双解放牌球鞋，有的连袜子都没有。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真可以说是“衣着寒颤”。游行队伍正朝城里进发，抗议几天前悼念胡耀邦的学生，在天安门纪念碑前被捕。队伍最前方是各国记者，镜头与照明灯照亮了，北京郊区昏暗的街道。第一排的学生举着手，比出“V”字母胜利手势。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默默地随着人群前行。走到人民大学门口时，队伍短暂停了下来。人群爆发出一阵高喊：“人大的，出来！”更多“人大”同学加入了“北大、清华”的队伍。几位看起来是学生领头的人拿着小纸条，似乎在统一口号。我记得其中一句是：“还我战友！”还有的就是：“反对官倒”、“人民不再沉默”、……队伍继续沿着白石桥路前行，到了双榆树，已接近北三环，也临近我常驻的友谊宾馆。忽然，前方一阵骚动。几百名穿制服的人列阵路中，堵住了去路。那时，他们的制服好像已经不再叫“公安”，改叫“警察”了。庞大的队伍被迫停下，后面的人还不清楚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有人沿着人群高喊：“谁愿意加入敢死队！”显然，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不允许学生进入市区，只能沿着环城路绕行。大约半小时后，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敢死队”，排成了一个方阵。学生们手挽着手，神情坚定，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姿态。这时，大家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警察第一排没有携带武器，身着整齐制服，肩带与腰带在夜色中反射出冰冷的白光。警察身后藏着什么秘密？而对面，学生们衣衫单薄，脸庞被寒风吹得通红。地面白茫茫的大雪，照得学生们的面孔格外清晰。我爬上一处花坛，试图看清警察阵列背后有什么，但视野所及仍是一片模糊。身旁有人悄声说：“后面有机枪。”就在这时，最前方的学生方阵开始缓缓向前推进。我屏住了呼吸，……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连历史都屏住了呼吸。眼看就要与警察撞上了——突然警察队伍像潮水一样向两侧散开，让出一条通道。学生队缓缓地走了过去。

“六四”当天

“李鹏中枪”——那几天流传最离谱的一条“爆炸新闻”。那时还没有互联网，香港也谣言满天飞。那个周

末我不用上班，可以说连续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六四惨案爆发后，全香港自发“罢市”一天。我宣布管理的公司停业三天，顺便补点瞌睡。家里早早准备了足够的食物，把书房的电视机搬到客厅，手上握着两个遥控器，桌上摊着五六份中英文报纸，电话听筒随时举起，整个客厅成了作战指挥中心。那时候我朋友圈里流行一句“老话”：“一有风吹草动，海内外的阶级敌人就蠢蠢欲动。”香港那时虽有自由未有民主，但我们真心希望大陆的亲友两样都有。那几天北京早已封城。全世界记者的底片和胶卷都带不出去。幸运的是，天安门广场上刻意扔下了几部移动电话，才有从6月3日到4日不断听到现场的声音。直到6月4日天亮，才终于看到画面。记不清是北京饭店还是外交公寓的顶楼，总之有摄影记者在那里拍摄。画面中北京人的勇敢令人落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对着全副武装的野战军。他们排成一列向前推进，前面有人中弹倒下，后面的人马上冲上去把伤者抬走。没过多久，又继续向前。这下人们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用肉身去挡坦克。在屠杀发生前，支持学生的有各种人：首都各部委、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职员、平民百姓，北京的老大爷老太太都在街上，送吃的、送喝的，那就是北京人。最让人难受的是，香港的记者不断拨打北京各大医院，想确认死伤情况。记者们操着香港口音的普通话，那头是地道的北京腔，两种声音在我耳边至今回响。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个电话，是打到我经常去的积水潭医院。接电话的是个女护士，声音已经沙哑近乎崩溃：“送来的时候……已经死了……满地都是血……快来帮忙吧！”那个地方我太熟悉了，那里的人我太了解了。那些北京的街道、那些面孔，是我青春里的一部分。六四之后的几天，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各省市，社会像被分成了两派。香港坊间也开始流传“兵变”的传闻。我亲眼看到建国门外的立交桥上，军人与军人之间竟然拔枪相对，有人说是27军与38军对峙。我当时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可几个月之后，当那些血淋淋的照片和影片流传出来，竟然有人说那是好莱坞摄影棚里拍的！

“六四”之后

第二天，全香港爆发了罢市、罢工、罢课。据说那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至少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我记得自己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身边有不少记者在拍照。队伍中飘扬着青天白日旗，香港人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每年十月，新界的村子里同时飘着两种旗帜。人群中高举的标语写着：“血债血偿”、“停

止屠杀”、“支持学生”……口号此起彼伏，如同愤怒的波浪，一浪盖过一浪。晚上，很多人汇集到港岛中心的维多利亚公园。那里搭起了临时灵台，供市民们静默守夜、低头祈祷，还有不少人席地而坐，进行悼念活动。接下来的几天，马路上的人们神色哀伤、行色匆匆，仿佛都失去了亲人。我手头有一张6月8日的机票，从香港飞北京，再去南京。那几天我心里反复挣扎——到底还要不要成行？那时候没人飞北京，只有人回香港。记得航空公司还让我签了一份“志愿承诺书”。

很多香港朋友都觉得我是去“送死”，但这很符合我的性格——想做的事，总是要去做的。人这一辈子，总该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北京的朋友劝我不要来，我回答说：“我要见证历史。”南京航空学院的那位在电话里苦劝我：“我们校园里全是坦克，你千万别来。”但我还是登上了那趟飞机，几乎只有我和空乘人员，没有其他乘客。

飞机落地后，我告诉出租车司机：“我想去天安门广场。”他当场摇头：“绝对不能去！那些戒严部队，真的会开枪。”在我坚持之下，他只愿意载我到广场附近。那一带已经被封锁，但我还是远远地看到了：地上有坦克的履带印，墙上残留着子弹痕迹，血迹大概已经被清洗了。整座北京像被掏空一样，街上几乎没有行人。那两天我去了八达岭长城，本想散散心，没想到城墙上也驻守着士兵。拍照时，有一位年轻士兵轻声问我：“你能不能帮我拍一张照？我想寄给家里的父母。”我犹豫了一下，终究我们还合影了。回到香港办公室，把胶卷冲洗出来后，同事看到我和解放军士兵的合照，立刻质问我：“你怎么能和屠城部队合影？”我解释说：“那是驻守北京郊区的农村兵。”

有人建议把照片交给媒体，我拒绝了。从那以后每年“六四”，我都参加香港维园的烛光晚会。后来移居加拿大，就改去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楼前，那里墙上放着一辆在天安门压坏了的自行车雕塑，令人浮想联翩。

这几年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说华人对身份的认同感降低了，也有人说“六四”已经被人遗忘了。

六四，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些年，我一直不太愿意多提这些往事。总有人说，嘴巴乱讲话，以后就回不了中国。我担心见不到年迈的父亲，所以这么多年来，对自己多少还是有一些约束。如今父亲已经离世，那些曾经的顾虑，也随着岁月慢慢远去了。回头再看，当年那个独自飞往北京的我，虽然有些害怕，却从未犹豫。

作为“六四”这一代的人，何时心灵会得到安慰？再倒上一杯威士忌吧。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rom Victoria Park to Tiananmen, From Hong Kong to Canada: My Memories of June Fourth

This memoir reflects on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s surrounding th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and the lasting influence those events have had on his life. In the spring of 1989, while visiting a professor near Peking University, he unexpectedly found himself among growing student demonstrations. Students from major universities marched through the cold streets of Beijing after the death of Hu Yaobang and the detention of mourners. Despite harsh weather and uncertainty, they voiced demands for reform, accountability, and greater political openness. The author recalls their determination, the slogans they carried, and a tense confrontation with police forces that ultimately allowed the march to continue.

The narrative then turns to Hong Kong during the days of June Fourth. Through television broadcasts, newspapers, journalists' reports, and telephone calls to hospitals in Beijing, the author followed developments almost continuously. Rumors circulated widely, but increasingly troubling eyewitness accounts soon emerged. He remembers hearing exhausted medical workers describe overwhelming casualties and seeing images of unarmed civilians confronting armed troops. These reports deeply affected people throughout Hong Kong and generated widespread grief, shock, and solidarity.

Following the crackdown, Hong Kong experienced massive demonstrations, strikes, and public memorial activities. The author joined these gatherings but felt compelled to witness conditions personally. Despite repeated warnings, he traveled to Beijing shortly afterward. Upon arrival, he encountered a city marked by military presence, silence, and fear. Empty streets, visible traces of military activity, and conversations with local residents reinforced his belief that a profound national tragedy had taken place.

The memoir also reflects o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The author attended annual June Fourth commemorations in Hong Kong's Victoria Park and later continued participating in memorial activities after emigrating to Canada. Although attendance has gradually declined, he rejects the idea that the events have been forgotten. For him, remembrance remains an important moral responsibility.

Blending personal memories with broader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conscience, the essay argues that preserving memory is essential.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later, the events of 1989 continue to shape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responsibility, and historical truth. Remembering June Fourth, he concludes, is not only about honoring those who suffered, but also about ensuring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can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learn from its lesson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侨批

——《写给阿嬷的情书》

作者：漠北独侠

一纸侨批，半部家国史：我手里的方寸信笺与沉疴的百年

侨批，又称银信、番批。（见附图）请隆重瞻仰：真正的侨批！

当我从樟木箱底抽出那封泛黄的信笺，蜡封已脆，墨迹洇开，邮戳上“马来西亚”“潮州”的字样像两枚时间的印章。电影《写给阿嬷的情书》把它当成灵魂道具，可我手里这一封，是真的。它不煽情，不宏大，却比任何镜头都更宽、更广、更深、更沉。

中共惯用宏大叙事去歌颂苦难，灾难被拍成勋章，饥饿被唱成赞歌。电影我没看，猜都猜得着套路。但侨批不需要导演。它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潮汕、粤西、闽南、广西人“过番下南洋”的肉身证词。没有旁白，只有血和算计：一封家书，夹着几块银圆，穿过台风、战乱、关卡，落到贫瘠的红土地上。

最不堪回首的铁证，在大饥荒年代。

1959-1961年，村里饿殍遍野，粮票是纸，树皮是菜。侨批局的水客却照样“见信即付，风雨无阻”。我爷爷的弟从马来西亚寄回的200港元（当时折人民币75元）侨批，救了我全家八条命。那不是政府的救济，是一个在异国洗盘子的叔公，省下口粮换来的命。侨批就是这段历史最直白的铁证：国家失语时，血缘在说话。苦难不应被遗忘，但更不应被歌颂成“考验与荣耀”。苦难就是苦难，是体制失能时千万个家庭的侥幸与绝望。



我收藏的这封原件，是我从时间手里抢下来的。

几年前，我在潮阳老镇偶遇一位百岁老人——照片里打桌球的就是她。瘦得像麻秆，桌球却打得极准。他说，老人儿女都去了汕头，屋子要卖。信对她是念想，对我，是责任。

我哀求。保护史料的钱不能算价钱。我以“保护史料并给老人养老”之名，给了她12000元现金，把这封侨批带了回来。二十几年过去，纸更脆了，我用无酸纸袋封存，恒温防潮。它不是我的藏品，是我替苦难的土地暂时保管的记忆。

这土地上的芸芸苦民之所以还能生生不息，其密码写在一张薄纸上。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侨批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评审词很克制：这是“非官方金融与移民史的独特文献”。但我看到的是历经数千年民国尚遗存的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当下的盐碱地用最先进的探测设备恐怕也难找见这五个字的温润气息。

仁：心系故园，孝顺桑梓

“阿娘大人膝下：儿在南洋，身虽贱，命尚存。兹汇银三元，望购米度荒年，勿省俭以伤身。”

再苦再难，省吃俭用寄钱回家。赡养父母、妻儿，甚至帮衬破产的乡邻。侨批局的账本里，没有“国家”二字，只有“阿妈”“阿嫂”“阿弟”。这是民间最朴素的民生保障。

义：一诺千金，患难见真情

没有合同，没有银行。批局的水客扛着木箱走山路、过海峡，凭一句“见信即付”。遇海难，批局东主变卖田产赔付。信誉破了，整个侨批业就死了。所以他们宁死也要守信。这份“义”，比任何公章都硬。

礼：敬长睦邻，礼数周全

家书的称谓永远是“大人膝下”“慈母大人”。行文谦逊，落款必写“儿某某百拜”。长幼有序，红白事随礼都有分寸。一张侨批，既是汇款单，也是礼法教科书。漂泊的人最懂礼数，因为无礼就无根。

智：闯海打拼，坚韧求生

白手起家，从挑粪、开杂货店到做橡胶。侨批的背

面常有批注：“钱勿乱使，待秋收”“莫信赌档”。这是没有读过书的人，用血换来的商业智慧。智，不是算计，是活下去的本事。

信：诚实守信，契约精神

百年侨批业，靠“言必信、行必果”维系。没有法律，却比法律更管用。批局倒闭的消息一传，整个村都跟着心慌。因为失信的代价，是千万个家庭断炊。这是华人最硬的底层代码。

我们该记住什么？

侨批让国人骄傲，却也让国人脸红。

它骄傲在：华人在异国他乡靠仁义礼智信站稳了脚。

它脸红在：为什么“家国”二字，最终靠一个在南洋刷盘子的人来兑现？

为什么大饥荒时，救命的不是粮仓，而是远在万里外的私信？

苦难被歌颂，责任就被稀释了。侨批的美，不该用来美化那个让无数家庭“靠侨批续命”的年代。我们记住侨批，是为了记住“仁义”二字在民间的力量；更是为了记住：当公共制度失灵，普通人就得用命去填坑。

我保护这封侨批，不是因为它值钱。它值钱，是因为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残酷与温柔。残酷在：国让民失望。温柔在：民从未放弃民。

方寸信笺，写尽仁义礼智信。

我愿做它的守墓人，直到它该去的地方——博物馆，或后人的课堂。

让孩子们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曾在最绝望时，用一封信把彼此拉出泥潭。

这不是怀旧。

这是警醒。

(后记：为什么满屏都是“五月三十五”的烛光、泪水与怒火的特殊时段，而我偏偏不合时宜独沽“侨批”，是因为相较“五月三十五日”更加温情、更具人间烟火气、兴许更能浸润盐碱地。我的“五月三十五日”就待机择日再忆，把这最滚烫的一隅留给广场的母亲和英豪们吧，比如日前第三次成功逃亡的董广平兄长)

附下图(打台球的百岁人瑞为侨批原主)：我收藏保护的侨批原件照片。蜡封微裂，墨香已散，邮戳尚清。纸很薄，命很重。



漠北独侠

2026年5月22日记于东山下烟岚小木屋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Overseas Remittance Letters: A Love Letter to Grandma

Using an original overseas remittance letter preserved by the autho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qiaopi, the remittance letters sent by overseas Chinese to families across southern China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re than financial records, these letters documented migration, sacrifice, family responsibility, and survival during war, poverty, and political upheaval. The author recalls how money sent from Malaya during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helped save eight members of his family when official relief failed, arguing that such documents reveal both the resilience of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during times of crisis. The essay also recounts the preservation of an authentic remittance letter obtained from its original owner's family and explains the author'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ing it as a historical artifact. Drawing upon the traditional values reflected in these letters, including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trustworthines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overseas remittance system depended upon personal integrity rather than official authority or formal contracts. Instead of glorifying suffering, the article urges readers to remember the compassion, mutual assistance,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at enabled countless families to survive. The preserved letter stands not merely as a collectible, but as enduring evidence of historical hardship, human dignity, and the lasting strength of family bonds across generations. It reminds readers that when institutions failed, ordinary people protected one another through trust, sacrifice, and unwavering responsibility, leaving future generations an irreplacable record of resilience and shared human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 朱虞夫
社长: 郑存柱
出品人: 景辉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 (发起人) 谢长发 (编导人) 胡石根 陈西吕
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 鲁慧文

副总编辑: 彭小梅

轮值总编辑: 黄吉洲

日本分社社长: 漠北独侠 / 漠北孤侠

加拿大分社社长: 韩瑞媛

副主编: 张致君 陆乾坤

档案部: 侯改英 (部长)

编辑部: 李聪玲 (部长) 李晶 (副部长) 钟然 (副部长) 张娜 (副部长) 胡丽莉 冯仍 王梦梦 周志刚 赵杰 李堃 韩立

华 张宇 黄吉洲 胡景 Gloria Wang Geoffrey Jin
收稿部: 马群 (部长) 彭小梅 (常务副部长) 彭小亮 杨长兵 田家元

校对部: 冯仍 (部长) 熊辩 (副部长) 程筱筱 (副部长) 王滨 林小龙 孔祥庆 毛一炜

翻译部: 彭小梅 (部长) 吕峰 (常务副部长) 周敏 (副部长) 何兴强 戈冰 沈美花

美编部: 胡海宁 (部长) 阎梦菁 (副部长) 刘敖 (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张帆

采访部: 林小龙 (部长) 缪青 (副部长 - 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邢致远 (副部长) 胡向飞 陀先润 胡景 Rong 侯冰封 郝剑平 庄帆 贾嘉 韩震

宣发部: Gloria (部长) 彭硕 (副部长) 曾群兰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夏体姍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晓丽 Rong 汪洋

信息技术部: 卢新虎 (部长) 卢超 (副部长) 邢致远 李建伟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姜俊良 吕峰

人权观察部: 黄吉洲 (部长) 张维清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胡志飞 黄飞何 陈娟 老默 安浦

公关事务部: 李享 (部长) 王连江 (副部长) 黄国安 (副部长) 宋娟华

外联部: 张致君 (部长) 赵杰 (副部长) 王海霞 (副部长) 林小龙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汪洋 Rong 史庆梅

财务部: 朱晓娜 (部长) 高晗 (副部长) 朱小砚 (出纳) 张致君

行政部: 吕聪 (部长) 张宇 (副部长) 陈婷

法务部: 陈闯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 张致君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 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 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 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 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 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 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 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 只要有您的支持, 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 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 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 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 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 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 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 不再沉默, 不再退让! 请扫描本页二维码, 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 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 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 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 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 @zaiyedang1998, 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 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 我们是认真的! 为了中国民主自由, 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Send Money with Zelle®
OPPOSITION PARTY INC



Zelle®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 Opposition Party INC

《在野党》2026年5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金额	捐款用途
05.18.2026	Jinghui Chen	\$2000.00	捐助杂志社
05.18.2026	Lianjiang Wang	\$100.00	定向捐助国内政治犯
05.19.2026	Qingmei Shi	\$6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19.2026	Lei Zhang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0.2026	Shicheng Ni	\$500.00	定向捐助国内政治犯
05.20.2026	Han Wang	\$35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0.2026	Jian Chen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0.2026	Jue Yuan	\$5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1.2026	Xiang Li	\$500.00	捐助杂志社
05.21.2026	Aibing Zhang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1.2026	Qunlan Zeng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1.2026	Chao Lu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2.2026	Lijuan Chen	\$5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2.2026	Xinhu Lu	\$100.00	定向捐助湖南李原凤
05.22.2026	Weiqing Zhang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2.2026	Gaiying Hou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2.2026	Juan Huang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2.2026	Gaiying Hou	\$100.00	捐助杂志社
05.26.2026	Haifeng Li	\$71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6.2026	jizhou Huang	\$5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6.2026	Liping Guo	\$2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6.2026	Qingmei Shi	\$161.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6.2026	Lianjiang Wang	\$100.00	定向捐助国内政治犯
05.26.2026	zhijun Wang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6.2026	Wei WangJ	\$1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5.28.2026	iawei Cai	\$89.64	定向捐助徐光
05.28.2026	Juanhua Song	\$200.00	捐助杂志社
06.01.2026	Xiang Li	\$200.00	捐助杂志社
06.04.2026	Meihua Shen	\$20.00	捐助杂志社
06.08.2026	CHINA DEMOCRACY PARTY FUND	\$30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6.08.2026	Lianjiang Wang	\$200.00	定向捐助朱虞夫

幕后团队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

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一、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二、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三、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四、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五、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

七、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荣誉墙



朱晓娜，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社财务部部长。长期参与杂志社工作，积极支持刊物建设与发展，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承担财务管理与后勤保障工作。

在具体事务中，她负责杂志社经费管理、财务统计及相关账务工作，认真做好各项资金收支记录与财务协调，保障杂志社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为刊物的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持。

她始终秉持严谨细致、务实负责的工作作风，在平凡而重要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为杂志社的持续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李亨，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社公关事务部部长。长期参与杂志社工作，积极推动刊物对外联络与交流合作，为杂志社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持 with 协助。

在具体事务中，他负责杂志社对外沟通、事务协调及相关资源联络工作，积极维护与社会各界人士及组织的联系，协助推动刊物宣传推广与相关合作事务，为杂志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他始终秉持认真负责、积极务实的工作态度，充分发挥沟通协调与组织联络作用，为杂志社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李旺陽 (1950 - 2012) 六四之後，不肯回頭的人

二十三年的牢獄歲月，未能讓他放棄信念；身體被摧殘，意志却始終挺立。
李旺陽的一生，是六四之後中國良知與記憶的縮影。

寧願砍頭，也不回頭。

